

编号 000134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送审稿)

(一)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

一九九二年八月

目 录

序.....	王尧山 (1)
前言	(4)
一、“文革”前夜发生在上海的几件事.....	(11)
(一) 江青提出要搞“戏剧改革”、“文艺革命”， 勾结张春桥，又与林彪相互吹捧	
(二)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炮制与 出笼	
(三) 江青与林彪加紧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 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四) 江、张策划“批判”《燕山夜话》，姚文 元《评〈三家村〉》发表	
二、上海“文革”初期的二三个月	(25)
(一)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文 革”全面发动	
(二) 市委对运动的领导问题和初期的一些重 要部署	
(三) “文革”运动在各单位逐步推开，教学、	

生产的正常秩序开始受到干扰

三、八月后的运动急速升温 (44)

(一)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空前规模的

“运动”群众

(二) 红卫兵的“扫四旧”与大串连

(三) 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的扩散与加剧

(四) 形格势禁，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无能

为力

四、北京红卫兵的三次南下 (61)

(一) 北京红卫兵的第一次南下

(二) 北京红卫兵的第二次南下

(三) 北京红卫兵的第三次南下

(四) 红卫兵接待站

五、上海红卫兵运动 (83)

(一) 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建立

(二)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连

(三) 遍及全市的“扫四旧”

(四) 驱赶“黑六类”、打人和“抄家”风

六、诬害常溪萍致死是为了打倒上海市委 (105)

(一) 江青威胁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二) 是非颠倒，常溪萍何“罪”之有

(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起恶劣影响

(四) 矛头直指市委主要负责干部

(五) 落井下石，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七、趁乱而起的“工总司” (128)

(一) 江青、张春桥等唆使红卫兵去工厂串连，

发动工人造反打倒上海市委

(二) 工厂企业里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性

人物是些什么样的人

(三) 由一些红卫兵充当助产婆，“工总司”

造反组织出世

(四) 市委严词拒绝“工总司”的三项无理

要求

(五) 开了一个乱哄哄的成立大会收不了场

八、安亭事件 (150)

(一) 北上“告状”队伍在安亭车站，铁路交

通严重堵塞

(二)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张春桥大搞政治

投机

(三) 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尖锐、激烈的

斗争

九、《解放日报》事件 (173)

- (一) 张春桥上海受困，江青调兵遣将
- (二) 聂元梓串连发难，制造《解放日报》事件
- (三) “工总司”插手了
- (四) 矛盾在激化，斗争在升级
- (五) “中央文革”指示为全面夺权开绿灯

十、张、姚策动的所谓“后院起火”…………… (190)

- (一) 写作班奉命集体造反
- (二) 马天水快速转向
- (三) “造反”大会的召开

十一、康平路事件…………… (203)

- (一) 为遏制“工总司”的胡做非为，“赤卫队”应运而生
- (二) 张春桥蓄谋要扼杀“赤卫队”
- (三) “赤卫队”到康平路向市委提要求，张春桥火急下达攻击令
- (四) 对“赤卫队”的残暴镇压
- (五) 谎言制造者的奸诈嘴脸

十二、“夺权！夺权！！夺权！！！”声中的上海“一月风暴”…………… (223)

- (一) “两个文件”发表的经过和所谓反经济主义

- (二) 策划召开“打倒市委大会”
- (三) 《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造反夺权
- (四) 以两个造反组织篡代政府部分机构职权
- (五) 四次以破产告终的抢先夺权活动
- (六) “上海人民公社”出笼

十三、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265)

- (一) “1·28 炮打”
- (二) “4·12 炮打”

十四、造反派的内讧和大规模武斗…………… (306)

- (一) “工总司”的“内讧”——王洪文摧垮“直属兵团”等
- (二) 上海铁道学院“红革会”与“红三司”的武斗
- (三) 各有背景的“版司”与“版联”之争
- (四) “公革会”与“消革会”“义革会”大打出手
- (五) “上体司”和“工体司”、“交运局造反队”武斗
- (六) 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砸“联司”
- (七) 普陀区一〇一厂武斗
- (八) 青浦武斗

十五、“改朝换代”的叫嚣和迫害干部的主要手段 …… (330)

(一) 张春桥关于“改朝换代”的叫嚣和其两方面实际内容

(二) 迫害干部的主要手段

十六、一桩重大的政治阴谋…………… (367)

——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

(一) 为了打倒陈、曹，蓄意进行诬陷

(二) 兴师动众搞外调，逼供、诱供制造假材料

(三) 迫害摧残本人并株连家属，陈、曹坚持据理抗争

(四) 设悬案，留“尾巴”，妄图使陈丕显翻不了身

(五) 在长期迫害摧残下，曹荻秋含冤去世

十七、打击、摧残各级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392)

(一) 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

(二) 诬陷迫害部、委、办、区、县、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

十八、炮制集团性冤假错案…………… (429)

(一) 张春桥一伙制造的一起特大的“集团性”冤案

——上海地下党冤案

(二) 凭主观猜想捏造出来的所谓“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

(三) “大揭大议”和“刮十二级台风”搞出来的“反动组织”

(四) 在“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专政”的罪名下，炮制大批集团性冤假错案，对文艺界人士进行大规模迫害

十九、砸烂公、检、法…………… (453)

(一) 公、检、法是怎样被搞乱、搞瘫痪的

(二) 另立机构取代公、检、法

(三) 被称为“王洪文公安局”的杨浦区公安分局

(四) 大规模、残忍地迫害公安干警的所谓“进攻战”

(五) 江青、张春桥指使王维国等制造荒唐离奇的冤假错案

(六) 妄图把专政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派”，彻底改变公、检、法机关性质

二十、游雪涛小组…………… (475)

(一) 投入张春桥的怀抱

(二) 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组织

(三) 阴谋手段和严重罪行

(四) 假审查，真包庇

二十一、“上体司”治安组…………… (450)

(一) “上体司”治安组的产生

(二) 一个横行不法的打砸抢组织

(三) 臭名昭著，草草收场

二十二、“清档”与“防扩散”…………… (504)

(一) 张春桥提出“清档”要“兜底翻”，要

为上海和中央的“专案”服务

(二) 利用“清档”搞阴谋诬陷活动

(三) 所谓“防扩散”的由来和贯彻

(四) 借“防扩散”名义，疯狂迫害“知情人”

二十三、“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 (521)

(一) 把“一打三反”运动着重点放在抓“现行反革命”

(二) 借口清查“五·一六”进一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一伙的人

二十四、从“文攻武卫”到市民兵指挥部…………… (539)

(一) “文攻武卫”怪胎的诞生及其演变

(二) 擅自赋予“文攻武卫”、民兵指挥部以专政机关的权力

(三) 大搞打、砸、抢，疯狂迫害干部群众

(四) 《上海城市民兵调查》的出笼

(五) 阴谋吞并人民武装部，疯狂强化“帮武装”

(六) 妄图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

二十五、“工总司”帮体系及其在“四人帮”篡党夺权中的作用…………… (569)

(一) 王洪文独霸“工总司”，进而篡夺市总工会领导权

(二) 篡党夺权中“工总司”帮体系的独特作用

(三) 自成体系与强烈的“帮”性

(四) 包庇重用社会渣滓

二十六、江青、张春桥等利用召开“九大”进行的阴谋活动…………… (595)

(一) “九大”前的小风波——批判《一切为了“九大”》

(二) 上海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的突出问题

(三) “九大”的上海代表产生过程中的阴谋活动

(四) 在“九大”的上海代表大组里的阴谋活动

(五) 天安门城楼上“晋见”江青的一幕

二十七、“文革”中的整党建党和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 (615)

(一) 造反派操纵整党

(二) “群众评议”结合“革命大批判”——

造反派整党员

(三) 突击发展帮派骨干入党，篡夺各级党

组织的领导权

(四) 上海市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二十八、“九·一三事件”后江青集团对林彪在上海
党羽的所谓清查工作 (633)

(一) 控制“王维国专案组”，销毁罪证，隐

匿材料，包庇林彪党羽

(二) 阻挠、压制群众的揭发批判

(三) 夺取林彪死党王维国所把持的部门的领
导权

(四) 把自己装扮成“反林”的“英雄”

二十九、江青集团从上海抽调帮派骨干去中央领导
机构的猖狂活动 (647)

(一) 挑选亲信党羽为“十届中委”候选对象

(二) 从上海密选帮派骨干去中央当部长

(三) 培养“工人大使”，妄图篡夺外交大权

三十、“批林批孔”中的第二次夺权 (668)

(一) “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旗号兴风作浪

(二) 张春桥、王洪文要马、徐、王带头搞第

二次夺权

(三) 马、徐、王点火基层搞典型

(四) 王秀珍秘密赴京串联

(五) 第二次夺权的情况

(六) “谁叫你们自己搞乱了自己”？

(七) 紧急刹车和刹车以后

三十一、“四人帮”驱策马、徐、王阴谋搞乱上海警备
区和南京军区 (703)

(一) 张春桥、王洪文早把上海警备区看作敌
对势力

(二) 派出“记者”、“联络员”，插手上海警备
区机关的运动

(三) 一封诬告信的出笼

(四) 策划召开“两个常委会”，大整上海警备
区领导干部

(五) 召开“军人大会”，乱军活动进一步升级

(六) 向南京军区送大字报，阴谋倒许乱军

(七) “反回潮风”和揪“军内资产阶级”阴谋
的破产

三十二、马、徐、王等组织策划“炮轰”国务院的
几个突出事件 (728)

- (一) 1973 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难
- (二) 大闹“春交会”，制造“大平板汽车事件”
- (三) 炮制“风庆轮事件”
- (四) 1975 年在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上作乱
- (五) “更新轮事件”始末
- (六) 1976 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一次作乱
- (七) 外贸“清仓查库”和“铜牌事件”

三十三、“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758)

- (一) “四人帮”诬蔑攻击邓小平由来已久
- (二) 派密使去北京摸情况
- (三) 设置“窗口”，树立“诬邓”样板
- (四) 大量翻印、散发“白头材料”
- (五) “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诬邓大串连活动
- (六) 马、徐、王赤膊上阵，力图掀起“批邓”高潮
- (七) 马、徐、王奉“四人帮”之命，插手外省市

三十四、张、姚直接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799)

- (一) 从协助搞《评〈海瑞罢官〉》到一月反革命风暴时的张姚工作班子

- (二) “专题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的成立和撤销
- (三) 建立《红旗》上海组稿组
- (四) 写作组的正式开张和张、姚对它的控制
- (五) 写作组的主要罪恶活动
- (六) 写作组最后一段日子

三十五、扑不灭的抗争烈火

——上海人民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几则事例…………… (879)

- (一) 人民群众不畏强暴怒斥江青、张春桥等
- (二) 党员干部在党的会议上同“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的斗争
- (三) 维护陈毅光辉形象，抗议张春桥等对陈毅的诬蔑
- (四) 在沉痛哀悼周恩来的日子里

三十六、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 (908)

- (一) 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与其上海的党羽加紧策划作乱
- (二) 热锅上的蚂蚁
- (三) 垂死挣扎，策动叛乱
- (四) 叛乱在行动中

(五) “帮兄帮弟”们的猖狂活动

(六) 无可奈何，马、徐、王返沪

(七) 武装叛乱阴谋的彻底破产和余党们寄希望于未来

后记..... (978)

序

王尧山

这里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记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的主要过程的史话。它的主要内容是：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四人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文化大革命”之机会，搞乱上海，乱中夺权，又妄图以上海为反革命基地，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种种阴谋活动内幕及其严重后果。这是一部主要地以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反面教材的著述，它反映了让这样一批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得势上台有多么严重的危害！同时也反映了上海的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英勇的艰难曲折的斗争的历史事实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林彪集团，发展到策划武装政变，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而于1971年9月彻底覆灭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则变本加厉地继续掀风作浪，更

加疯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由于江青集团首恶分子和一批骨干成员都是从上海“造反起家”的，并且把上海作为他们的反革命基地，上海的党组织和全市人民遭受的祸害特别深重。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共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为清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上海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滔天罪行，清除他们的恶劣影响，实事求是地进行了严肃、认真、细致的工作。尤其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坚决摒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清查工作更加深入。1981年国家组织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进行了审判，江、张、姚、王等元凶首恶和他们的骨干党羽们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同时，上海各条战线的工作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取得显著成效。1983年10月开始的三年整党工作中又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和核查三种人的工作。正是通过粉碎“四人帮”后多年的工作，上海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1988年5月，市委决定要对这些宝贵史料进行整理编纂，以保存史实，以史为鉴，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这就是撰写这部著作的起因。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市委领导下和广大干部的支持下，现在这本《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终于要问世了。参与整理

编纂工作的大多数都是年逾古稀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是尽了力的。综观全书，“文化大革命”在上海是如何开始和如何进行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如何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篡夺领导权、残害干部和群众，都比较清楚了。十年中发生在上海的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引用的材料翔实可信。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全面的大动乱、大内乱，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时间又持续十年之久，这里虽然尽可能地把这个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主要事件都加以记述，仍然难免遗漏。全书以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活动为主，而对于其他方面重要问题则有资料阙如之感。如在这个时期上海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顶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与干扰，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荒谬的极“左”煽动，工作上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国民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部门努力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则没有充分反映，有待其他著作记述。最后，正如撰写者在《后记》中所说，限于水平，书中定有不当、不周之处，希望读者特别是经历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党内外老同志指正史实，补充史料，纠正谬误，以便进一步修改、充实和完善。

1992年8月21日

前 言

从1983年11月开始历时3年半的整党工作中，市委整党办公室收集和积累了大量有关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历史资料。当时，主要是为了在整党中开展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教育和核查“三种人”^①工作的需要。收集“文革”资料是全市党组织大家动手进行的。各部、委、办、区、县、局党委、党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都在查阅粉碎“四人帮”后历次清理工作形成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核对，写出了上万字到几十万字的本单位的《“文革”大事记》和许多专题调查报告。市委整党办公室又收集、摘抄了市委清查“四人帮”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整理的材料，包括对上海“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的揭发材料和“四人帮”上海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其他骨干分子的交代材料。市档案馆和市委办公厅档案室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提供了当时的“市革会”等机关的文件资料等。此外，还收集了“文革”十年中上海的部分报刊等

^① “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等。我们感到，这次整党中积累起来的有关上海市“文革”的资料是极为宝贵的。

1987年夏整党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在办理整党遗留事项的同时，就开始酝酿如何处理这一大批资料的问题，并提出意见报告市委。1988年5月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决定：“整党中收集的有关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应加以整理。”“市委整党办公室机构撤销以后，留下几位同志，成立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负责此项工作。”

我们在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后，越来越体会市委的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第一，重视反面经验的教育作用。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党不仅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而且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新回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邓小平在1980年10月一次谈话中

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64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无疑地是与党中央全面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认真地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主要是“左”的错误，并以此教育全党分不开的。所以以“文革”的教训为鉴戒，有助于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①更加坚决地为维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斗争。

“文革”在我们这一代身历其境者，一般地说至少是现在40岁以上的人，特别是当年受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迫害的人，是记忆犹新的。那狂风暴雨般的“文革”运动的日日夜夜，是非颠倒，敌我混淆，诬陷迫害成风，冤狱遍于全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千千万万人的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伤痕”至今未痊愈。然而，十年“文革”运

^① 是指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以后人们把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概括成为“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

动距离现在毕竟有十五六年到二十五六年了。现在30多岁以下的青年们，对“文革”已经很难有“感性知识”了。他们只能从书本上或老一辈的讲述中间接地了解当年的“文革”运动。把当年“文革”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资料收集整理成文，这对于帮助青年一代理解“文革”这场大灾难，是会有裨益的。

第二，上海的“文革”运动有它的特点，整理编纂上海的“文革”史料很有必要。

上海的“文革”是全国“文革”的一部分，上海“文革”中发生的事件离不开全国“文革”的形势和背景，在这一方面，上海和全国其他省、市是相同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上海“文革”又有很大的特点，这是由于上海是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作乱最久、为祸最烈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或称“四人帮”的发迹地，也是他们进行祸国殃民罪恶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基地。十年动乱中，他们利用“领导者的错误发动”，多数是从上海首先掀起阵阵恶浪，不少坏事他们是始作俑者，或者是干得特别猖狂的，例如所谓“一月革命”的反革命夺权，“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从上海密选部长派去中央，直到策动武装叛乱，等等，对全国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因此，研究上海的“文革”史料，对于了解“文革”这场灾难中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作用。

“四人帮”被粉碎从而结束了“文革”。时间虽然已经过去

十五六年了，但是，“文革”的流毒影响却不是轻易地能够清除彻底的，特别是在上海这样“文革”重灾区。“四人帮”及其主要党羽的名字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然而他们的余孽不会都变得老老实实，他们不甘心失败。1989年6月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后，邓小平曾讲到：“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就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上海市有关部门也发现，那些当年的所谓“老造反”们，串连频繁，窥测时机，蠢蠢欲动，其中有原王洪文的秘书等人。总之，我们认为，整理编纂上海的“文革”史料，着重揭露“四人帮”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滔天罪行与丑恶灵魂，这不仅激发了我们对他们的无比义愤，也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一切阴谋、野心分子的警惕心。

以上是我们为遵照市委决定从事这项工作的由来。

我们在进行整理编纂工作中，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一）严格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整理编纂工作开始后，我们立

即感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是由于历史资料浩繁，去芜取精，去伪存真，本身就有难度。有些事件说法不一；有些材料不全，缺乏佐证；有些重要事件，当时的记录、资料是严重扭曲的，或被有意识地销毁了，需要作深入的调查。二是“文革”距离现在时间上不算太远，许多事件的当事人现在都还健在。由于“文革”本身的复杂性，除了“四人帮”帮派体系人物所持观点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外，其他当事人对事件的看法上也可能各有不同；若事涉褒贬则更不易一致。究竟怎么办呢？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文选》第133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和态度。

（三）着重记述“文革”中在上海发生的事件。由于“文革”是全国性的，整理编纂上海“文革”史料中必然涉及来自中枢的号令、指示和全国的动态，但我们只选择那些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援引的部分。我们把重点放在记述“四人帮”及其上海党羽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罪恶活动上，尤其注意依据他们内部策划、谈话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中交代等资料，深入揭露他们阴谋活动的内幕，并尽可能具体翔实。

四、整理编纂的基本方法。我们先将大量有关上海“文革”的资料和档案以及分散在各单位《“文革”大事记》中的材料择要摘抄，汇总研究后，分成几十个题目，理出提纲，经

进一步查证、修改、补充，然后编纂成章。在全书三十六章中，大部分是以重大事件为主题，又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四诸章是以当年的某些组织或机构为主题，系统地记述它们的严重罪恶活动。因之，各章记述的事件难免有某些交叉和重复。我们希望读者通过综观全书，对上海“文革”十年灾难，能有一个总的比较深刻的概念，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我们引用的资料，在撰写初稿时，都一一注明了出处。但这样做，注释过多，读者在阅读时有所不便。因此在修改时除保留必要的注释外，一般都删去了。但我们引用的有关历史资料都是有依据的。

一、“文革”前夜发生在上海的几件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决议》又指出：“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本书的第一篇，这里要记述的是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如何别有用心地利用毛泽东的错误造成的机会，在“文革”前夜就加紧相互勾结，蠢蠢而动。当时，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就在上海。

（一）江青提出要搞“戏剧改革”、“文艺革命”，勾结张春桥，又与林彪相互吹捧

“文革”前几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多次对文化艺术工作提出了严厉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

告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文化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部门，问题就更大。”“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观点，导致了文化艺术战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知名人士，进行了错误的或过火的政治批判斗争，在“文革”前夜就开始颠倒了敌我。

三十年代曾经当过话剧和电影演员，自称“政治上受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压抑”的大野心家江青，利用这个机会，打起搞“戏剧改革”、“文艺革命”的旗号，开始了活动。

1964年3月15日，江青跟随毛泽东来上海，住了两个月，5月15日才去北京。这期间江青提出要搞现代戏，要一个助手。她向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这个要求。经柯庆施的介绍，江青看中了张春桥，指名要张做她的助手。从此，张春桥和江青搭上了线，开始了勾结。

1965年2月12日京剧现代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2月24日，江青来上海，住到6月20日才离去。这期间江青竭力拉拢林彪，互相吹捧。约三月间，江青为林彪专场演出《红灯记》。事先江青说：“‘林总’和我生的一样的病，场子里温度

一定要控制好”，巴结照顾无微不至。事后，叶群告诉江青，林彪认为演出很成功。江青大为高兴，十分激动地逢人便说：“林总是最支持我的。”

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的排演，颐指气使，硬是要剧组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为他们的政治阴谋服务。张春桥对当时上海京剧院党委书记说：“这个戏要树林总。”又说：“你们不要小看了一出戏，它的意义很大。现在搞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打一场政治仗。”在《智取威虎山》修改过程中，林彪、叶群派专机送来东北剿匪斗争的总结材料和作战地图。林彪住在苏州时，江青几次去看望，互赠礼品，搞得十分热火。到1966年4月，江青、张春桥陪同林彪、叶群来看《智取威虎山》彩排，林、叶表示满意后，张春桥说：“这一下我们放心了，林总批准了。”江青也叫嚷：“这个剧林总批准了，你们不用再改。”

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他要别人向记者介绍《智取威虎山》的创作过程时一切归功于江青。张对当时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说：“你怎么没有谈江青，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1965年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张春桥心甘情愿拍江青的马屁，直到后来“文革”中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难道江青本人真有什么值得张春桥“钦佩”之处吗？不！张春桥对江青的拍马、捧场，完全是别有所图。在这个问题上，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张春桥之妻李文静曾有一份交代，说到“张春桥和江青是怎样勾结起来的”，讲了些夫妻间的私房话，其中反映张春桥对江青是颇有贬词的，也赤裸裸地道出张春桥所以要拍江青的马屁的用心所在。值得参考，特摘录于下：

“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她提出要找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去，都是当时华东宣传系统中第一流人物，江青和他们谈谈，都不满意。正好人家也不愿和她合作，结果都退回来了。后来叫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

“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

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肯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样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心可强呢！’……”

“一九六九年‘九大’的时候，艾玲^①由于搜集情况（报？）有功，被安排为‘九大’代表。可是，过了不久，有一次江青给张春桥一封‘亲拆’的密信，张看后放在抽屉里。第二天一早，我偷看了这封信，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叫张春桥把艾玲抓起来！”

“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张春桥和江青的勾结，以及江青和林彪的勾结，一开始就是阴谋家、野心家各怀鬼胎的互相利用，这是够清楚的了。

（二）《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炮制与出笼

在前面讲到的搞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差不多同时，江青与张春桥一起策划，着手撰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

^① 艾玲，原《文汇报》编委兼《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文革”中任《文汇报》革委会主任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因参与过“四·一二”所谓炮打张春桥事件，事后作了检查。张春桥表面上表示“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并安排艾为“九大”代表、市革委会常委等，待“清查五·一六”运动一开始，张春桥即将艾隔离审查。

吴晗是明史专家，他的《海瑞罢官》剧本是1959年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1960年11月完成的。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演出。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列举了需要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的名单，其中有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等编写的《燕山夜话》等。

张春桥向江青引荐了上海《解放》杂志编辑、善于舞文弄墨打棍子的姚文元（还有朱永嘉等少数人参与）来炮制这篇批判文章。

文章的炮制过程就是鬼鬼祟祟、极不正常的，江青特别规定对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要严格封锁消息。文章出笼前后更是充满着阴谋诡计。

据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丑表功地透露：这篇文章是她组织的，“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姚文元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面简称《评〈海罢〉》），捕风捉影地硬把剧本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

式的反映”。这种荒唐的牵强附会，真可谓煞费苦心。张春桥后来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自己承认：“这里最难的是和1959年和1961年形势连一连。”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评〈海罢〉》全文。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评〈海罢〉》的出笼，对于十年“文革”大灾难，起了一种导火线引爆的作用。

这里值得提一提的是张春桥在《评〈海罢〉》出笼前后那种极其狡诈的嘴脸。据当时《文汇报》副总编辑等人在“四人帮”垮台后揭发：在《评〈海罢〉》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给邓拓打个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据朱永嘉后来交代：“张春桥为了《海罢》批判问题到北京去，专程去看了邓拓，把《海罢》批判的背景告诉了邓拓。”当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透露消息给邓拓，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1965年底1966年初，彭真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竭力欺骗彭真，把准备在《文汇报》上开展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计划（主要是“清官”问题、“让步”政策等等）告诉了彭真，一个劲儿地向学术讨论的路子上引。后来在批判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时，有一部分在北京写文章的同志说：“我们就是根据上海的路子来的，我们错了，那上海算什么？”针对这种反映，张春桥非常狡猾地说，你们要分清“延安”和“西安”。

当姚文元的《评〈海罢〉》印出清样还未在《文汇报》刊登之前，张春桥就假意叫人拿去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的所谓座谈会。开始时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而已。当时，对于姚文，学术界和社会上许多同志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姚文元破坏“双百方针”，捕风捉影，把学术问题强扯作政治问题那种蛮横霸道的作风，反对者多，反响强烈。这些意见本是完全合理、完全正确的。谁知恰恰中了张春桥的奸计。那时，张春桥强令即将付印的1966年第一期《学术月刊》拆掉版子，换上在他指挥下搞出的所谓“清官问题”笔谈会的材料，并由《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人民日报》先后转载。他凶相毕露地说：“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后来还不加掩饰地、得意洋洋地把这些手法名之曰“引蛇出洞”。《海瑞罢官》讨论展开后，张春桥又叫当时市委宣传部长在一个座谈会上表态，说明姚文“可能全部正确，可能全部不正确，可能部分正确、部分不正确，完全可以讨论，不会抓辫子的。”张春桥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这样一说，人家就敢讲话了。”当时那位宣传部长有顾虑，表现

犹豫。张说：“你尽管去说，这是‘钓鱼’，是我叫你说的，人家将来有意见，我会替你说明的。”“文革”中那位宣传部长真的被人家揪住了，责问他当时为什么这样说，上纲上线地批判他在对待《评〈海罢〉》的态度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时张春桥一声不吭了。

由于张春桥“引蛇出洞”“钓鱼”而遭受迫害的有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有的被搞得家破人亡。

（三）江青与林彪加紧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是1966年2月2日至20日召开的。这里需要先讲一讲与座谈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作个对照，以便明了座谈会的背景和其所起的严重恶劣的作用。

第一件事是1966年1月23日党中央正式下达《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央的批语中指出：“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在文化部的汇报中提到全国已有16万文

艺工作者离开机关去参加四清运动^①，参加文化工作队，深入农村、工矿、连队，为工农兵服务。“总的来说，当前文化战线的形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大好的。事实证明，关键在领导。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是那些毛病、错误比较严重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跟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第二件事是彭真等草拟的《二月提纲》，正是鉴于《评〈海罢〉》发表后已经出现的混乱状况，试图对批判中“左”的偏差加以限制，因而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出对批判要加强党的领导，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等意见。这个提纲报送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同意后，因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又由彭真、陆定一、康生于2月8日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提纲》。

江青、张春桥窥察到上述文件精神与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革命的意图不符，于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内，与林彪加紧勾结，酝酿由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来演唱对台

^①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963年至1965年间，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后来，城乡“社教”运动内容都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四个方面，统称“四清运动”。

戏。江青的目的在于利用解放军的名义，首先在文艺方面制造混乱，打倒别人，抬高自己，进而实现其政治野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林彪则也需要利用江青在毛泽东身旁这个特殊身份，为己所用。于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种在党的历史上极少见的特殊作法就出笼了。

这一次江青是1965年11月12日来上海的。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谈了所谓对“文艺革命”的看法。两人一拍即合，进行了政治交易。江青当天回到上海。1月22日林彪就对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大肆吹捧江青，说“江青××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2月2日，江青就在上海邀请总政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当时根本没有军职的张春桥也不时参加所谓看作品（看电影、看戏）议观点等活动，参加座谈。会议20日结束，刘志坚等拟了一份向总政治部汇报的《座谈会纪要》，江青知道后大发脾气，说“歪曲了她的本意”“根本不行”。后来在张春桥的直接参与下多次修改，内容有很大增删，加进了许多根本没有座谈过的东西。张春桥曾对

其亲信朱永嘉说起“这几天好几夜没有睡了，就是搞文件。”粉碎“四人帮”后，朱永嘉在一次交代中说：“后来我知道他在搞的就是那个林彪与江青二人互相肉麻地吹捧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经陈伯达看后又作了一些修改。又经毛泽东审阅。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到林彪处，3月22日林彪就送中央军委常委，吹捧那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是那份为害甚烈、流毒甚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由来。它是林彪和江青加紧勾结的产物。

这个《纪要》最关键、最突出之处是根本抹煞建国以来文化艺术工作的成就和主流，提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为此，《纪要》提出，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种所谓“黑线专政论”很快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为后来“文革”的发动以及十年大动乱推波助澜，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江、张策划“批判”《燕山夜话》，姚文元《评〈三家

村〉》发表

继《评〈海罢〉》之后，江青、张春桥紧接着组织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批判”。那些“批判”文章在全国报刊上发表，预示着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5月8日，由江青组织人撰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红旗》杂志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上，第二天即5月9日全国各报都予以转载。

高炬的文章里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村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何明的文章则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刊登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何明就是关锋，当时窃踞着《红旗》杂志编委职务，他是通过张春桥获得“信息”投入“战斗”的。1966年的春节前后，他通过《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艾玲，转达他要来上海会见张春桥的要求，目的是摸批判《海瑞罢官》的底。张春桥布置市委办公厅负责接待，把关锋安排住在东湖招待所。张春桥和关锋在东湖招待所密谈至深夜。关锋回北京临行时表示对

谈话内容很满意。高炬、何明文章在全国报刊转载的第二天，即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1日，又在全国各报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地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姚无限上纲地诬指某篇文章是怎样攻击党、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篇又是要掀起什么“妖风”的，是怎样配合帝修反“反华大合唱”，推行“和平演变”的，等等，牵强附会，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除此以外，姚文元比高炬、何明文章更加凶相毕露的是提出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这哪里是什么批判文章，完全是杀气腾腾的政治进剿的隆隆炮声了！

由于张春桥当时还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成员之一，因此在《评〈海罢〉》、《评〈三家村〉》出笼之前，张也曾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评〈三家村〉》中关于“要挖根子”那种提法，当时市委负责同志如曹荻秋就持反对态度。后来“文革”中疯狂地批斗、折磨曹荻秋时，“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也成为曹荻秋的一条“罪名”。

二、上海“文革”初期的二三个月

从党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的这一段时间，是整个“文革”中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上海“文革”运动呈现出曲折复杂的情况。

（一）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文革”全面发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8日，林彪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了话，即臭名昭著的专念“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这些通知、讲话以及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信（后来简称《五·七指示》），都于会后陆续发到各省、市委，逐级往下传达贯彻。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张春桥、姚文元坐上了“中央文革”的领导位子，与江青进一步紧密勾结，为他们不久以后窃取上海市党政大权打开了通道。

在党内还刚开始逐级传达、学习中央指示精神的时候，由康生、陈伯达控制的中央宣传舆论部门就率先面向全民大张旗鼓地进行动员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和重要报导，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等等。上海一般都是当天由电台广播，次日于《解放日报》、《文汇报》头版转载。

以《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下达贯彻为标志，“文革”运动就在党内外一起发动的情况下全面爆发了。

（二）市委对运动的领导问题和初期的一些重要部署

上海的“文革”运动，初期是在陈丕显、曹荻秋为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个时期很短。究竟有多长？若以市委和各级党委机构陷于瘫痪、领导权被篡夺作为初期阶段的结束，则总共只有7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即从1966年5月中、下旬到同年年底或翌年年初止。在十年动乱中，它只占6%的时间。若以市委和各级党委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中实际能起领导作用的时间来看，则这个初期阶段的时间更短。因为从8月上旬开始，市委和各级党委对“文革”的领导就残

缺不全了。先是市委和各级党委派遣到大、中学校的工作组，以后扩及各条战线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队，都被迫撤离；10月上、中旬起，根据中央10月5日紧急指示精神，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党委（总支、支部）停止对“文革”的领导，这同样扩及各条战线各级党委都先后停止对“文革”的领导。用“造反派”的话说，这就叫“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仅如此，丧失了对“文革”领导权的市委和各级党委，在“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影响下，越来越处于受冲击、挨批判的境地，其领导成员被无理纠缠、残酷揪斗，根本不能正常工作，直至整个机构陷于瘫痪。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文革”开始到7月底、8月初上海的运动的情况。这一段时间虽然只有二三个月，但是斗争曲折、激烈、异常，情况极其错综复杂。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市委和各级党委只能是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文革”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因之在这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自己的工作中也有某些“左”的错误，如点名批判了极少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等。但是，这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别有用心地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发动，兴风作浪，煽动极“左”思潮，搞乱全国，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而且，在另一方面，市委和各级党委对于“文革”运动中的种种悖于常理的现象及其发展，不能不感到困惑、不理解，对于生产和社会秩序受到日益

严重的损害十分忧虑，因此在思想上易于接受当时中央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使运动有控制地进行的指示（如派工作组，基层“文革”运动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等），在行动上力求使运动纳入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之下。（这一方面在8月以后更为明显。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包括省、市委在内的地方各级党委都被林彪横蛮地指责为“中间顶牛”。）

早在接到中央《五·一六通知》之前，1966年5月11日，市委就曾向部、委、办负责同志发了一个电话通知。通知指出正在深入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通知要求市委各部委、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当前要以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为中心。通知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应在市委统一领导下，以饱满革命精神参加这一斗争，同时要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遇到政策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请示，使得这一场重大的斗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健康地开展。”

5月21日，市委收到中央《五·一六通知》等正式文本，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和常委会议进行学习讨论。第二天即5月22日，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讨论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并从5月27日起，召开第三届市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了关于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次

会议一直延续到6月28日（中间有休会日子）才结束。

6月2日，市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张春桥，副组长杨西光，组员杨永直、常溪萍、孟波、李家齐、马达、姚文元、吴云涛、徐景贤。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参加市委文化革命小组，使市委领导的内部关系复杂化了。张、姚二人都兼有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文革小组双重领导身份，这对他们搞阴谋活动十分有利；他们与江青紧密勾结，上下其手，时刻觊觎着从上海打开缺口，搞乱全国，实现其乱中夺权的野心。徐景贤是当时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实则已是张、姚的亲信追随者，在一月反革命夺权中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也根据市委通知精神，相继成立机关“文革”领导小组，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加强对运动的领导。

从6月上旬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五·一六通知》精神，结合上海的具体情况，就“文革”的部署问题，和各大口负责同志作了多次讨论。除了6月10日召开了全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包括基层支部书记）的万人大会，由曹获秋作动员报告外，又通过各种会议，向下作了布置。比较重要的部署有：

（1）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注意掌握政策。

要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声讨“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及时地组织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积极投入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因为全市单位多，战线长，领导力量强弱不一，重点批判要有准备有步骤展开，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批判斗争。

在党内外，有些人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写过一些不好的作品。对于这些人，要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事先按干部分管范围，报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凡在报纸上公开批判的，都要经市委批准。

党的各级组织要把领导“文革”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由第一把手亲自抓。对于那些主要负责人有严重问题的单位，由市委派出工作队把领导权拿回来，由工作队统一领导这些单位的“文革”。

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紧跟主席思想，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

(2) 向教育系统和其他部分单位派出工作组。

仿照北京市向教育系统大部分单位派驻了工作组的办法，市委和各区、局党委也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市委还向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等所谓重点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市委知悉当时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制定的《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

报不要上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等要求，也及时向各级党委和工作组进行了传达。

(3) 明确“文革”和“四清运动”的关系。

市委认为：“文革”和“四清”的战略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斗争着手，来达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的要求，这是“四清”的发展。从意识形态斗争着手来解决清经济问题，也可能更顺利一些。因此，“文化大革命”完全可以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正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运动的各个阶段的划分和部署，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

当时全市“四清运动”的进度有快有慢。在郊区农村，2个县已搞完，8个县已进入结束阶段。对前者，要进行“文革”的补课；对后者，这一段的运动就要以“文革”为中心，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搞得更深更透。市委农村社教办公室还提出农村揭牛鬼蛇神一般来说目标可以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干部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②四类分子①中有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③

① 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人员。

散播淫秽、荒诞、迷信毒素的流窜活动的黑剧团、黑艺人；④一贯进行骗钱害人活动的迷信职业者。选择上述四方面典型人物，经工作队和公社党委批准后，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说理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打人。

在市区，“四清运动”的进度更参差不齐。如在工业系统，第一、第二机电局、仪表局、电业局等进度较快，到6月份基本搞完；冶金局、化工局所属单位，正在搞“四清”；纺织局、轻工业局、手工业局、物资局等都还没有开展“四清”。交通、市政建设、财贸等系统同样存在基本搞完、正在搞、未开展三种情况。有的局搞了一批基层单位的“四清”，但局、公司机关本身没有搞“四清”。按照市委部署，各系统和各局党委都区别不同情况，提出打算和部署。大体上：对没有搞过“四清运动”的单位，分批派出四清工作队去领导运动；暂时还没有工作队去的单位，也在“大鸣大放”揭问题，到一定程度可以组织职工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革”文章、文件。至于揭露出来的问题，边整边改，并做好重点对象的材料调查核实工作，为今后“四清运动”作好准备。7月份，工业系统对于已经结束“四清运动”的单位提出新的打算，即凡没有达到标准，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约占3%），由原来“四清”工作队抽少数骨干和从各局现有干部中抽调一定力量，重新组织工作队进驻补课；凡基本上达到标准的单位，可以在本

企业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

(4) 提出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问题。

运动全面铺开，领导力量，特别是骨干力量不足。全市可以集中的工作队员，总共约1万5千名左右，而且处级以上干部和党员都较少，如果把面拉得太开，运动就有走过场的可能。……还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步骤地分批开展运动为好。

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文教系统和党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引向深入，一定要把它搞深搞透。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是这场大革命的重点。文教战线各单位的运动虽然比其他战线发展得快一些，但也不平衡。……要创造条件，适时地转到对重点对象展开批判斗争。这些条件是：第一，党内外问题真正揭深、揭透，尤其是要害问题都揭开了。第二，左派队伍已经形成，有了一支战斗队伍和领导骨干。第三，材料已经集中整理，有些已经过核对，批判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对重点对象的斗争，力求每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初级中学和小学的教师，利用暑、寒假，以区为单位，集中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

(5) 关于面上文化大革命问题。

鉴于工业、交通、财贸、医疗、机关等等还没有开展四清运动的单位，“文革”也开展起来了，但因领导力量不足，这些单位开展运动的步骤要推迟一步，将来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搞。现在这些单位的群众贴了很多大字报，揭出了很多问题，可以

组织一定力量，进行整理，排队分析；同时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的著作和其他有关文件，到适当时机，再由上级派工作队前去领导继续开展运动。这样做，必须同群众讲清楚，避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此外，在6、7两月中，通过报纸（主要是在《文汇报》上）公开点名，对8位在上海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高教界和学术界的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文艺界的王西彦。强加给他们的帽子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革命黑帮分子”、“‘三家村’学者”等等。这8人中有好几位是被张春桥借讨论《评〈海晏〉》为名“钓鱼”钓出来的。如李俊民仅因在姚文清样上划了一条线；又在清官问题上说了“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很大，当然也有欺骗性”。张春桥等人把李俊民所讲的是在封建社会这个前提以及清官的欺骗性都抹掉，断章取义地诬之为“清官精华论”，成了莫大的罪名。周予同只是说了姚文是“乱箭射人”、“乱打一通”，成了“反共老手”。李平心因为反对姚文元的所谓“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谬论，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历史科学，竟被加上“‘三家村’学者”的头衔；把他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的轴心的论点，诬

蔑为“修正主义生产力论”。

（三）“文革”运动在各单位逐步推开，教学、生产的正常秩序开始受到干扰

运动的开始，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

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文章的鼓动下，上海各系统、各单位一般在6月5日、6日出现第一次“大鸣、大放、大字报”高潮；6月10日市委召开动员大会后，中旬出现第二次鸣放高潮。据当时统计，全市有270多万人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运动发展“迅猛异常，声势浩大”。

从一个单位来讲，先是召开传达动员会和声讨会，声讨所谓“三家村”黑帮；在群众“初步发动”的情况下，运动就转向内部，揭发本单位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许多单位提出“上下左右都可以揭”，“党内党外一起揭”，党委“引火烧身”。有些单位提出“横扫”“纵扫”“直扫”一起上。逐级统计大字报的张数和被大字报点名的面（即被点名者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比）。要求“揭深揭透”。

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

举若干系统或单位的情况为例：

宣传系统市属各单位（不包括书店、印刷厂）从6月初至6月18日，贴出大字报8万8千余张，点名1390余人，占干部

总数的12.3%。

市委机关和工、青、妇群众团体机关自6月初至6月25日，贴出大字报1万多张。市人委所属16个局以上机关参加运动1800余人，到7月2日止，贴出大字报1万余张。局级干部都被点了名，处级干部80%被点名。

在市区：普陀区区级机关6月6日、7日两天贴出大字报2600余张。静安区区级机关29个单位，从6月2日至29日，贴出大字报7千多张，在参加运动的6百多名干部中被点名的有59%；到7月17日，大字报增至9000余张；部局级（包括直属科科长）被点名的60余人，占这级干部的91.5%。长宁区6月10日后到28日，区级机关贴出大字报11000余张；6、7两月全区共贴出大字报30多万张。在郊区：10个县的县级机关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近10万张，被点名的约占机关干部总数的20%。

工业交通系统：正在开展四清的冶金局，大字报不计其数，到6月28日止，被点名的有7000多人，占职工总数10.4%。手工业局机关6、7月份中贴出大字报3100多张，被点名的干部占总数的28.4%。

财贸系统：商业一局机关自6月中旬到7月初贴出大字报1万5千多张。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到6月27日止，贴出大字报7300余张。

政法系统的市公安局，22个单位参加运动的6600余人，自6月初到7月20日止贴出大字报5万1千多张。

科研系统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6月4日到7日贴出了大字报3百多张，有的大字报竟点名指责领导干部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6月16日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赶来看大字报，表态说：“方向对头”。该所党委副书记说：“只要不革命的，都要扫一扫。”于是，几天内大字报猛增至1800余张，许多著名科学家遭到大字报围攻。

在大专院校，大字报来势之凶猛，更超过一般机关。如在上海第一医学院，6月5日一天全院即贴出大字报5千多张，点了7名正副教授和五官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的名。

鸣放高潮形成以后，就对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排队分析。根据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的所谓问题，按照1965年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规定的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干部的原则，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犯有轻微错误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肯定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犯错误的特别是犯严重错误的是极少数。

约6月下旬到7月份，大、中学校已经出现某些影响教学秩序的不正常现象，甚至有冲击生产和社会秩序的苗头。首先在大专院校，动乱的因素在逐步增涨。有许多事情是从北京传

来的消息引起的。例如6月27日晚上和28日，交通大学先后有31批学生共约190余人，情绪激动地到市委机关“来访”，要市委负责同志回答“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起因是什么呢？原来交大数学教研组一位同志收到他在北京清华大学上学的弟弟寄来（也是转抄的）一份《北京林业学院访北京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讲话记录》，他把它贴了出来（各系有人复写了一百多份）。讲话纪录中有这样一些话：“这次运动的主攻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前首先要搞掉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党委，而不是几个教授。……运动依靠谁？谁革命就依靠谁，谁也没有提依靠党、团组织，你知道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等等。于是，交大校园里很快出现两派不同意见的大字报，一派说“交大党委不是革命的”，一派说“交大党委是革命的”。一些天真单纯的、勇敢的、容易激动的青年学生就纷纷来到市委机关，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要求明确回答“交通大学党委是不是革命的？！”

类似的事件日益增多。

在一些中学里，开始出现起哄、围斗、打人、罚跪、戴高帽等混乱现象。据7月初统计，在全市468所开展运动的中学里，程度不同地发生此类情况的有191所，占中学数的近40%。发现此类情况时，各区委和所派工作组都及时去进行疏导工作，防止事态的恶化和扩大。

市委在6月下旬接到中共中央6月20日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①市委把中央指示发给县团以上单位传达贯彻。同月底，市委接到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电话。魏文伯说：“刚才与陶铸同志通了电话。陶说要告诉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敢于领导，党、团员要起来斗争，同群众讲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大多数党组织、党员是好的，不能对党组织都不信任。有个别不好的大家可以揭；党组织、党员有缺点也可以批评。”这些指示精神得到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的拥护。但1966年8月5日，中央又宣布中央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从此以后乱斗现象变本加厉，无政府主义泛滥，不可遏止。

7月上旬，市委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7月2日发出的《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

^①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斗事件，北大工作组采取了以系为单位召开师生大会，就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明确指出乱斗的做法，有害于革命运动；规定以后斗争人要经工作组批准等办法，及时制止了乱斗现象。

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7月10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会后,各区都确定街道办事处、医院、体育场馆、文化馆、工人俱乐部、图书馆以及区属财贸单位等暂缓开展运动。7月下旬市委又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补充通知》。其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地专以上的党政机关一律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县以下的党政机关,农林水利方面的基层单位以及城市的基层组织(如公安派出所、街道居民组织等)的文化大革命,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财政贸易方面的基层单位一样,要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有计划、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市委接到中央指示后作了认真讨论,认为上海“文革”运动的部署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应进一步贯彻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虽然刚发动不久,但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生产业务已经开始受到运动的消极影响。市委7月8日上报中央、主席并华东局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说:总的来看,上半年上海的生产形势很好。工业总产值完成140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1%。产品质量波动面曾一度有所扩大,经过5月中旬全面检查后,情况已有改善,现

已下降到4.9%,但仍高于去年第四季度3%的水平。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不好,以至某些产品如钢、钢材和若干化工产品的产量有所下降,若干科研项目由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集中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生产技术大协作中断,新产品试制进度受到影响。如电子计算机的试制工作,原拟争取明年完成,由于设计单位停了三个多星期,可能影响计划进度。基本建设的设计工作大部分停顿,也可能影响今年基建计划的完成。此外,在外贸方面,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毒素的商标图案和有关产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工人提出了很多意见。但是在问题还未研究解决好,就已出现了个别工厂不愿生产、某些外贸干部不愿收购、出口的情况,需要研究解决。

报告分析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掀起以后,有关经济部门及基层企业的领导干部没有在集中力量抓革命的同时,妥善地安排力量抓生产、抓业务,对生产和业务工作有所放松;有些干部存在患得患失情绪,不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不敢谈生产,不敢抓业务,怕抓了生产、业务会被批评为政治不挂帅,冲击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虽然仅是苗头,但是如果不及时扭转,对整个建设事业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和问题,报告中提出了有关措施:主要是把

文化大革命作为推动各项生产业务工作的巨大动力，大胆领导，敢于抓生产，敢于抓业务；在组织上从市到基层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专门班子，形成上下一条线，在各级党委统一部署下，负责抓生产抓业务；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同时抓好设备维修工作；要努力完成出口援外任务，少数产品商标图案有问题，要积极，设计新的商标图案逐步代替，在没有新的商标图案代替以前也不要轻易停止生产；科研项目和新产品试制设计工作要大力抓紧。对担任科研项目和新产品试制、设计人员，只要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点对象，应稳定他们，教育他们一面参加运动，一面认真工作，积极改造自己。

7月19日，中央向全国各省、市批转市委的这个报告。中央批语指出：“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当前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事故增多、某些产品产量下降和有些科研项目生产技术协作中断等情况，需要注意研究解决。其中所提四项措施，各地可参照办理。”

总之，“文革”初期的二三个月，从上海的运动来看，由于市委和各级党委的努力工作，局面还是比较平稳的。到7月底8月初止，全市各条战线绝大多数单位仍处在所谓“继续深入地揭发问题”的阶段，只有极少数单位开始转入所谓“重点批判斗争”。各系统、各区对整个运动的步骤和时间安排也曾有所设

想。如市宣传文化系统把整个运动时间预定为8到10个月，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1）大鸣大放阶段；（2）批判斗争阶段；（3）群众自我教育阶段；（4）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阶段。南市区计划学校里运动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6月初到8月初，认真学习文件，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问题；第二步，8月初到8月底，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第三步，从9月初到中旬，开展教育制度的辩论，进行教育改革；第四步，从9月中旬到月底，个人小结，共同提高。闸北区的计划前两阶段与南市区同，第三阶段定为自我教育，第四阶段组织建设。

当时在上海恐怕谁也想不到运动风云突变，波涛险恶，一场灾难降临持续达十年之久！

三、八月后的运动急速升温

1966年8月以后上海的“文革”形势，和全国一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表现为运动的急速升温。8、9月份突出的事件：撤销所有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十六条》的公布施行，以及围绕全会召开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红卫兵扫“四旧”和大串连，学校停课闹“革命”；乱批乱斗和各种过激行动迅速蔓延成风，不可遏止；市、区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10月起普遍地开始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各种正常秩序破坏殆尽，全市大乱之势终于形成。

（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和空前规模的“运动”群众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7月27日至30日，召开了预备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参加会议列席全会（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因病未能出席）。

8月1日，毛泽东复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支持”，并要求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是红卫

兵运动的开始。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目标明显地首先是针对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的，同时也涉及到邓小平。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都迅速地传到了上海。但不是通过正常的传达渠道，而是由一些大中学校师生辗转传抄过来的。当上海的大街小巷陆续发现那些据说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大字报时，上海各级党委懵然不知。8月12日止已有同济大学、外语学院、轻工业局半工半读学校等一批学校党组织和各区区委纷纷打电话或派人到市委办公厅，询问这些大字报内容是真是假？如何对待这些大字报？当时市委办公厅也搞不清楚，只能答复：毛主席的话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能错，要以中央正式文件为准。对那些大字报，要说服原来张贴者拿掉，或予以覆盖。

市委遵照中央的通知，于8月5日召开全市各系统17级以上干部和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师生代表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播放中央负责同志7月29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宣布了撤销党委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在邓小平、周恩来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

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个万人大会后，又由市委各部委、各区区委分头召开会议，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的全体师生员工、中等学校全体教职员和较高年级学生收听讲话录音。通过这些会议，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内容，特别是关于撤销党委派往学校的工作组的意见，“一竿子到底”迅速、直接地为各级干部和学校师生所知晓。由于撤销了工作组，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大肆煽动“一切权力归‘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竭力助长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

于是，市委和各区、局党委相继撤销了派往大中学校的“文革”工作组。而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等系统结合四清运动开展“文革”的单位，那里的工作组暂时未动。但不久以后所有工作组包括四清工作组都被诬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迫撤销。许多工作组的撤离很不顺利，主要干部甚至一般队员都被迫作检讨、被揪斗。特别对于市委和区、局党委来说，派出工作组这件事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成为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罪证”之一。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8月9日报纸以套红标题全文公布。

从8日晚上起，上海街头就出现了络绎不绝、通宵达旦的游行队伍。他们少的几十人、多则几千人——如时代中学1800余人，第一医学院2000余人，交通大学6000余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呼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来到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送来了大量的大红喜报和自己的决心书。

8月12日，上海各报用套红大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贺中央公布关于“文革”的决定（即《十六条》）的首都群众。8月14日报纸上又以套红大标题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8月18日，首都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第一次是接见了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又分批会见首都全体红卫兵代表。还接受并佩带了一个女红卫兵献给他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运动从此风起云涌，登上了“文革”的政治舞台。8月19日，上海各报都以宽幅套红的大小标题，报导了毛泽东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消息。

8月19日下午，上海百万群众冒雨在人民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自从8月8日入夜以来，上海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就没有间断过。不仅是大、中、小学的师生，而且机

关、工厂、商店、各行各业的群众都发动起来踊跃参加了集会游行活动。人们争先恐后表决心，送喜报，红旗如林，人流如潮，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载歌载舞，口号声响彻云霄。连续几天来，已有120多万人次涌上街头。到19日下午又举行百万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达到了最高潮。

(二) ^老红卫兵的扫“四旧”与大串连

关于红卫兵走上上海的“文革”舞台，我们准备另列两章（北京红卫兵南下和上海的红卫兵运动）作比较详细的记述。但是在这里，也必须提出来作简单的介绍，因为红卫兵的出现对于八月后运动的急速升温有极大的影响。

红卫兵本来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和野心分子（其中不少人也是受到林彪、江青等人教唆愈变愈坏的）外，他们都是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响应党的号召的。他们后来做出了大量的践踏宪法和法纪的破坏性行为，实实在在是被林彪、江青一伙人愚弄和利用了。而且，归根到底他们最终也成为“文革”的受害者。当年卷入红卫兵运动的广大青少年，绝大多数经历了由狂热走向迷惑不解到痛苦的反思等过程，后来逐步认清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教训极为深刻。现在他们步入中年的成熟的年代，绝大多数依然是真诚地拥护党，成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的骨干力量。

红卫兵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是从所谓上街扫“四旧”开始的。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的讲话中，提到“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他和“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煽动、怂恿下，从20日起，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首先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的行动立刻受到“中央文革”控制的宣传舆论方面大力的支持和鼓励。22日，新华社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首都红卫兵上街猛攻“四旧”的新闻，《人民日报》当天发表《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第二天即8月23日，上海的红卫兵闻风而动，上街闹“革命”。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上海红卫兵的扫“四旧”也从改路名、换招牌、剃大包头、剪小脚裤子等形式上的革命化开始，迅速被引导去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劈棺材、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进而取消公私合营、勒令停付定息、禁止个体户经商贩卖、解散政协和民主党派，又进而大规模残酷地迫害所谓“黑六类”，打人、抄家，私设公堂、驱逐回乡，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所谓“红色恐怖”的气氛。而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大革文化命”的破坏行动，却颠倒地又被吹捧为红卫兵的“功勋”。红卫兵的头上被套上了“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人民日报》8月30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桂冠，报刊上一片“好得很”的鼓噪声，激励红卫兵

向旧世界(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整整17个年头了)进攻、造反,所向披靡!

差不多与上海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同时,即从8月下旬起,北京与江、浙等省的红卫兵,纷纷来上海搞串连活动。尤其是首都南下来上海的红卫兵,他们有比较明显的“煽风点火”“传播革命造反经验”的目的。他们中有些头头是受江青等人所指使,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的。他们到上海以后,除了参与社会上扫“四旧”抄家等活动外,矛头直接对准了上海市委。8月30日,他们冲击了市委为欢迎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31日、9月4日又连续冲击市委机关,气氛十分紧张。他们借口市委包庇常溪萍(关于常溪萍遭受诬陷问题,将另列一章作较详细的记述),与上海大专院校造反派相结合,企图打开缺口,搞垮市委。北京红卫兵大规模来上海有三次,他们中有些人被江青、张春桥等所教唆、利用,在上海发生的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中,例如串连一些工厂的“造反派”策动成立“工总司”、“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打倒市委大会”,直到所谓“一月风暴”全面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都起着恶劣的作用。

(三) 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的扩散与加剧

这是8月以后运动急速升温的一个显著标志。这种乱揪乱斗的情况首先出现在大专院校,并迅速地向各方面扩散。

8月4日下午2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在文史楼召开批斗该系的一位教授大会。会上,给这位教授戴上高帽,四五百学生簇拥着,鸣锣游斗到该校共青场。与此同时,各系学生也纷纷把本系的“批斗对象”戴上高帽拉到共青场司令台上跪斗。晚饭后各系各单位又继续批斗了一批人。这一天,全校共揪斗194人,占全校教职员11%。有一人不堪凌辱折磨而死,一对夫妇缢死,二人自杀获救未死。

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斗鬼风”。5、6、7三天,有49名专家与干部遭到了残酷的揪斗。被斗者都戴上高帽子,脸部用墨汁涂黑。7日晚校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听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录音。刚听完录音,数学系四年级少数学生突然发起要斗该系讲师叶某等人。一些学生把绳索套在叶的脖颈上游斗。化学系学生扣住教授赵丹若不让回家,8日晨7时斗了赵丹若,戴高帽、罚跪、脸上抹黑、游街、挨揍。斗争会开了1小时20分。赵当时已70多岁,把赵送回宿舍时已发现他支持不住了,经保健科医生抢救后送上救护车已气绝。全校8日又揪斗了7人。

8月8日上午,上海财经学院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播放中央负责同志讲话录音。播放结束后,一些学生上台高呼口号,点名叫一些领导干部和教授们站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顿时会场一片混乱,各系学生纷纷跟上,临时做起高帽子来,来不

及做就以废纸篓、铅桶、痰盂代替。戴高帽的愈来愈多，后被“牵”往操场跪下。那时出现了打人、顶砖头、揪耳朵、罚在地上爬以及绳索捆绑等现象。据统计当时被戴高帽的有95人，占全院教职工总数的19%。

8月9日上午，同济大学城建系40多个学生把校党委书记从家里揪来，戴上用西瓜皮做的帽子，身上贴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纸条，在校园内游斗。许多学生又去揪其他人，到11时止，被揪来游斗的有副校长等15人。

8月11日傍晚，上海体育学院发生骇人听闻的“斗鬼”事件。当晚被抓来的有24人，其中正副教授10人，占全院教授总数60%，讲师2人，教员10人，职工2人。被抓者都遭拳打脚踢，脸上身上浇了墨汁，涂上浆糊贴纸条。在食堂前面的大草坪上，叠起桌子，强迫被揪斗者跪在上面示众，又逼迫他们在地上爬，从板凳下钻过，从傍晚一直折磨到深夜。

同日，上海外语学院有80多人被揪斗，在他们身上浇墨汁，涂浆糊贴侮辱性字条，还逼迫他们在煤屑跑道上爬行。

8月12日、13日，上海医科大学也刮起“斗鬼风”，两天内被揪斗的达123人，都被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有的戴了高帽子，有的脸上涂了墨汁，不少人在游斗中挨了打。之后，有97户被抄了家。

8月上中旬，上海科技大学出现对所谓有问题者戴高帽游

街之风。8月15日游斗了26人，其中部分人被关入“牛棚”劳动。

8月25日上午，上海铁道学院运输62(1)班学生发起搞“破四旧、焚反动书籍”活动。他们冲进图书馆等处，抄出几百套中外文艺书刊以及一些旧唱片、塑像等，摆在第一教学楼前地坪上展览，然后浇上汽油，点火焚烧。他们在火堆前下风口摆上桌凳，把被强迫劳动的12名干部拉到火场，逼迫这些干部站在桌凳上受烟熏火烤。他们不断地用棍子拨火，使火舌扑向这些干部。他们又将灰烬撒向这些干部身上，抹到干部们的脸上，涂成黑脸，还把这些场面拍摄下来。这就是当时所谓“黑帮、黑货展览会”。

以上只是大专院校乱揪乱斗以及各种过激行为的少数事例。

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很快从大学生“传染”给他们在中学念书的弟妹们。少数中学生6、7月份曾发生过打人、戴高帽等过激行为，现在变本加厉地蔓延开来。据不完全统计，仅8月13、14、15三天，各区又有30多所中学发生打人、罚跪等“武斗”情况，共斗了114人。8月13日虹口区四平中学部分学生，强迫校长和教师23人在操场上爬行，有17人被剃了“阴阳头”（即剪掉一半头发）。同天晚上，普陀区安达中学3百多师生开会，斗了11位教师。学生们将畚箕套在被斗者头上，并向

他们掷石块。有一个被斗者头颈上套了草绳，两边有人用力拉，把草绳也拉断了。这时，学生中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这样做大快人心；一种认为这是武斗，不好。两派学生打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从13日晚上7时一直闹到14日凌晨3时。上海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9名所谓“重点对象”，他们被“勒令”每天进校门时要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站立5分钟，然后爬到办公室，谁爬不好就敲谁的屁股。

这股乱揪乱斗风又迅速向其他基层单位扩散。8月13日上午9时半到11时半，天马电影制片厂有37人被罚跪、戴高帽子。起因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五年级有个学生打电话到天马厂，说他们昨晚看了电影《球迷》，认为这部电影有问题，是“毒草”，感到很气愤，要送大字报到厂里来，声讨编导徐昌霖的“罪行”。8时半师大学生到厂宣读大字报，天马厂群众就把徐昌霖带到大门口，戴上高帽子在厂里游斗，又拉到搭在广场上的高台上罚跪。随后，许多群众又把陈鲤庭、白杨等36人拖来，罚跪在高台上，经驻该厂的“四清”工作组（当时尚未撤）做了工作后，才让跪着的人回去。

这股乱揪乱斗风也吹进了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有几个人，8月6日去复旦大学“取经”，8月7日向全所介绍复旦大学“斗争经验”，说复旦学生斗“牛鬼蛇神”是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往脸上身上倒墨

汁抹黑。在该所少数人发动下，决定也要这样干。7日下午4时，在食堂斗了副总工程师等7人。有人不肯上台，就边揍拳头边推上去；有人不肯低头，就在脖子上挂大砖头。又要他们跪在地上喊“我是牛鬼蛇神”。那位副总工程师被戴上高帽，手敲小锣，在所内游斗。不久就精神失常。

8月下旬，工业、交通、基建等各基层工厂和单位，普遍发生戴高帽、游街等情况。据不完全统计，8月24日一天，仅造船、冶金、电业三个系统的基层厂，被戴高帽游街的就有417人。其中中华造船厂被迫戴高帽游街的有党委书记、厂长、政治部主任以及私方副厂长等近2百人。

这股风也吹到了机关。8月24日上午9时，市公安局在王维章（后为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策动指挥下，把市委常委、局长、党组书记黄赤波等揪到建国西路75号“看大字报”（实则是进行批斗）。从上午11时至下午4时45分，在市公安局福州路大院内进行“斗争会”，被斗的有40多人，罚跪，戴纸帽或畚箕、痰盂，挂“牛鬼蛇神”的牌子。开始是一个一个地斗，以后就一次揪出六七个一起斗。消防处长被剥掉外面衣裤，只穿短裤背心挨斗。招待所副所长被连斗三次，并被打得脸青鼻肿，鼻子淌血，衣服撕破。在大院里围观的有三四百人。参加斗争会的有不少是政法干校的学生、外单位来的报喜队以及外单位来调查材料的干部。市公安局许多干部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但

不敢出来劝阻，怕做“保皇党”。有一位副科长（女）在会场仅说了一句“不要武斗”，即被人捉住要斗她，刚拉上台就昏倒了。

这股风也波及到地区里弄。如9月初，普陀区胶州路福森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对里弄干部心怀不满的人，擅自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筹委会”。揪斗了里弄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他们私设公堂，对治保主任刑讯逼供，并把他关押在一间空房内达四天之久。这是最早揪斗里弄干部的一个事例。

到10月、11月份，乱揪乱斗里弄干部越来越多，有些坏分子、社会渣滓浑水摸鱼，对里弄干部罚跪、殴打、剃阴阳头，甚至疯狂地进行毁灭性的抄家，肆意摧残。

社会上不断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据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发生自杀事件704起，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后自杀的446人；被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不堪凌辱自杀的169人；大字报多、思想紧张自杀的18人；其他原因29人；原因不详的42人。

进入9月以后，揪斗基层领导干部的事件愈来愈多。同时，对区、县、局以上党政机关的冲击也日益严重。以冲击各区委机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共有2百多起，参加者7千多人。这些前来区委“上访”“造反”的人情绪激昂，表现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姿态，有的冲进区委机关后到处乱窜，寻找主要领导干部，纠缠不放，有的则静坐、绝食、甚至殴打机关

工作人员。当时他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下列几方面：（1）要求区委签字同意罢他们所在的基层单位领导干部的“官”；（2）从基层单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到区委来“找黑线，追后台”，要求看区委机关的大字报；（3）追查运动初期的一些做法是不是区委布置的（如有些学校强调写小字报、开座谈会，对大字报要审查底稿统一编号张贴等）；（4）要求所有“红五类”子弟都去北京串连；等等。

由于以上情况，在9、10月份，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不先后转入“游击”甚至“地下”状态。领导骨干分成了一、二、三线，即由少数第一线的干部驻在机关，出面与前来提各种要求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交道。如第一线同志不能解决问题或被围困而不能行动时，还有第二线的领导同志出来应付日常某些工作。主要领导干部处于第三线，其办公地点是保密的并经常变换。这种极不正常的艰难岁月，一直延续到年底各级党委机关的彻底瘫痪。

（四）形格势禁，各级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无能为力

对于8月以后乱揪乱斗现象的加剧，市委和区、县、局等各级党组织都曾多方面做工作，企图加以约束和引导。例如8月22日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大会，曹荻秋在会上阐释《十六条》精神，反复强调：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与党组织的关系上要具体分析几种不同情况，但又必须是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

不要党的领导；确定一个对象是“牛鬼蛇神”，要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并要查证核实材料，再作出最后结论；对于少数派问题，少数不是固定不变的，但不论多数派或少数派，都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同学之间，都不要互相扣“保皇派”的帽子，等等。8月24日，市委书记处曾作了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下裤子，不要拦汽车等十条规定，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宣传贯彻。8月25日，市委知悉复旦大学1千多名“造反派”学生到上海戏剧学院进行串连（这是全市造反派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行动），次日曹荻秋亲自赶赴复旦，参加那里的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劝导学生着重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去干涉其他单位的运动，等等。在市委的领导下，各区、县、局党委也作同样的努力，特别是在8月份混乱现象初起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大都亲自去发生事端的单位，进行宣传、协商、劝导的工作。

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反对者是振振有词的。例如上述8月22日大会后，就有不少反映，有些学生指责曹荻秋对戴高帽子问题只说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首先肯定是“革命行为”，没有鼓励群众“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说“打人不打人”问题要有阶级分析，而曹荻秋“笼统地讲不要打人，缺乏分析”；说红卫兵“威风凛

凛”，曹荻秋报告中却根本没有提到！等等。8月26日在复旦大学的学习《十六条》讲用会上，就有赵基会等学生上台与曹荻秋进行所谓“辩论”，纠缠不休。

这些努力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却产生了始料不及的结果，成为市委和区、县、局各级党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要把“文革”运动置于党委领导之下，使运动有步骤、有计划、讲究政策地展开是行不通的。市委和各级党委越是要加强领导，讲究政策，企图遏止或缓解那象狂飚一样席卷全市的乱揪乱斗以及打人、抄家之风，就越被指责为“划框框”“定调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全会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这些话显然是告诫地方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不要企图对运动有所领导或施加影响。而且指出，这是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各级党委的一切正常行动，都会被部分群众扣上“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怕出乱子”“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制造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做官当老爷、瞎指挥”等等帽子，而受到批判和冲击。

形格势禁，地方各级党委越来越动弹不得了。奇特的“天下大乱”的形势终于人为地造成了。

四、北京红卫兵的三次南下

红卫兵组织，是“文革”中的产物。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先后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理论”。大字报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革命者就是孙猴子”，因此，“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作为一种集团力量，步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教职工代表，表

明他对红卫兵活动的全力支持。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连活动。

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自“八·一八”大会后开始向上海“进军”，人数多、时间相对集中的有三次，在上海，有人称之为北京红卫兵的三次南下。

（一）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南下

1966年8月20日以后，北京红卫兵陆续到达上海，进行所谓革命串连。据市学联的不完全统计，到8月27日止，来自北京和其他外地的红卫兵共955人。以后逐日增加，到9月初，到沪红卫兵有数千人之众。

这一批南下的红卫兵是分散的，有的是火车上相遇后才组织起来的。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和统一的名称。如北京红旗红卫兵战斗小组，是由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一些学生组成，后来又有北京赤峰中学、北京一〇一中学等一些学校的学生参加。他们自称是造反派，到上海后与各单位造反派联系，搞串连活动。

第一批南下的红卫兵到达上海后，制造和引发了一些事件，在社会上震动很大。

（1）冲击市委8月30日召开的欢迎大会。

8月下旬，北京及其他各地的红卫兵陆续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曾经分别接见过几批。因为要求接见的人很多，市委决定于8月30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欢迎北京来沪串连的红卫兵，市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与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约3000人举行会见。

会上，曹荻秋代表市委热烈欢迎北京同学到上海来进行革命串连，向他们介绍上海“文革”的一般情况，解答了一些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最后，曹荻秋建议：为了更细致地解决和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详尽地听取他们对市委工作的揭发批评，深入地交换意见，请他们推派代表，在大会以后开座谈会，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三次，或者更多次。

这时，一些红卫兵纷纷递条子坚决要在大会上发言。书记处的同志决定让北京红卫兵发言。他们怒气冲冲地说在上海进行串连时遇到的种种阻力：有些学校传达室的人员向他们要介绍信；公共汽车售票员要他们买票；到处有上海的一些群众围住他们辩论；他们要见市委负责同志十分困难；等等。到第三个人发言时，本市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突然抢上主席台发言，说市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台下，有的人要他发言，有的人不要他发言，会场开始骚动。一个女红卫兵冲上台，大声疾呼：“由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来维持秩序，上海同志下台去！”为了平息混乱状态，部分工作人员手挽手站在主席台前的栏杆处。

北京来人有的大声指责：“你们想制造反革命事件吗？”“你们保卫谁？”“你们是保皇派！”还有人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有流血牺牲的准备！”这时，上百个北京红卫兵包围了主席台，把工作人员一个个赶下台，还大叫：“滚！滚！滚！”北京红卫兵冲上主席台后，包围了市委书记处的同志，有的人挥舞双手，指着曹荻秋鼻子问：“你为什么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中央取消工作组的决定，你们为什么不象北京那样贴到街上去？”有的红卫兵拿着一张纸依次查问台上六位市委书记的姓名和家庭出身。最后，由北京的一个女学生自任执行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发言。发言的人继续讲上面所说的种种“阻力”，并把这些“阻力”归罪于市委的阴谋策划、煽动挑唆。说市委的“十条”^①规定是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违反《十六条》精神的，是“臭十条”。有的对市委提“强烈抗议”，有的说“市委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要求“改组上海市委”，情绪十分激昂，有人甚至谩骂。这样，上海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的会议，变成了部分北京红卫兵声讨市委的会。

会议快结束时，有二三个人拿着纸、笔，“勒令”曹荻秋写

^① 这是1966年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内容。会后用电话通知各区、县、局，未形成正式文件。据有关同志回忆，有以下十条规定：1、不准抄家；2、不要破坏公物；3、保护书信（？）；4、不搞外侨；5、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下裤子；6、不拦汽车；7、允许乘三轮车；8、不准破坏建筑物；9、（缺）；10、不烧档案。

出两个上海最大的资本家的名字，声称“让北京的红卫兵斗给你们上海人看看！”

到晚上8时1刻，那个任大会执行主席的北京红卫兵宣读了五条“必须执行”的决议：要求8月31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宣布撤销所谓“臭十条”；报导这次会议情况，刊登他们带来的《毛泽东主义万岁》等传单；成立大会筹委会，另找时间再开大会；勒令北京来的“黑五类”^①子弟滚回去；上海“红五类”^②子弟外出去串连。随即宣布散会。

(2) 冲击市委机关。

8月30日大会后，连续发生数起冲击市委机关事件。

8月31日上午10时后，北京一些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上海红卫兵100多人，来到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口，要见市委负责同志。他们责问为什么没有执行30日大会上宣布的五条“必须”执行的决议？一定要见曹荻秋本人。有的并说：“在10分钟内找曹荻秋出来，否则就要动武了！”当时曹荻秋正在同另一批北京来的红卫兵谈话，就让几位自称是代表的北京学生进来，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和市委常委、市委监委副书记秦昆接见。宋季文、秦昆问北京的学生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们不肯回答，吵骂着坚持要门外的学生一起进来，并对

^① “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人员。

^② “红五类”，指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五类人员。

门外的群众说“市委不肯接见我们”。这时，一部分北京的学生往市委机关大门里冲，有100多名北京学生敲碎门上玻璃，冲进市委机关。这些学生冲进传达室后，又继续往里冲，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企图拦住他们，发生了扭打等混乱情况。一些学生冲进院子以后，直奔四号办公大楼，冲到二楼阳台上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要自由！”以后由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把学生劝入会议室，仍由宋季文、秦昆接见。一些北京的红卫兵站在桌子上，指着宋、秦两人说：“你们市委负责同志不接见革命群众是不革命，是黑帮头子”等等，并提出派车辆送他们到电报局往北京拍电报，派飞机送他们回北京等要求。当时，机关门外集聚的过路群众越来越多，有的和北京红卫兵辩论。为防止可能发生冲突，秦昆向群众重申了市委的态度，宣布北京学生到上海来是搞革命串连的，上海工人、学生应该给予热烈欢迎；有不同的意见可进行平等的讨论，不要争吵；市委门外的大字报，允许北京的同学拍照；不能动手打人，如果有人动手，上海的同学、同志一律不要还手等四条意见。以后，群众情绪逐渐缓和。进入机关的人也相继散去。

9月2日以后，前来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周围的工人和学生不断增加，为了防止学生再次冲入，市委组织了三四千工人到市委机关门前和周围维持秩序。9月3日上午，北京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工学院、北京八中、北京八十七中、育

英中学以及上海第一医学院等院校的200多人来到市委机关，以后又增加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学生100多人，要求市委负责人接见，并提出要为北京来沪学生调派广播专用车、解决印刷传单等问题。当天，曹荻秋、杨士法、张祺等负责同志分别在市委机关办公楼、静安区文化馆、市委接待站等处接见了5批同学等110人，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一一作了说明和解释，但学生拥在市委机关门口不散。

9月4日上午来市委机关门口的学生增至近千人，并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设立了广播台，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除原来要求接见，要广播车外，又提出了和“中央文革”江青通话的要求。有些人并高喊“要武斗，不要文斗”、“先武斗，后文斗”等口号。多次发出“最后通牒”，要市委机关的扩音喇叭停止广播，要曹荻秋“滚出来！”学生一次又一次向市委办公大楼冲击，和工人发生扭打。到中午，有100多名北京红卫兵打碎市委机关办公楼临街的玻璃窗，踏着人梯或沿着落水管攀爬冲进市委大楼。在冲突中有一些人受伤。晚上10时，曹荻秋在市委办公楼门前接见了北京学生和上海群众，对来沪的学生表示欢迎，并欢迎上海工人、农民、学生“炮打司令部”，揭发市委存在的问题，最后再次强调了北京、上海的学生要团结起来。

9月5日上午，市委劝说大批上海的群众离开市委机关门

口，让北京来的学生、上海各校部分学生进入市委机关。进入市委机关的学生推选了主席团，决定下午3时在机关大礼堂召开大会，要曹荻秋到会讲话和答复问题。因布置会场和联络脱节，曹荻秋5时到达会场，这时北京学生情绪激动，大骂曹荻秋“臭架子大”、“故意迟到”。5时3刻会议正式开始，曹荻秋在讲话中，强调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上的问题，并就北京学生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以后，由北京学生发言。当时，自发聚集在市委机关周围的上海工人、学生等越来越多，延安西路华山路一带人头拥挤，交通堵塞，人声嘈杂，气氛紧张。一批群众提出要听取会议的实况广播，否则就要强行冲入市委机关同北京学生辩论。经大会主席团同意，把会议实况向门外广播。冒雨坐在马路上听广播的有上万人。晚8时会议结束后，市委机关行政部门调派了20余辆大客车将北京学生送回住地。

(3) 到处与上海的红卫兵等激烈辩论。

北京来的红卫兵几乎是一下火车就说上海市委是保守的，是右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没有几天，又提高调门说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写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要揪出市委内“黑帮”。北京红卫兵这些说法，在上海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当时是不同意的。8月30日北京红卫兵把市委为欢迎他们而召开的大会变为声讨市委的大会后，曹荻秋

曾说“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无这种思想准备”。以后连续几天冲击市委机关，这些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于是，凡有北京红卫兵行踪的地方，到处都发生激烈的辩论场面。争辩围绕着北京红卫兵的行动是否符合《十六条》有关规定进行，但核心问题是市委（包括各级党委）对“文革”领导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市委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甚至“已经烂掉了”？对市委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炮轰”？

由于北京南下红卫兵大多住宿在上海各大专院校，他们又主要去大专院校进行“革命串连”，因此，在各大专院校普遍发生激烈辩论场面。这里举几例：

在上海机械学院。8月26日至28日先后有北京机械学院48人和北京钢铁学院二人住进该院。他们宣传：“北京的学生都往外面跑。”当上海的同学向他们宣传要搞好本校的“文革”时，他们说：“你们受上海市委的毒太深了。”又说：“北京扫四旧，不是口头上，是行动上的，凡是旧社会来的，统统摧毁。”上海学生即问：“旧社会的房子是否也都砸烂了呢？”他们说：“有用不砸，没用都砸了。”当时就议论纷纷，各持己见。

在同济大学。8月26日上午，清华大学三名学生在数理系宣称，“上海市委有问题，问题很严重，你们为什么不揭上海市委问题？上海市委同意批斗王涛（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是为自己打掩护。你们应该到全国跑跑。”27日上午，北京机械学院五

六名学生在走廊看大字报，向同济的学生说：“我们是来点火的，上海市委的运动冷冷清清，不像北京”。当场与持不同意见的同济学生争辩。

在华东化工学院。8月30日文化广场大会情况及8月31日部分北京学生冲市委机关的消息传到学院以后，大多数师生很气愤，纷纷找在校的北京机械学院、政法学院学生辩论。9月1日，北京机械学院97名学生已买好了车票准备返京。化工学院的学生认为北京学生在学校中宣传的情况与事实真相出入很大，要求他们澄清事实，坚决不让他们离校，甚至返京学生已经上了汽车，也被拉了下来。这样又在校内辩论了两天。

在华东师范大学。由于对市委委员、市委教卫部部长、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的看法有分歧，引起校内有3000余人参加的一场大辩论。北京的同学说：“常的性质早就定了。”师大的同学说：“你摊具体材料，不然我们怎么相信你们？”争辩十分激烈。

在第二医学院。8月30日晚，住在那里的北京400多名同学提出要在5小时内拆除二医的旧式大门，引起二医1000多名学生的不满，双方展开激烈辩论。

在华东纺织工学院。9月1日，北京机械学院的学生召集住在那里的北京学生会议，邀请上海科技大学和华东纺织工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共700余人。由北京学生讲了8月30日文化

广场和8月31日市委机关门前发生的“事件”经过。有的激动地边讲边哭，说：“在北京，中央首长接见我们，到上海后，市委不仅不接见我们，还在市委门前组织人围攻我们”；“有的同学被打伤，皮肉破裂，鲜血在流，连骨头都露了出来，造成流血事件。”所讲情况，有人相信，有人不信。因有不同意见，台下议论纷纷。不欢而散。

(4) 宣传“武斗”“红色恐怖”，制造打人事件。

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后，不仅口头上宣扬武斗，并制造了一些打人事件。

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华东师大宣称“我校打死四个人，毛主席还支持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学生说：“可以戴高帽子。”并说：“康生××讲可以戴高帽子。”师大学生讲，我们不相信，我们根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办事。

住在第二医学院的北京学生说：“《十六条》是框框，老子不管它几条，还要加一条（指武斗）”。他们嘲笑二医一些红卫兵思想上被《十六条》框住了。辩论中有的甚至讲豁了边，说：“你们给毛泽东思想框住了。”这些话引起二医学生的极大愤慨。在辩论过程中，二医有16个学生被打，北京的学生还说：“我们就是要武斗”，“我们知道上海是不行的，所以都带了皮带来”，“你们拿《十六条》作为档箭牌”。北京的学生扬言要发动在沪的3000名北京红卫兵来二医“镇压”。

住在华东纺织学院的北京红卫兵，宣传“红色恐怖万岁”。

8月27日下午，北京第二十八中学三名来沪的红卫兵支援上海中学的学生去斗地主。到达梅陇公社朱行大队后，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让这些人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并说“我们北京打死五类分子不算犯罪”。上海的学生也跟着打，结果打死一个地主婆，另有二个地主分子受重伤。事后，北京三个学生说：“我们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支持我们打的，我们要马上写信回去报喜。”

9月1日，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到杨浦区卫生学校，说学校领导有问题，拉住支部书记、学校负责人就打耳光，用皮带抽，用皮鞋踏，前后打了2个半小时，二人都被打伤。

同日，有11名北京学生到吴淞中学串联，他们说：“北京打人不稀奇，打死的已有100多人”，还扬言要斗曹荻秋。吴淞中学学生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引起冲突，北京同学打了吴淞中学的二名学生。

第一次南下的红卫兵，有的逗留到第二次南下的红卫兵到达后，与他们一起继续活动，有的则返京或到外省市串连去了。

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促使上海红卫兵迅速分化。大体上分化为两派：一派人数较多，比较注意党的方针、政策，比较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不同意全面否定上海市委；一派人数较少，

他们赞同南下红卫兵的主张，直接造市委的反。9月6日，市委写出《市委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要各基层组织代抄成大字报，在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中张贴，“引火烧身”；市委又检讨了组织工人保卫市委机关“尽管目的是为了维持秩序，事后也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使工人介入了学生运动，是错误的”。此后红卫兵中的分化加剧，开始了由多数派向少数派倾斜。

(二)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1966年9月10日以后，北京红卫兵开始第二次南下。这次南下，是根据前面讲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5日《通知》精神有组织地进行的，人数约有数万。来上海红卫兵的统一名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最高一级为总部，下分纵队、支队。总部驻在上海体育宫。大批红卫兵出发前，9月10日左右先派首都红卫兵总部南下先遣队来沪，从9月13日起开始进行串连活动。

对这一批北京南下红卫兵以及同时来上海的其他省、市红卫兵，市委一再表示热诚的欢迎。总部人员到达时，有关方面派出车队迎，摩托车开道。对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区、县、局各级党委尽可能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然而，在“文革”总的方针指导下，他们又必然地以更强烈的“左”的面貌出现，到处煽风点火，制造“红色恐怖”，抄家、武斗升级，还制造了一

些涉外事件。

(1) 进行所谓的社会调查。

首都红卫兵总部南下先遣队于9月13日和上海部分工人、学生分别开了座谈会。工人座谈会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召开，杨富珍、王林鹤、祁志超、程德旺等40多名工人参加；学生座谈会在上海市“学联”所在地召开。他们在座谈会上提出如下问题：(1)“8·30”、“9·4”事件的经过情况如何？(2)上海如何造反、抄家的？被抄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出的东西送到那里？被抄对象如何处理？(3)上海的红卫兵是如何组织的？是否贯彻阶级路线？红卫兵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关系如何？(4)上海是否也讲阶级路线？如何对待“黑六类”？^①(5)上海破“四旧”的情况怎样？参加座谈的上海老工人、学生都根据他们看到的事实作了介绍。对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先遣队解释说：北京的阶级敌人报复很厉害，我们有些红卫兵被敌人杀害了，所以红卫兵就警惕了，也打死过一些坏人。为什么北京要这样强调出身成份？说因为过去受“黑帮”的压迫太深。

南下兵团总部下属各纵队到沪后，也都进行了一些“调查”活动。如首都南下红卫兵第十纵队到沪后，在黄浦区里弄街道活动过的地点有21处，其中12处是进行访问和调查。他

^①“黑六类”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等六类人员。

们调查的问题大体上是：群众对上海市委怎么看法？市委对街道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指示？街道有什么打算？了解街道的基本情况。主要了解阶级状况、政治情况。了解地区“黑六类”的情况。他们问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他们认为，上海对“黑六类”太强调文斗了，介绍了北京对“黑六类”监督改造的情况。了解里弄干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况。有的红卫兵说：“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贯彻阶级路线的情况。”

(2) 四处煽风点火。

南下兵团在经过调查后，即到各单位进行宣传，说上海的框框太多，太强调文斗，实际是“文而不斗”。第七纵队“冲、闯、杀小组”（北大学生）在静安区第一女中说：“坚持文斗是反动观点，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北京已杀了二三千人，就是要红色恐怖，不然，还有阶级斗争观念吗？”他们还主张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

有些人宣传所谓“‘8·30’事件”等是上海市委镇压北京学生的法西斯暴行，为此散发了传单。他们还宣传北京的学校领导都靠了边，积极鼓动冲击学校党支部。9月19日下午，黄浦区金陵中学一下子涌进了280余个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说要在金陵中学蹲点，把“这个保皇派的顽固堡垒”搞垮后再

回北京。

北京红卫兵积极宣传阶级路线，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召开红卫兵大会，介绍北京情况，要红卫兵在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做主人。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昌平中学去了8个北京红卫兵，斗了高三（2）班10个所谓“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你是否混蛋？”（宣传“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①）直到都承认才罢休。以后又斗了高三（3）班的“黑六类”子弟。

南京工学院的两名学生到上海电力学校“取经”，对接待的人说：“上海冷冷清清，无经可取。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都烂了，你们为什么不行动？”又说：“我们学院党委是靠边的，我们要怎样就怎样。你们这里到北京去还要选代表，我们那里说走就走。”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到新丰印染厂自我介绍说，来厂有三项任务：一、点火。我们到上海来就是放火的；二、准备发《告全国革命群众书》；三、宣传《十六条》。说戴高帽子、打人都不算武斗，而是文斗。

（3）宣扬“红色恐怖”等极左思潮。

^① 反动血统论是“文革”初期在部分红卫兵中流行的一种“左”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血统”有高贵、低贱之分，“血统”好坏决定个人的一生。当时有一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为这种理论反动本质的集中表现。

9月23日清晨，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和本市部分学校的红卫兵拥上南京路进行宣传，他们张贴对联、标语和大字报，沿途用扩音喇叭呼喊“阶级路线万岁！”等口号。他们说：“党的阶级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

他们宣传“红色恐怖万岁！”说：“红色恐怖是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免受剥削者的侵害，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恐怖是一个阶级的恐怖，是对一个阶级的专政。”并张贴对联：“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继人伏妖息猛镇猛斩”，横批是“谁敢翻天！”他们在商店的门口贴标语：“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份”。他们说：“上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盘踞的老窝，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必须有一个极大的革命热潮。”他们鼓动红卫兵“自由行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形革命实反动，坚决粉碎这个阴谋！”“目前上海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文斗武斗的问题，而是斗不斗的问题，是‘温斗’还是‘狠斗’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来红’站起来了，我们解放了，……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顽强斗争，冲破一切障碍。”

（4）制造涉外事件。

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到国际饭店“造反”，在门口贴上“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说国际饭

店是“帝国主义的乐园”，职工是“洋奴”。9月20日晚，一卡车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开到饭店门口，用大喇叭广播：“不要见外宾就鼓掌，你知道这些洋人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当外宾乘车来饭店参加宴会时，他们高喊：“在中国土地上，洋人为什么不能走路？”勒令“下车、下车！”外宾非常紧张，低着头，举着手，在人群中挤进饭店。

9月18日，一个外国杂技团50余人乘车去杭州，负责接待的上海市文协组织200人到上海火车站欢送、献花。当时在车站候车的50多个红卫兵在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带领下，提出不准献花，要献《毛主席语录》和徽章。外宾下汽车后，他们抢在献花者前面，强行给杂技团的成员别上毛主席像章，引起秩序混乱，有的外宾拒绝挂像章。

(5) 任意揪斗、打人。

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一部分人到里弄、学校造反，任意揪斗干部和所谓的“黑六类”，用皮带抽人、罚跪、剃阴阳头等。据极不完全统计，自9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内，共发生打人30起，被打的达百人以上。19日晚，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七纵队的红卫兵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八·一八”红卫兵，打了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夫妇及该校副教授等5人。北京五十七中学和第七中学的12名学生指责长宁区群联中学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9月17日开会先后斗了31名教师，占全校

教师的半数，还给几个教师剃了阴阳头，用铅丝系着脖子游街。9月16日、17日，北京航院和北京第十五中学的20多名红卫兵殴打斜土路第一小学的支部书记、副校长和教师等共9人，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其他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南下兵团九纵队二支队的红卫兵在路过西藏中路沐恩堂时，向看守教堂的贵州中学的红卫兵宣传“打一、二下不算武斗”、“打死人国务院不管”、“对牛鬼蛇神就要打”。他们冲进教堂打了6个牧师。以后又从马路上抓了9个人进来，说这些人是“游民”，打了一夜，剃了头发，把长裤剪短后才放走。过了二天，南下兵团十六纵队的100余名红卫兵进来把上述九纵队二支队的红卫兵赶走，继续痛打6个牧师，并剃了头，用白漆和墨水涂了面部和衣服。

9月22日，首都红卫兵听说佘山教堂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即去了100多名红卫兵将佘山教堂的神父马凤祥从市区押到佘山教堂，边斗争边挖地，没有挖出东西，马被殴打致死。

(三)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

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是在江青、张春桥的煽动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其特点是组织了众多的驻沪联络站，参与了上海的夺权斗争。1966年10月左右，北京以及西安、哈尔滨等地大专院校再次南下的红卫兵，首先在愚园路311号建立了“首都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四出活动，插手上海运动。一时间，红卫兵联络站纷纷出现，属于外地红卫兵组织的联络站有：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驻沪联络站、东北工学院反帝反修远征军驻沪联络站、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共产主义公社驻沪联络站、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兵团驻沪联络站，等等。

第三批红卫兵来上海后，即与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串连，煽动工人起来“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1966年11月6月晚上，北京航空学院吕英豪、中央美术学院包炮，和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反到底兵团”杨小兵等人，在首都红卫兵三司联络站内召开了“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有17个工厂的“造反派”共30余人参加。就在这个会上王洪文等一伙人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

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积极参与了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和夺权活动，“首都三司”、“新北大”、“清华井冈山”、

“北京体院”、“北航红旗”、“哈军工”、“西军电”等驻沪联络站均成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参加组成单位。

（四）红卫兵接待站

1966年8月中旬以来，为了解决红卫兵来沪后的吃饭、住宿等问题，市里成立了上海接待首都和各地学生办公室，各区成立了接待站。初期来沪的红卫兵，分散住到各大专院校，9月初开始，又腾出了四个大饭店作为外地师生到沪后的临时休息处。10月以后，来沪红卫兵数量日增，一些机关的办公用房也腾出作为接待红卫兵之用，干部参加接待工作。如1966年10月下旬，市环卫局机关办公用房借给市红卫兵接待站使用，机关暂迁外办公。市粮食局机关于10月下旬从东海大楼迁至上海面粉厂办公，原址作接待站使用，直到1967年3月才搬回东海大楼。

据市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统计，从1966年8月15日至10月9日止，全市接待了北京及外地来沪师生374800余人，其中北京47000余人，江苏80000余人，浙江50000余人，辽宁35000万余人，广东30000余人等。

由于来沪和留沪不走的各地学生越来越多，造成接待工作十分困难。首先是来沪、留沪人数急骤增加，接待工作人员有限，忙不过来。上海地处北上、南下的中枢，全国所有省、市的学生串连必来上海，来得最多的除北京外，主要是华东六省。

江浙两省不少中学整班整班地来，江苏省南通第三中学的学生几乎全来了；浙江平湖中学整班地来，一次就来了200多人。来沪人员逐日增加，9月17日一天就接待了13500余人。另外相当一部分的外地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来了以后就不愿离开上海。住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北京第八女中、育英中学的学生，来沪近一个月还不走，他们说，一医问题很大，国庆节前任务完不成了，已派人回京拿棉衣，准备在一医长期蹲下去。住在华东师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来沪后近一个月，也没有离沪的表示，还说要发动更多的北京同学来沪。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待上百人，每天只能休息二三个小时，疲惫不堪。其次是住宿十分拥挤。上海各高等院校住宿的外地学生，少者占本校学生的三分之二，多的超过本校学生两倍以上。如交通大学原有学生4000多人，住了各地学生5000多人，最多时达7000多人，上海戏剧学院原有学生400多人，住了各地学生1000多人。接待站虽已开放了部分完全中学安排外地学生住宿，但仍不能适应需要。

接待站的工作一直到红卫兵串连终止才结束。

五、上海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初，毛泽东写信支持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消息传来上海，特别是他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的新闻见之报端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它迅速成为一种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对上海的“文革”运动起着重大的影响。

(一) 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建立

上海红卫兵组织首先在一些大专院校内出现，1966年8月上、中旬，复旦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就有了红卫兵。8月以后，从大学到中学，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除大、中学校外，初期阶段在部分工厂企业和机关也曾出现过红卫兵组织，后来它们都改称“战斗队”或“造反派”，于是，红卫兵组织只存在于大、中学校中。初期的红卫兵，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有分化合并等变化，8月底9月初，出现了全市性或地区性的红卫兵组织联合体。

大学红卫兵组织概况：在一些大专院校建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基础上，1966年9月中旬，建立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

部（简称“总部”）。成员是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总部”出版《红卫兵报》。因“总部”主张红卫兵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活动，后来受到其他红卫兵组织的冲击，“总部”成员被揪斗，至同年12月被冲散。1966年10月12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成立，上海市委派了负责同志前去祝贺。成员主要是大专院校红卫兵，后来又发展了中学红卫兵。“红革会”出版《红卫战报》。该组织是1967年1月28日揪斗张春桥事件（被称为“1·28炮打”事件）的主力军，后受张春桥严重迫害报复，头头受批斗，其影响力有所减弱。1966年10月底，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成立（简称“炮司”）。成员是复旦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交通大学等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后也因参加1月28日反对张春桥的活动，受到排挤打击。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是1966年11月22日从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分离出来而成立的，主要负责人是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红卫兵，而成员中大专院校的只占20%左右，中学红卫兵约占80%。

各大学中往往有好几个红卫兵组织。复旦大学有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参加“红革会”）、红复旦、八·一八红卫兵师等。交通大学有反到底战斗队、革命造反团、

反到底兵团（后与反到底战斗队合并），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师（筹）等，同济大学红卫兵组织是同济东方红公社，校内各系分别成立系的公社。华东化工学院有红卫兵大队部、九·一五战斗队、红旗总部、新化工总部等。华东纺织工学院有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改称“红革会”）。上海体育学院为红卫兵八·一八挺进纵队，后加入市“红革会”，改称“体院红革会”。上海音乐学院有红卫兵抗大战斗队、东方红野战军。上海戏剧学院是革命楼，狂妄大队。华东师范大学有华师大人民公社，红卫兵新师大师。

中学红卫兵组织概况：在各校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基础上，各区在1966年9月以后先后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9月29日，成立了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该组织的骨干成员中干部子女、工农子女、共青团员等较多。主要活动是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上街“扫四旧”等，在全市影响较大。但该组织也受到反动血统论的影响。11月，总部因“保”市委而被压垮。但很快又重新组合，一些人参加了“红三司”。一些学校组成跨区的红卫兵组织，如由闸北、虹口、杨浦三个区和宝山、川沙二个县的一些中学红卫兵联合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由徐汇区、上海县等区县20多所中学红卫兵联合组成的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

等。

上海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搞了“扫四旧”、抄家和揪斗老师等活动后，1966年9月开始，纷纷离开上海，去北京和外地进行大串连。大串连基本停止后，有些红卫兵组织还派驻到一些单位参与“斗、批、改”活动。

(二) 上海红卫兵外出大串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表明了他对红卫兵进行全国性活动的支持。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会上肯定了全国大串连。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央讲话，说红卫兵的大串连“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在8月31日天安门大会以前，上海红卫兵受北京红卫兵来沪串连的影响已经开始了串连活动。8月中旬以来，要求去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铁路局根据中央某负责同志三点指示：(1) 学生串连不要阻拦；(2) 如果有学校介绍信或文化革命委员会介绍信，车票一律半价；(3) 如果学生经济困难可不要钱，以后再向单位算。他们即照此办理。8月22日晚，北站聚集了1900多中学生要去北京串连，上海铁路局向铁道部请示，铁道部同意可以加一班火车送去，不要买票。铁道部会同教育部将

学生串连情况报告国务院，国务院秘书长要上海市委出面做些工作，最好不要去那么多，派少数代表去。市委根据这一精神，于8月23日发出电话通知：

(1) 初中学生尽量说服他们不去北京，因为他们年纪小，不好照顾。如果说不服，可以派少数代表有组织地去。

(2) 高中学生原则上按十个人推选一人，但掌握不要太死，实在不行的话，五六个人推一个也可以。这个意见不要说是市委统一规定，作为区委的建议。

(3) 各区委要分别开家长座谈会，向学生家长做一些工作，要他们向自己的子女做工作。

(4) 半工半读学生要求去北京问题，因为他们有生产劳动问题，可以由学生推选少数代表去北京（不要说是市委统一规定，可作为局党委的建议）。

(5) 有组织去北京的，由单位出具介绍信，分别由铁路局登记。

(6) 车上吃饭自理，到北京要带粮票，伙食费自理，碗筷被子要随带。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高等学校的学

生都可去北京串连，教职员工、中等学校学生等要推派代表，按人数分配。并责成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组织领导小组负责此项组织工作。根据这一精神，市委，市人委决定成立上海组织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领导小组。接着，市委发出《关于组织中等学校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去京参观的几点意见》。规定中等学校学生每十人推选代表一人，教职工代表按百名学生产生一名代表去京，学生去京代表总数为81700余人，教职工代表为8100余人。业余性质的学校学生、农中学生一律不去北京串连。

然而，串连活动就象打开闸门的水，一泻而不可止。不仅大中学校的学生，连有的小学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随着这股串连飓风北上。这就造成火车运输高度紧张。而部分工人、农民参与大串连，也对生产带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发出组织学生去北京串连通知后的第三天即9月7日，又发出紧急电话通知，规定不要到县以下农村去串连，不论是外地来的学生，还是本省的、本县的学生，都不要去，农村按原来的“四清”部署进行；县以下单位的干部也不要到外地去串连，要坚守岗位，把革命、生产搞好。在城市，外地、本地的学生都不要去工厂串连；工厂干部、工人也不要到外面去串连，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工厂的运动按原来的四清部署进行。

不论是干部口头做工作也好，中央的通知以至紧急通知也

好，已都无法阻止串连的浪潮。学生中间，又形成了派别，派与派的争执，此起彼伏，违反政策的武斗，逐步升级，极端自由化的思潮泛滥，行动不受约束。

10月6日，发生部分红卫兵拦阻14次特别快车，使铁路运输中断的事件。该日，有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江苏等省市236个学校的1860余名学生乘坐652次临时客车去北京串连，车抵高资站停车避让14次特快列车，部分学生下来坐在轨道中心，手拿红卫兵袖章左右摇晃，拦截14次列车。14次列车司机发现后，立即减速鸣笛，但学生仍不离开，14次列车被迫停车。学生将14次车围困，经再三做工作，晚点2小时17分方才解围开出。受其直接影响，有20趟列车相继晚点。

学生大串连的混乱局面，使国民经济直接受到影响和损失。1966年9月30日，陈丕显曾打电话去北京，了解到党中央听取了余秋里、李先念、谷牧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总的精神是“要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要保证明年计划不受影响，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当前经济形势扭转过来。”党中央指出“当前铁路运输问题最大最多。中央、国务院、军委要发出通告，火车轮船要正常运输，红卫兵不能随便上车上船、阻拦火车。”“学生串连问题，决定中学生不串连了，小学生要很快上课，中学生慢慢恢复上课。”可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煽动下，已经形成的这股串连浪潮，无法拦

阻。上海的红卫兵继续到全国各地串连。

(三) 遍及全市的“扫四旧”

红卫兵的“扫四旧”行动，首先是在北京掀起的。1966年8月23日，新华社专电报道了《首都红卫兵上街猛攻四旧》，《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

就在电台和报纸广播和报道了北京红卫兵上街“扫四旧”消息的当天，上海各大专院校、中学的红卫兵立即冲向街头，他们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举着“横扫‘四旧’”的横幅，在南京路、淮海路、静安寺、外滩等一带，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宣布向一切“四旧”的现象发起猛烈“攻击”。

红卫兵们扫除了哪些“四旧”呢？下面是他们的主要行动：

(1) 改区名、改路名。

全市10个区有6个区被红卫兵倡议改名。一些红卫兵说：“静安区名来源于静安寺，系一和尚名字；‘静安’两字是宣扬和平主义，建议改名为‘延安区’、‘红卫区’”，静安区委的牌子被贴上“延安区”三字。红卫兵们还倡议将“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将“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将“普陀区”改为“普红区”、“革命区”、“工人区”、“反修区”、“朝阳区”；将“卢湾区”、“南市区”改为“红卫区”，等。

更改路名的更多，许多马路的路牌都用红纸贴上了“红卫

兵”们倡议的新路名。南京路倡议改为“五洲大街”、“反帝大街”、“革命路”或“东方红大道”。倡议改“淮海路”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在解放前是一条臭水浜，现在成为花园似的马路，倡议改为“忆苦思甜路”。“愚园路”倡议改为“愚公路”，“西藏路”倡议改为“大庆路”、“翻身路”，……等等。

(2) 改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

繁华热闹的南京路，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加上过路行人和看热闹的，被挤得水泄不通。各商店的橱窗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提出各式各样的改名意见。“国际饭店”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红旗宾馆”、“革命饭店”。对上海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红卫兵认为，它过去是资本家的，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决不允许“永安”这块臭招牌继续挂下去。于是有的主张改“永斗”，有的主张改“永红”、“永卫”。在淮海路，红卫兵要“哈尔滨食品厂”改为“工农兵食品厂”，因为它过去专门售高级糖果和点心，没有面向工农兵。永隆商店被红卫兵贴上大字报说：“永隆永隆，永远兴隆，完完全全是孙冶方利润挂帅的一套，限令12小时内改名”。国营南京西路旧货商店改为“人民委托商店”。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商店、邵万生南货店等店的招牌被红卫兵拿下来，浇上火油，一烧了之。

许多学校都改了校名。新校名有红卫兵中学、东方红中学、造反中学、抗大中学、红旗中学、反修中学、永红中学、无产者中学、闯将中学，等等。

许多影剧院、剧团也都改了名。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牌子被红卫兵拉了下来，大字报贴满门口，提出20几个名字，什么“东方红文化宫、游乐场”、“工农兵友谊剧场、娱乐场、俱乐部”、“人民游乐场”、“人民俱乐部”、“革命俱乐部”、“东风世界”，等等。红卫兵在“共舞台”门前贴大字报、批评“共舞台”是“黑舞台”，建议改为“延安舞台”。大光明电影院建议改为“东方红电影院”、“工农兵电影院”、“环球赤电影院”。

有些公园也改名。襄阳公园改为“向阳公园”，淮海公园改为“反修公园”，浦东公园改为“红雷公园”。为了使后代不忘帝国主义曾在黄浦公园挂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对我国人民进行的侮辱，倡议将黄浦公园改为“反帝公园”。

少年宫也改名。有些红卫兵说，少年宫是向“苏修”学来的，建议将少年宫改为“红色少年学校”。

许多里弄也换上了新名称。黄浦区“会乐里”改为“解放里”，卢湾区“宝康里”改为“东风里”。普陀区“梅芳里”改为“革命里”。南市区“桃源新村”改为“燎原新村”。也有些居民自动敲掉了石库门上面的“三星高照”、“五世其昌”、“姜

太公在此”等字句。

(3) 禁止出售高档商品，一些商店被勒令停业。

红卫兵们说，为了坚决造“四旧”的反，制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流行，要造成革命的社会舆论压力。不少服装店、皮鞋店、理发店接到警告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高级臭货滚蛋！”“一律不准剃各式大包头”、“不准出售尖头皮鞋”等。一些商店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和进口商品都被迫收藏起来。老大昌饮食店的高档面包，哈尔滨食品厂的高级糖果，新春饮食店的“全家福”、“八宝饭”，泰山饮食店的“搅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都停售。西菜馆的“西”字和旧货店、钟表店的“洋”货成了众矢之的，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的口号标语。一些咖啡馆、弹子房以及珠宝、古玩商店被勒令停业。南京东路重庆参行职工改店名为“工农兵参行”；后来又去了一批红卫兵，他们说：“工农兵的补品是劳动，不要你们这种东西。”该参行即宣布停止营业。

(4) 剪小裤脚管、斩尖头皮鞋、剃光大包头。

8月23日下午，招牌可砸的差不多砸光了，能封的商店也已封了，一些红卫兵把目标转到一些打扮比较时髦人的身上了。他们看到穿尖头皮鞋的人，立即责令脱下来，一刀斩去尖头，让他们提着鞋赤脚走回家。一些红卫兵等候在十字路口或公共汽车站，几百双眼睛盯着过往车辆乘客中和行人中装束“特别”的

人，一经发现就拦住，勒令改变装束或者脱去尖头皮鞋。有的红卫兵拿着皮尺量裤脚管的宽窄，凡是他们认为不合规格的小裤脚管，用剪刀嘶拉一下剪开，弄得一些人狼狈而逃。有的人梳的发型比较“时髦”，或是大包头，红卫兵围住起哄，或剪去一络，或者干脆剃光。有的机关、学校门口，红卫兵设立“破旧立新”站，专门为进出大门的人剪剃“革命”发式。破“四旧”高潮的几天中，不少人不敢出门上街，怕身上哪点不符规格而大难临头。

(5) 批判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广告、商标、产品设计、商品橱窗布置等。

几条商业集中的马路，凡路旁有花花草草和女人画像的广告牌或布置漂亮摆设高档商品的橱窗，都被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批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广告公司的人突击行动，把已被涂损的原广告牌重新油漆，换上巨幅的毛主席语录。有的贴上了“革命造反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标语口号。天真照相馆的陈列照片，经红卫兵逐张审查后，将不符合艰苦朴素精神的照片全部收掉。一时间商店的布置都千篇一律，连夜张贴毛主席语录和张挂毛主席像。

(6) 砸教堂，捣庙宇，烧经书，打菩萨。

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堂等均被砸。好几批红卫兵冲进“静安寺”，推翻供桌，打翻香炉，给十八罗汉戴

了高帽子，捣毁了神主牌，打掉了殿内的摆设。曹家渡的“三官堂”菩萨被丢进了苏州河。8月23日下午，交大的红卫兵进入国际礼拜堂，搜遍所有房间，烧毁了100多部圣经、几十个耶稣像和一批神甫衣服，烧了好几个小时。晚上，上海师范学院等校的红卫兵涌进徐家汇天主堂，搜集所有神像、经书统统撕毁。供神用品和有十字架标记的门窗被捣毁后烧掉。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七十三个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罚跪在大堂中，并给张家树等八人戴了高帽子，进行批斗。

(7) 砸石像、铜像、铜狮子。

解放前修建的各种建筑物上的石像、裸体女人雕像被红卫兵敲碎、搬走。汇丰银行大楼门前的铜狮子被搬走。中苏友好大厦（“文革”中改名为“友谊馆”，粉碎“四人帮”后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门前中苏两个人像上，苏联人的头用布包起来，身上贴了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八个黑字。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被砸碎，头部送到市委接待站。豫园一些有“才子佳人”的门窗雕刻全部被打光，围墙上的九条龙限令在一周内拆除。

(8) 掘坟墓、劈棺材。

南市区东华民办中学“红卫兵”在上海市第八百货店等职工协助下，烧毁了一个资本家的两口楠木棺材。虹口区一个资

本家家属放在家中的一口棺材，也被烧毁，当场发生争执，这个家属被红卫兵戴上高帽子游街。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工人红卫兵（按初期有些工厂工人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到工人家中去查棺材，查出10口，敲毁4口。

静安区公私合营长江科学仪器厂私方的一座花园洋房内有两座祖坟，被红卫兵掘开坟墓，烧掉棺材。

上海“万国公墓”是殡葬名人的墓地，在扫四旧中，葬在墓地的名人墓碑全部被砸。连鲁迅朋友内山丸造的大理石墓碑也被砸碎。部分红卫兵竟然要去掘宋庆龄父母亲的墓穴，周恩来总理获悉此事立即下令制止，恢复了原状。

(9) 取消公私合营招牌，建议取消定息，抢占资本家的住房。

红卫兵们说：“公私岂能合营？”有的商店店名已改，但招牌上还有“公私合营”的字样，红卫兵们说，“公私合营”的帽子，是对社会主义商业、对革命职工的极大污蔑！提出只留“公”字，“私”字滚蛋。全市商店“公私合营”的招牌一天之内都被取消了。红卫兵还建议取消定息，降低资本家的高薪。红卫兵在市房管局门口贴出大字报，要资本家把大的住房让出来给劳动人民居住。一些住房紧张的居民，趁机抢占住房，刮起一股抢房风。

(10) 禁止私人开业、个体单干。

一些私人开业的医生、护士、画室被贴了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反修大街上决不允许存在私人企业，挖掉一切资本主义根子！”

北京西路私人开业医生、妇科专家“朱小南诊所”被红卫兵贴了大字报，不准朱走“资本主义道路”，朱不肯表态，红卫兵即冲进诊所，把沿街的大小玻璃窗统统砸碎，把红木桌椅捣毁，开药方的本子全部被撕碎。

余庆路私人开设的“哈定画室”，被红卫兵贴了大字报，一人出来表示不满，红卫兵即冲进画室，将玻璃窗、石膏像、画架等砸烂捣毁。

顺昌路一个修钟表的个体户顾某，被红卫兵贴了大字报，顾不接受，红卫兵即把他拉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顾在中途逃回，红卫兵又把他从家里拉出来，在门口召开斗争会，责令其承认错误，直到这个个体户写了书面检讨后才罢休。

(11) 禁提大额存款。

一些红卫兵在银行门口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的大字报。有的客户来提款，被拉扯到马路上，叫他滚蛋。据银行调查，8月下旬以来银行存款急骤减少，而银行对金银、外币等收购量却大量增加，8月下旬至9月底，共收兑黄金63400余两，银元810000余枚，美钞127000万元。这40天的黄金收兑量，相当于平时一年半的收兑量，人心惶惶。

(12) 取消服务项目，改变服务方法。

凡认为是属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式和方法，一律勒令取消和改变。沐浴业的扞脚、敲腿、擦背等服务项目，都被斥责为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予以废除或改变。浴室的服务员擦背只擦背部，不擦全身。有些旅馆取消为旅客打洗脸水、洗脚水项目。饮食店要顾客自己拿饭、端菜，吃完后自己洗碗。有一家旧货商店出售一只刻有“龙凤抢珠”的床，顾客已付过定金，但商店不给顾客提货，说要把图案敲掉后才能提货。

(13) 不准雇用保姆，停止供应资本家牛奶，拆除资本家家中电话。

一些红卫兵在公寓、别墅弄口贴大字报，限令24小时内辞退保姆，有的还勒令这些保姆回乡。电话局有40余人专门负责拆除资本家和“牛鬼蛇神”家中的电话。牛奶公司根据红卫兵的要求，牛奶不供应给资本家。

“扫四旧”的飓风吹遍市区每一个角落，又很快从市区刮到了郊区，从8月24日开始至29日，连续几天，几乎不分昼夜地冲击了农村的集镇和乡村。郊区的一些天主堂、耶稣堂、庙宇、庵堂、公墓等几乎被砸光，社员家中的神祖牌位、灶君老爷和棺材等一扫而光。大部分的公社改了名，换上了什么红卫、东方红、要武、红武、红星等等名称。

“扫四旧”中，出现了砸、抄、体罚等行为。8月23日晚，

一批红卫兵到太原路一有“问题”的人家抄家，搜出一批“奇装异服”、“黄色书刊”等，就把这家户主和三个子女的头剪掉，戴上高帽子，剪破裤子，叫他们在地上跪着斗了一夜。虽然上海市委在1966年8月22日就发出“通知”，对破“四旧”作出八项规定，规定不准抄家，不准体罚和不准游街示众等，但在“扫四旧”的这股狂风中，市委的“通知”基本上不起作用。后来反而成为市委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

(四) 驱赶“黑六类”、打人和抄家风

与“扫四旧”一样，驱赶“黑六类”、打人和抄家的几股风，也是从北京刮到上海的。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在这次讲话以后，北京红卫兵很快就掀起了打人、抄家等活动。南下串连的红卫兵，把北京的“先进经验”传入上海。

9月上旬，传来了北京某红卫兵组织关于勒令“黑六类”返回农村的“通令”，全市掀起了驱赶“黑六类”和打人的高潮。打人主要是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他们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支持和配合下，到街道、里弄和派出所，要这些单位提供“黑六

类”和“有问题”人的名单，然后按名单搜人，当场或拉到私设的“公堂”进行殴打。据当时的统计，自1966年9月1日至9月25日，市区489所中学中，有361所中学的红卫兵有打人行动，被打的达1万余人，打死11人，打伤961人。据黄浦、静安等9个区的初步统计，红卫兵私设的打人“公堂”有33处之多。

如复旦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独立队”10余人，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等学校红卫兵指使下，在虹口区乍浦路一带捕捉了被称为“流氓、阿飞”的10余人，带到华山路他们私设的一处“公堂”内进行殴打。据复旦中学一名红卫兵透露，他们先后捕捉了5批，共27人。抓到以后，先抽打一顿，剃光头，然后再逐个殴打、审讯，逼迫交待“问题”。

卢湾区东风中学的40多个红卫兵，从9月18日起四出捉人拷打，到21日止捉了30多人，其中有一半被剃去头发。

卢湾区内燃机配件厂一个工人因生活作风问题在“四清”时曾被批斗，9月4日，他在恒丰路桥掷下两包东西，被红卫兵发现后拉到厂内斗争。斗争以后，又被红卫兵拖至苏州河边要他下水去捞，因不会游泳，红卫兵就用绳子扎在这个工人的腰部推到河里，连续搞了三天，被溺死在苏州河里。

9月6日，徐汇区五十一中学红卫兵去中山医院一位副院长的家里，对其八十多岁的母亲进行斗争，打后并灌盐水、酒

等东西，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黄浦区沈家弄的一个居民（女）因过去有过小量贩卖行为，9月10日东南中学的红卫兵去她家贴大字报，她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红卫兵就将她吊在屋梁上拷打到半夜2时，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学绑在旗杆上殴打，于晚上10时被殴打致死。

9月17日晚，上海红卫兵总部几名红卫兵通过黄浦区龙门路派出所，找到三个所谓“坏分子”押到红卫兵总部进行斗争，其中一人被打了一个晚上，派出所将其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

五十四中学的6位学生于9月17日晚，用带钉的木棍、鞭子、扁担毒打一名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黄某，说她在单位里偷看《参考消息》，交代又不老实。毒打之外，还残暴地对黄某灌冷水，踩肚子，黄当场被搞死。黄的母亲也被殴打重伤。他们打了人还颇为有理地说：“武斗是文斗的基础”，“打人能培养阶级感情，打人越狠，无产阶级感情越深”、“对坏人不打是路线性错误”。

关于驱赶“黑六类”，除了红卫兵到街道、里弄驱赶这些人限期回乡以外，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根据传说是首都某红卫兵组织的“通令”，采取了配合行动。如商业二局系统驱赶“黑六类”行动自1966年9月上旬开始至10月19日止，列入“黑六类”名单的共1630余人，有511人被赶回原籍农村或城镇，株连家属371人。有的单位发动群众贴大小字报点名，搞得一

些人惶惶不安，不知哪一天会大难临头，被“扫地出门”。市财政局系统以“反革命”、“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坏分子”等为名，将局机关及所属分局、建行等机关 21 人赶出机关，其中 18 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局机关有人得知自己将被赶回原籍而跳楼死亡。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共有职工 638 人，被大字报点名要驱逐出上海的有 133 人，占职工总数的 20.8%。一些工厂和私方人员听说“黑六类”中包括资本家在内，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说“今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据当时统计，至 10 月 10 日止，全市已有 9260 余人被遣送回乡。被遣送回乡的除机关、学校、工厂中的干部、职工外，各街道、里弄被遣送的人更多，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伴随驱赶“黑六类”同时进行的，是遍及全市的抄家风。

抄家的对象，开始是“黑六类”，以后逐步涉及到党政领导，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有的单位凡是带“长”字号的人都被抄家。抄家的范围越来越广。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抄家的对象也最多，刘念智、郭琳琅、荣漱仁（荣毅仁之姐）的家被抄了。全市 6 万多工商业者都被抄了家，几乎无一幸免。市人民银行的一些造反头头提出，不论解放前后，凡是曾在银行中担任过正副经理、襄理的，都在被抄之列。商业一局的一些造反头头提出：“抄错是方法问题，不抄是立场问题。”海运局到 1966 年 10 月底，共抄

了 144 户，其中机关干部 18 人，船长 20 人，轮机长 7 人，大副 21 人，二副 7 人，大管轮 3 人，二管轮 3 人，三副和三管轮以下工人 65 人。静安区一个区即抄了 17810 余户，占全区总户数的 14%，其中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两个街道，各占总户数的 17% 多。全市宣传系统 11000 多名干部中，被抄的有 2421 人，占 22%。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作家巴金、翻译家傅雷、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以及名演员赵丹、童芷苓等等，都被三番五次地抄家。抄家还株连了某些名人的子孙后代。黎元洪的儿子、段祺瑞的侄子、袁世凯的孙媳妇等人的家，统统被抄了。搞抄家的不仅是红卫兵，也有各有关单位的“造反派”，抄家的手段也越来越“精明”凶狠，先把所有的人看管起来，接着便动手，上到房顶，下到井底，撬地板、挖墙洞、砸橱柜、掀灶头，角角落落都抄彻底。有的“毁灭性抄家”，则不仅是拿走东西，还将未拿走的肆意破坏殆尽。有的人被抄家以后，“扫地出门”，被赶回原籍或下放劳动。

据当时的统计，从 1966 年 8 月 23 日到 9 月 25 日止，全市共抄家 157700 余户，占全市总户数 241 万户的 6.5%。其中市区 114500 余户，占市区 139 万户的 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 64.9 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 90.7 万余件，钻戒、钻石 4 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 27 万余件，美钞 334 万余元，其他外币 330 余万元，银元 239 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 3.76

亿元。

疯狂的抄家行动，践踏了民主和法制，残害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其波及面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

六、诬害常溪萍致死是为了打倒上海市委

常溪萍，“文革”初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在“文革”这场大灾难中，他是上海市部长以上高级干部中最早罹难的一员，而且是直接遭受江青、张春桥、聂元梓等人的诬陷迫害，被置之死地的。江青、张春桥一伙把诬害常溪萍作为他们打倒上海市委的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以常溪萍为“突破口”来“炮轰”上海市委。后来在1967年1月反革命夺权前夜，上海出现了这样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常溪萍是首先被所谓“砸烂”的。而早期“炮打”上海市委的借口，作为市委的一条重要“罪状”，就是指责市委负责人“包庇”常溪萍！他们纠缠说：你们为什么要“包庇”常溪萍？因为你们同样是“黑帮”！

（一）江青威胁说：你们市委要被动的

经历过十年“文革”风暴的人们，都会记得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具名撰写的，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吧？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公布后，不仅马上把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等抛入敌我矛盾的“黑帮”之列，而且

使“文革”火焰燃烧更加猛烈。这张大字报是康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到北京大学去怂恿和组织聂元梓等人撰写的。

1966年6月26日，还是这个曹轶欧，把北京大学一些人写的“揭发”常溪萍的大字报和一些有关材料（常溪萍部分发言记录），寄给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大字报的标题是《常溪萍在北京大学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与“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标题何其相似乃尔？！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后来加入签名的共13人，据曹轶欧写给张春桥的信中介绍，这些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左派青年教师”。大字报“揭发”常溪萍是北京大学社教工作团“内部跳出来的反攻倒算的急先锋”，为北京大学“极端严重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曹轶欧信中还点出了“据说今年三月陆（平）到上海时，曾找过常”。张春桥接信后，嘱市委办公厅把大字报及有关材料摘要印发市委各书记。

本来，经过6月初和6月中旬两次大鸣大放的高潮，全市各单位特别是大专院校和区、县、局以上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谁要贴就贴好了，包括外单位转来的大字报。有什么必要非要由曹轶欧把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寄给上海市委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目的在迫使市委表态，把市委圈进去。市委怎么处理？贴出去还是不贴出去，都将难以善其后。当时，市委书记处没有讨论如何处理送来的大字报，

此事就搁了下来。

20多天过去了，北京大学写大字报一些人见上海市委没有什么反应，就于7月18日又写了一篇大字报，标题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由聂元梓等18人署名。这篇大字报一式两份，附有给上海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信。信中说：“送上两份大字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一份贴到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另一份请协助贴到他原工作单位上海师大（按：当时应为华东师范大学）……。”但他们没有马上寄出。

又过了8天，7月26日，“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张春桥、戚本禹等一批人到北京大学来，准备当晚召开师生大会。他们在会前临时找了聂元梓等所谓“左派积极分子”去谈话。聂元梓等乘机向江青当面提出要求，说有张揭发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常溪萍的大字报，“中央文革”能否帮助转到上海贴出来？还说一个月前已经送去一篇大字报，没有动静。江青当即表态说：“可以帮助转！”还恶狠狠地说：“上海不贴，我去贴！”并把大字报交给了张春桥。

这里，应当提一提张春桥的态度。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曾出现的过“左”的错误倾向，常溪萍是反对的。张春桥不仅了解此事，而且还同意和支持常据实向中央反映。而这正是聂元梓等拼命诬陷、攻击常溪萍的关键问题所在。在骄横的江青和

自命不凡的聂元梓面前，老奸巨猾的张春桥附和着、迎合着，答应说要叫市委把大字报贴出来。但他自己不签意见、不转大字报，却于第二天交给了来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获秋。

曹获秋到京后，7月28日在给市委的电话中，曾提到有两张对常溪萍的大字报将送回上海，当时他未讲如何处理。曹认为不应草率地把大字报贴出来，就去请示邓小平。因为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问题是经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处理过的。邓小平指示：北大的社教问题，中央书记处已经作过处理，这个问题就不要再挑起了。8月1日，曹获秋给在上海的杨西光挂电话，说：“关于北大给常溪萍的大字报的处理问题，已经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按上海的情况处理，不一定贴出来，可以不贴。再同康生研究一下。’后在会场遇到康生，康说：‘研究研究再说’。因此，此事可暂缓处理。”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聂元梓作为首都高等学校的师生代表也列席了会议。上海市委不贴出聂等所写大字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青、聂元梓的耳朵里。聂元梓跳脚了。江青更是火冒三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途，8月6日，江青找了曹获秋，对曹横施压力。她疾言厉色地说，北大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你们上海要贴出来。“不贴，你们市委要被动！”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张春桥写了个条子给曹获

秋，为江青帮腔。要曹获秋回上海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对曹施加压力。

8月13日上午9时，曹获秋不得不叫秘书打电话告知上海市委，说北大对常溪萍的大字报，不贴不好，要对常做点工作，请他思想上有准备。于是，在江青、张春桥的高压下，市委被迫将北大送来的两份大字报贴到教育卫生部和华东师大去；并不得不宣布停止常在文化革命方面的领导职务（他是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市委书记处两位书记找常溪萍谈了话。

（二）是非颠倒，常溪萍何“罪”之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给常溪萍戴上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什么“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暗藏在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甚至后来还有他们首创的“社教运动的叛徒”，等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要从常溪萍参加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谈起。

1964年11月，党中央从各地抽调200多名干部，去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从上海各高等学校抽调的干部有40名，由当时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带队前往。12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成立，由原中宣部一位副部长任书记兼队长，原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常溪萍等四人任副书记，常还兼任西语系工作组组长。

北大的社教运动开始后，工作队在如何看待北大的“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如何对待北大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陆平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人在“社教”试点以前曾在北大搞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据说开头搞不到什么“情况”，后来听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建议，看了一些干部档案，发觉“北大党组织严重不纯，许多坏人混入了党内”。他显然夸大了北大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与当时全国城乡社教运动“左”的错误方针是分不开的）。工作队进驻后就夺了校党委的权；片面地根据揭发材料就揪斗了校、系两级五十多个比较负责的干部；而且不问各系运动的实际情况，一律规定要在十天内形成批斗高潮；校党委书记陆平也作为坏人来打。这种“左”的错误造成的对干部的过火斗争，有些是十分典型的。例如，在1959年大跃进的年代，技术物理系在搞原子能时，曾有二人受到放射性杀伤。这其实是一件责任事故，但在社教运动中却被歪曲和夸大为该系总支书记石幼珊搞阶级报复，于是给石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①常溪萍对这一切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在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工作方法等问题

^① 技术物理系放射性杀伤案，后经常溪萍等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定为责任事故，否定属于阶级报复。“文革”中此事又重新抖了出来，责任事故又被诬为“阶级报复”，常溪萍也被诬为对社教运动反攻倒算的“典型”，成为一条重大“罪状”。

上，常也有不少意见。

1965年1月14日，党中央制定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有要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把政策交给群众；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干部，肯定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对于犯错误的人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有关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上，提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等等规定。常溪萍在学习《二十三条》中，认为这些规定确实打中了北大社教工作队存在的问题的要害。他建议工作队认真学习《二十三条》，总结二个多月的工作。他联系西语系的实际，写了一份报告。不料那位主要负责人竟在常的报告上批了个大“右”字，不予理睬。

1965年2月，常溪萍回上海过春节。他向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汇报了北大社教运动和工作队主要负责人不执行《二十三条》的情况。张、杨听了后都表示同意常的看法，并认为有意见可以在工作队中提出，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因为，北大社教运动是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抓的点。

1965年3月3日，党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北大的社教运动。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北大四清（即社教运动）一开始即应

三结合，现在应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工作队要总结，确有缺点，有毛病，一去即夺权，摆出夺权的架势，斗争方式不正常”。“陆平不是犯了一切错误，只是某些错误，要真正三结合。”中央同意北京市委召集北大的干部开个会，一起总结经验。常溪萍听了刘仰峤的传达后，对照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情况，又向主要领导人提了意见。但那位负责同志不但不接受，而且把常调离了西语系。

1965年3月4日和3月11日，常溪萍先后两次写信给张春桥和杨西光，4日信中讲了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北大的社教工作，邓小平对北大工作队的领导有批评等情况。11日信中说：“在总结工作中，我提了些意见，基本上都遭到拒绝，我没有再说什么，以免形成顶牛。但我想，应当向中央反映一下情况，否则会犯自由主义。不知可否，请速示”。这信，首先由张春桥圈阅并亲笔批送市委其他书记阅。随着在一次书记办公会议上，还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常溪萍向中央反映情况。会后，由杨西光要教卫部办公室负责人复信告常，说“不但可以写，而且可以讲。”

1965年3月17日，常溪萍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信。3月20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派干部约常溪萍谈了话。

常溪萍向中央反映北大社教工作情况的信与中央办公厅约常谈话的详细记录，现在俱在。从那些历史材料中可以清晰、鲜

明地看到常溪萍对北大社教工作中的问题是采取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下半年，为弄清常溪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情况，中共上海师范大学委员会曾派人访问当年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刘仰峤。刘说：“从溪萍同志反映的主要内容看，溪萍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党负责的，这在当时就已经完全肯定了。他的作法是正常的，这也是当时完全肯定了的。”当年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也证明：“常溪萍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是符合事实的，是完全正常的，常溪萍的信写得很好”，“常溪萍是个好同志，这个同志在北大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4月初，中央调整了工作队的领导成员。在新的三结合的“社教运动核心小组”领导下，常溪萍等对过去揭发的材料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实，推倒了那些不符事实的夸张的甚至诬栽之词。

1965年6月底，工作队放假，常溪萍回到上海。经上海市委决定并报中央同意，常不再回北大社教工作队工作，提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

以上就是常溪萍参加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经过，就是他横遭诬陷攻击并最后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根源。但是，历史证明常溪萍当年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当的，正常的。

常溪萍何“罪”之有？！

(三)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起恶劣影响

聂元梓等的大字报8月14日在华东师大贴出后,当天与第二天师大一些学生又贴出了七八张由北大直接寄给他们的“揭发”常溪萍问题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不仅在师大,而且在全市大专院校,引起了震动与哄动。许多大专院校的师生纷纷到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来,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查询有关常溪萍的问题。仅8月15日一天,就有47批、260余人。他们提出的问题大致有:常溪萍在北大的问题,上海市委是否知道?为什么要提拔他担任教育卫生部部长?北大寄来的大字报是7月份写的,市委为什么到8月中旬才贴出来?市委要常溪萍到北京去接受审查,这样就算了吗?等等。许多学校的师生去华东师大看有关常溪萍的大字报。他们回校后,纷纷“强烈要求”本校党委负责干部揭发常溪萍的问题,有的贴大字报“勒令”市委教卫部派到各校的联络组、工作组干部交代与常溪萍的关系,等等。总之,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后,在全市各大专院校中引起了形形色色连锁反响。

在华东师大,贴出了一批“揭发”常溪萍本人问题的大字报,但内容实在是很贫乏的。除了空洞地指责常破坏高校“文革”等以外,主要的有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受“歪风”的影响一度中断,常溪萍没有顶住;常在执行干部政策上“阶级观念不强”,“重才轻德”;常提倡政治干部都要“专”

一门业务是“不突出政治”;等等。撇开这些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及常溪萍是否有这些问题不谈,就算它们都成立吧,终究属于一般性的问题,这与聂元梓等诬栽的大帽子是多么不相称啊!

8月29日,常溪萍在市委教育卫生部向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第一次自我检查。30日,常去华东师大向全体师生员工工作第一次检查。常溪萍作检查后,师大的大多数学生认为常属于好人犯错误,不应斗;少数学生认为“聂元梓是最革命的”,或认为“聂等写的大字报是有根据的”,常溪萍是“黑帮”,应该“打倒”。

不同意见的争辩,势必形成两派学生的对立。处在中间状态的则逐渐分化。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即从8月下旬开始,北京的红卫兵大批南下,到上海来串连“点火”。他们积极干预了上海全市特别是大专院校的运动。其中相当多的人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不自觉地为江青、张春桥等所利用,积极地推行“以常溪萍为突破口,打倒上海市委”的策略。他们与师大的少数派自然地结合起来。他们也组织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进行批斗常溪萍的活动,支援师大少数派。后来正是倚仗这种串连、支持,而实质是林彪、江青等的策动,少数派在师大以及全市大专院校逐渐占了优势。

9月1日下午2时半，师大全体师生员工在共青场举行了庆祝毛主席接见外地去京学生大会。在会议中途，一个学生未经主席团同意，跑上主席台抢了话筒发言，要求派代表把常溪萍检查交代的录音带立即送北京审查。主席团没有马上答复。下午5时半，几十个学生到办公楼前静坐示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积极参与指挥。静坐示威者发表声明说，“我们的目的是责令主席团于今晚将录音带复制一份，核实以后，由同学派代表送往北京‘中央文革’审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声明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北京航空学院一名学生。静坐示威者陆续增加到200多人，持续到2日上午10时。后经协商由不同意见的两派学生各派代表负责把录音带送往北京。

9月26日晚，师大造反派（少数派观点）召开大会，邀请在上海的北京大学师生揭发常溪萍的问题。参加会议的约有2000人。在会上被邀请发言的有北大哲学系、物理系、西语系各一人。由于师大另一派的学生不同意这三人的发言内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直延续到深夜2时，双方不欢而散。

在北京的聂元梓等人，听到常溪萍在上海斗而不倒，并且还有不少人同情的消息，十分着急。他们正式成立了所谓“常溪萍问题揭发小组”，并且又写了标题为《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革命倒算的急先锋》的大字报。这份大字报长达8千

余字，但内容仍是聂等7月大字报的翻版；突出的用了“叛徒”这顶帽子，这在当时是可以置人于死命的。这份大字报由聂元梓等17人具名，先寄给师大少数派，由化学系“忠于党”战斗队抄录后于29日张贴出来。

11月3日上午，首都南下红卫兵纵队借华东师大共青场召开揭发批判常溪萍大会。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外地来上海串联的学生和本市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共8000多人。

11月20日，聂元梓经江青、王力“面授机宜”后，偕一些亲信窜来上海。11月22日聂元梓对人说：她来上海的目的，是“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大刽子手常溪萍”。“常溪萍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11月25日，聂元梓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主要作者、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的身份，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一起，参加了所谓“万炮轰击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被请上了主席台。在这次大会上，华东师大造反派代表直言不讳地点明了打倒常溪萍在搞垮上海市委的整个阴谋策划中的作用。他说：“常溪萍是个关键人物，常一倒，市委就打开了一个缺口，曹荻秋就自身难保。”

常溪萍陷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

（四）矛头直指市委主要负责干部

自从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贴出以后，“造反”的火焰就开始扑向中共上海市委。不出那些处心积虑的幕后策划者所料，那些在火线上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们，他们的逻辑是惊人地简单明白：既然聂元梓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她的话是“权威性”的，她揭发常溪萍是黑帮分子，那么常就是黑帮分子；那么，上海市委内部一定有常的同伙，一定要挖出来。于是，“从市委内部揪出‘保常派’！”“深挖黑线！”就在揪斗常溪萍开始不久，迅速地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战斗任务”。

首当其冲的是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同时，矛头也指向当时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曹荻秋。（陈丕显因病住医院治疗）

8月15日，华东化工学院贴出大字报责问杨西光。因杨在7月8日接见化工学院一批师生时的讲话中称“常溪萍是好同志”，他们“强烈”要求杨西光回答：说“反革命分子”常溪萍是“好同志”的理由是什么？你杨西光同“反革命分子”常溪萍到底是什么关系？

8月25日晚上，上海师范学院三名学生贴出一份长达万字左右的大字报，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批判上海市委的严重错误》，内容是指责市委“包庇”常溪萍，主要矛头也针对杨西光。大字报上说：（1）常（从北大）回上海，市

委提升他为教卫部部长，8月15日杨西光竟说“这是市委作出决定，上报中央批准的”。（2）今年5月（？），北京大学寄来常溪萍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材料，杨西光竟说是一般材料。（3）北大聂元梓等的革命大字报，市委整整压下十多天。（4）杨西光说：“我们没有发现常溪萍在上海有什么问题，华东师大的同学对他印象也很好。市委是根据常在上海的表现提升他。”（5）杨西光说：“北京来了大字报，让北京去作结论。”大字报认为这些都是上海市委特别是杨西光包庇“黑帮分子”常溪萍的铁证。

曹荻秋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8月15日回到上海，16日晚即去华东师大召开部分师生的座谈会，针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谈自己的看法。没有几天，曹荻秋的谈话就遭到大字报的“驳斥”。而那“驳斥”的大字报却来自复旦大学的红卫兵。8月22日，在江湾体育场东司令台下面，贴出了用20张报纸写的大字报，标题是《曹荻秋同志在师大的讲话必须批判》，由复旦大学“孙悟空”“打虎兵”“烈焰”战斗小组署名。大字报首先批评曹荻秋关于斗、批、改要很好结合的讲话“没有突出当务之急是‘敢’字当头和‘揭’字当头”，不利于发动群众。接着，在“关于常溪萍的问题”一节突出了“怎样看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这个关键性问题，其中点出“根据什么定常的性质？”大字报引用曹荻秋的话：“如果现在大字报就可以定性，就根据大字报行不行？我看不行！”那些“孙悟空”“打虎兵”们反问

道：“我们要问，常的问题不根据大字报定性质，又根据什么呢？”这个反问现在看来是那么荒唐！怎么可以凭大字报就定人家为“黑帮”、“叛徒”？就要打倒、砸烂呢？但在当时却振振有词地提出来作为曹荻秋“包庇”常溪萍的“罪责”来批判。

过了没几天，大字报的调门越发升高了。9月3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大批矛头直接指向市委的大字报，显著的特点是再不称呼杨西光、曹荻秋为同志了，而是给他们戴上了“黑帮分子”“罪魁祸首”“反对毛泽东思想”“修正主义”等等帽子。另一个特点是文字冗长。几篇大字报每份都在万字以上，但内容多是老调重弹，人云亦云。帽子越大越好，口号越“左”越好，文字越长越好，贴出来制造声势，为了“轰动”！内容可以不管，也不必负责。这在当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中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一股“潮流”。9月3日复旦大学贴出的最长的一篇是“换新天”战斗小组写的，标题为《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约1万7千余字，用了70张白报纸，就是这种大字报的典型。同天贴出的“打虎兵”战斗小组写的大字报，则把曹荻秋有关常溪萍问题的谈话说成是“射向革命师生的大毒箭”。说把常溪萍送到北京去解决问题是个“大阴谋”，是“为黑帮分子保驾，釜底抽薪”；说曹强调搞好本校、本单位运动是反对革命大串连。最后说“曹荻秋是别有用心的，在玩弄权术，转移运动方向”，提出“必须砍断曹荻秋的毒箭”。措词用语都体现势不两立的敌我矛

盾性质了。

由于杨西光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那里的造反派提出了“打倒杨西光，砸烂杨家店”的口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纷纷来串连。一批北京来的红卫兵扬言：“杨西光完全够格了，在北京早已把这种人揪出来了！”原复旦大学教师、协助张春桥、姚文元撰写《评〈海罢〉》的朱永嘉等人，回到复旦大学来造校党委的反，并立即与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结合起来攻击上海市委。11月20日，聂元梓等亲临复旦大学，与那里造反派一起制订了（继揪斗常溪萍之后）打倒杨西光，扩大缺口，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计划。当时成立了“炮打杨西光指挥部”，由复旦大学学生赵基会任总指挥。12月2日、3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打杨大会”。12月10日又在虹口体育场召开有5万人参加的批斗杨西光的大会，勒令市委负责同志到场陪斗，勒令市委立即上报中央“撤销杨西光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监督劳动”。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造反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市委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身上了。12月18日，市委机关9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所谓“后院起火”的造反大会。1967年1月6日，演出了一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刮起了一月反革命夺权的风暴。

上海市党政大权终于被篡夺了。

常溪萍问题在江青、张春桥整个阴谋篡权行动中曾经起了一种“打开缺口”的特殊的作用，常溪萍本人的命运还能有什么指望吗？！

（五）落井下石，常溪萍被迫害致死

常溪萍被所谓“揪出”以后，即陷于不断地挨斗受批的境地。不仅是华东师大一个学校，而且有华东化工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海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许多大专院校的造反派，都抢着把常弄去批斗。8、9、10月份正是全市运动急速升温、乱揪乱斗和各种过激行为大量出现的时候，常溪萍挨斗时，头顶高帽，颈挂黑牌，长时间弯腰、罚跪，揪头、拳打脚踢，都是家常便饭。有次批斗，常从头到脚都被贴上大字报，全身衣服都有浆糊粘着。

1966年12月29日，由华东师大造反大队等组织策划，搞了一起所谓“红色风暴”事件。他们在共青场召开了游斗大会。有些人用几根绳子套在常溪萍脖颈上，四面八方拉着，一会儿从南到北，一会儿从东到西，叫嚷着“绞死常溪萍！”还用竹竿赶打，在校内外游斗。常溪萍被拖得冷汗直冒。

常溪萍开始被“揪斗”时，是由华东师大派车到市委教育卫生部把常“押送”去的。斗完后，再送回来。但后来揪斗频繁，斗完后往往不送回来，而被扣在批斗单位过夜。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后，市委教育卫生部也被夺了权。部的造反派

负责人认为，常溪萍来部工作的时间不长，主要“问题”在华东师大，部造反队的“勤务组”曾讨论把常交给师大看管。粉碎“四人帮”后，据徐景贤交代，教育卫生部造反派“勤务组”的负责人曾口头上请示过他，在他的同意下，常溪萍在1967年5月10日从教育卫生部拉到了华东师大，由那里看管“审查”。从此，常遭受到更严重的摧残迫害。

对常溪萍的批斗愈益频繁了，到后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谁想拉出去斗就拉去斗。一个班级可以斗，三五个人的战斗组也可以斗。有段时间，常每天从早到晚都受批斗，直到深夜拖着疲惫不堪的受伤的身躯回来，还被迫继续写所谓“交代”。

当时学校的文艺小分队演戏，也把常溪萍拉上舞台，假戏真做，当“活靶子”。台下喊起“打倒常溪萍”口号，台上就将常猛然推倒在地，几只脚一齐踏上去，有时还用枪托等敲击常的身体，一边狂叫“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常被打得遍体伤痕，爬不起来，就被拖到后台一丢了事。

虽然常溪萍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坏，他忍受着，熬过了1967年苦难的日子。但是，1968年刚开始，那个已经盘踞在“市革会”主任宝座上的张春桥，竟亲自来到华东师大，落井下石，对常溪萍下毒手了。

1968年1月15日下午，在华东师大全体师生的主席台上，突然出现一张尖嘴猴腮的脸，他就是当年赞同常溪萍向

中央写信反映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而这又正是常溪萍所以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根本原因）的张春桥。他真有翻脸不认人的能耐。他蛊惑人心地说：“华东师大在我们上海是很有名的，这个有名无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出了常溪萍。（注意哪，把常溪萍是上海市委委员、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曾经与你张春桥共事，重要事情向你汇报请示，都一概“回避”了。）有了常溪萍这个对立面，就有红卫兵。事物发展就是这样的，总是有对立面出来，有打倒他的力量出来。”“你们红卫兵有打倒常溪萍的战功！”张春桥继续煽动说：“不要认为校革委会成立了，就太平无事了！要把队伍清理好，把坏人清除出去！”

从1967年秋开始的大规模迫害干部、群众的“清理阶级队伍”，当时正逐步进入高潮。“把坏人清除出去”，常溪萍是现成的全校最大的目标。张春桥“视察”师大半个月后，1968年2月2日，常溪萍被隔离审查。

聂元梓等虽然发明了所谓“社教运动的叛徒”这个新名词，但是人们稍加琢磨，就会感到不对劲了。“叛徒者”，有投敌叛变行为之徒也。社教运动终究是我们党领导下的运动，即使是常溪萍拒不执行党所规定的社教运动的方针政策，最严重的也只是违犯党的纪律问题，怎么能与过去战斗年代向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助纣为虐相提并论呢？！于是，那些“清队”的上下主持者们，竭力要把常溪萍打成一个真“叛

徒”，于是就反复“审查”历史，逼供诱供，内查外调，夜以继日，车轮大战。在整个隔离审查期间，批斗会几乎每天不断，从早到晚，常一天要连续挨斗三次，甚至遭到残酷拷打。但是，历史不容篡改，事实终是事实，常溪萍的历史是清楚的，没有任何问题，那些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罪名终究沾污不了常溪萍的声誉。然而经过这一段日日夜夜的折磨，常溪萍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了。他本来就有的糖尿病、慢性肝炎、美尼尔氏症、胃病等，相继复发。人命危浅，常溪萍的病体显然难以长期支撑下去。

1968年4月4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再次公开点名攻击常溪萍，又一次落井下石。他说：“我们上海有没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我们说有的。最近几天我看到材料，华东师大不是有人起来为常溪萍翻案吗？常溪萍这样的人，我看在全市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了，现在居然有人跳出来要给他翻案，说常溪萍是个好同志！”为常溪萍翻案，且又挂到为“二月逆流”翻案，那还了得！于是，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帮报帮刊就竞相发表社论、编者按等等，大放厥词。4月5日《文汇报》社论《右倾翻案风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文中说：“在上海，一股右倾翻案风的逆流也是存在的。……最近，在一个大学里，还有人公然跳出来，为臭名昭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鸣冤

叫屈。”4月11日，《文汇报》又在一篇编者按中说什么“那一小撮走资派，我们虽然罢了他们的官，撤了他们的职，但他们没有死心，他们时时刻刻在准备翻案、复辟。值得深思的是，象常溪萍这种投靠彭真的大叛徒，为什么居然还为他翻案呢？这就说明，要彻底打倒这一小撮凶恶的敌人，还要化很大力气”。编者最后杀气腾腾地说：“谁想为他们翻案，那就和他们一起上‘西天’！”

尽管常溪萍根本不知道有人为他写大字报鸣不平，但既然是张春桥讲了话，又大量宣传常溪萍等是“时时刻刻准备翻案复辟”的，那疯狂的镇压还能不落到常溪萍头上吗？在张春桥讲话后的一个星期，1968年4月11日晚上，常溪萍在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斗会会前，已被打了一顿；会上，那个任历史系“革委会”委员、红卫兵团团长，又抓住常溪萍的头发，拳打脚踢；会后，一批打手又把常溪萍拖到文史楼底层一间较小的教室里，命令常低头站立，突然敲击常的头部，又用扫帚柄毒打常。打手们狂叫：“常溪萍你敢翻案吗？！你敢吗！”扫帚打坏三把，打得常在地上翻滚，脸青鼻肿，皮开肉绽，头部冒血，嘴角淌血，开始时还呼喊“你们不要打，我吃不消了”，后来喊也喊不出了，躺在地上起不来。而那些打手们仍疯狂叫嚷“打死你这老狗！打死你这老狗！”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下，常溪萍旧病新伤急速恶化，身

体日益衰弱。但当时既不给看病吃药，甚至连理发、洗澡都不允许。常被关押的房子里臭气熏天。来向常了解情况的“外调”人员受不了那股气味，只好把常带到室外去问话。据学校肝炎食堂工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反映，常溪萍开头还吃二两饭，后来只吃一两。批斗会时间晚一些，食堂打烊了，连一两饭也吃不上。

1968年5月25日，距张春桥第二次落井下石后不到2个月，常溪萍终于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人间。

星转斗移，天地重光。10年以后，1978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复查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联合作出了《关于常溪萍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确认：常溪萍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彻底推倒“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强加给常溪萍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年5月31日，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常溪萍同志骨灰安葬仪式。

七、趁乱而起的“工总司”

1966年秋冬，江青、张春桥等步步加紧了搞垮上海市委、篡夺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趁大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连的时机，煽动“小将”们把“造反”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还暗中唆使少数红卫兵去工厂煽风点火。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便趁乱而起。“工总司”成立后，立即制造并参与震惊全国的“上海三大事件”，即“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工总司”成为江青、张春桥等搞乱上海、乱中夺权的极其重要的力量。

（一）江青、张春桥等唆使红卫兵去工厂串连，发动工人造反打倒上海市委

江青、张春桥在三十年代曾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都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文革”初期，江青出于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曾拉过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市委书记陈丕显，要陈跟随她走，美其名曰她要当陈的“顾问”，被陈丕显断然拒绝。从此江青记恨在心，以后多次说什么陈丕显不听她的话（即不听江青的“指挥”），“死不回头”等等。于是，江青和张春桥等下决心要搞垮上海市委，搞掉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同志，篡夺全市党、

政领导权。

1966年8月底9月初，大批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他们在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门前贴出“万炮齐轰上海市委”的大幅标语。在与上海群众的彻夜辩论中，不少北京红卫兵公开声称是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的，说“江青××是支持我们的”。红卫兵的行动震惊了全市，动乱加剧。

不仅如此，江青、张春桥等还要一些红卫兵到工厂里去煽风点火，联合工人“造反”。这在当时是直接违背中央的规定的。中共中央1966年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指出：“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但江青、张春桥等早就阴谋策划要搞乱工厂了。张春桥、戚本禹在接见“北航红旗”（全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五名红卫兵的谈话中讲得十分露骨。张春桥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做”，“有的生产秩序，也是要打破的”。“至于怎样做，你们去闯，去摸索经验”。红卫兵提出有人反对他们进工厂，张春桥奸笑着说：“这是一件新事物，当然有人反对”。“好，还是靠你们去闯吧！”有“中央文革”的撑腰、鼓劲，一些红卫兵到上海后就“闯”到工厂去，提出要搞工人学生联合运动（简称“工学联”），串连工人起来造工厂党组织和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工厂企业的情况，6月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

召下，也程度不一地搞过一阵子大鸣大放，贴了一些大字报。后来市委明确规定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等系统的“文革”运动要与“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度放慢了进度。但9月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这些系统的局级机关和部分基层工厂企业相继出现了少数人起来造党组织领导的“反”。特别是10月以后，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驱赶与批斗“四清工作队”的浪潮中，各工厂企业职工中涌现了名目众多的“战斗队”“造反派”，统称为“造反派”。外地的和本市的红卫兵去工厂串连，自然找上了这些造反派。

（二）工厂企业里最早起来“造反”的代表性人物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基层工厂企业，最早起来“造反”的，成份极其复杂。他们中相当多数的人是怀着各种对党对新社会不满的情绪而“造反”的。他们自我标榜“造反”是什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暗中起极大鼓动作用的是另一种说法：“受压迫者要造反，受压迫者最革命！”尤其是其中“造反”行为凶狠的所谓激进分子，极大多数是品质恶劣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流氓成性的社会渣滓。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造反派”的大小头头，成为江青、张春桥等打倒上海市委的重要社会力量。我们在这里且举王洪文及其几个小兄弟的情况为例，他们在最早“造反”的人物中是有代表性的。

王洪文在“文革”中曾被一些人吹捧为“种过田，做过工，当过兵”的“工农兵革命‘左派’”，我们且撇开他借“文革”而飞黄腾达以后的表现不谈，他在“文革”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们把他历来的表现作一较详细的记述。

王洪文1950年10月参军，1951年4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为通讯员，但他贪生怕死，不愿在前线，一直闹情绪，吵着要求调后方军乐队。1954年回国后，1956年在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学习时混入党内，但他又闹着要复员。同年9月复员后进了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进厂后开始做辅助工，他大吵大闹，要做技术工，说“如果不参军，我技术早就学会了”。后调粗纱车间保全平车队学做保全工，他只愿做轻活，不愿干重活、脏活。不安心学技术。他对一起工作的陈师傅说：“说心里话，我不想吃技术饭。”陈问他想吃什么饭？他说：“想吃政治饭。”1958年4月，二纺工场长日班党支部改选，王洪文被选为支部委员，得票较多，王扬扬得意以为这次可以当支部书记了。不料上级党组织批下来支部委员分工名单，仍由原来支部书记任书记，王只是不脱产的支部委员，他大为不满，从此事事与支书闹对立。1960年3月，王洪文被借到厂保卫科搞民兵工作。不久，厂里成立武装部，民兵工作从保卫科划出。王积极活动要去武装部，认为“起码当个连级干部”。组织上没有同意，他又大为不满。同年

7月，王正式调保卫科任保卫员，列入干部编制。8月，厂里搞工人工资调整工作，干部工资暂不调整。他破口大骂：“他妈的，不从二纺调出来，倒好加到工资，现在反而吃亏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支部书记动员他把粮食定量从45斤减为38斤，他破口大骂：“他妈的，国家困难，困难到我头上来了，这是什么社会？什么政策？要把人都饿死了！”

1960年9月，工厂领导动员王洪文去崇明参加围垦劳动，他态度抵触说：“我去过朝鲜战场，已经历过艰苦生活，保卫科那么多干部，为什么偏叫我去？”经过反复说服，才勉强同意到崇明去。到那里后，满腹牢骚，经常向周围人发泄，说“我们厂领导对我有看法，因为我平时经常和领导顶。叫我来崇明是对我报复”。“我们这些人都是领导看不惯的，被排挤到崇明来的”。他在崇明表现很坏，装病不参加劳动，四处游荡，捕鱼捉蜻蜓、下象棋、打扑克。同年12月王患盲肠炎，他乘机要求厂领导把他调回，扬言“工作艰苦吃不消，崇明我不去了”。厂里没有同意，他赖在家里好几个月，到1961年3月才回崇明。由于他提出身体不好，当时领导上照顾他暂去百万沙畜牧场四大队队部工作。1962年2月王洪文被临时派往市区，参加杨浦区围垦指挥部招收农场工人的招工组工作，他又几次要求调回工厂，未被批准，于是在招工组大量散布对厂党委不满言论和消极情绪，在群众中影响很坏。10月，畜牧场曾动员王洪文留在

崇明办农场，他与那里负责人吵了一架。他对别人说：“张书记要老子留在这个鬼地方，我和他吵了一通。张书记不给我转党的关系，老子十年以后再入党。”“要我留下来，他妈的，坚决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大不了开除出党。”招工组结束，与王一起工作的人集体回崇明了，唯独王洪文坚决赖在上海不走，当了崇明围垦的逃兵。到同年12月下旬，他硬闹着要回厂，经工厂同意仍回到保卫科当干事。他看到科里一个内勤提拔为保卫科副科长，争着要做内勤，对别人说：“保卫科通常是由搞内勤的提拔当科长，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1963年9月，王洪文在工资调整中提了一级，从52元加到64元，但他不满足，一面向领导吵，一面大造舆论说“外厂有破格升级，特殊情况特殊照顾，象我这样的人，76元拿不到，71元总好拿”。没有得逞，又大发牢骚，说“我这种人一辈子是过新民主主义生活了”“老子革命不算晚，到过朝鲜卖过命，弄到现在只有60几块臭钱，能派啥用场？总有一天，老子要给这些人算帐”。1964年7月，保卫科调走一名副科长，王洪文又造舆论说：“这次该换到我了。”他要别人去向厂党委反映“据公安局同志说，象我们这样大厂，保卫科起码要配二个科长。”1965年厂原武装部副部长因故被撤职，王又活动要当武装部部长，对干部科科长说“我是复员军人，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指武装部长）。”王洪文身为厂保卫科的干部，但他包庇岳母偷窃厂里大量花衣布，他自

己也将厂里花衣布偷回家做衬衫，穿在身上，在群众的揭发下，不得不脱下来交公。他还偷了厂里的木料拿回家去。

王洪文在里弄中表现也不好。1964年年底，定海街道第五居委会干部余凤珍就曾写信反映居住在定海路194号的王洪文种种劣迹（偷盗工厂的东西为其岳父做窗户、橱子等）。1966年6月，余凤珍到十七厂贴了《王洪文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揭发王在里弄中敌我不分，公私不分，好逸恶劳，挑拨离间等行为。王暴跳如雷，狂叫“他妈的，把老子的‘文革主任’给吹了”。（王得势后，余凤珍遭到残酷迫害）

以上就是王洪文在“造反”前历史上的实际表现。他长期以来认为自己是受压制的不得“志”者。其实，他是个思想品质恶劣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在一定气候条件下由极端个人主义发展成为大野心家、阴谋家，最后身败名裂，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文革”爆发，他在上棉十七厂首先跳出来“造反”，纠合一些人贴大字报攻击厂党委和驻厂的“四清”工作队。

当时“工总司”的第二号人物潘国平，是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他是这个厂有名的小流氓，厂里称他是“无政府主义的根子”。据他自己说早就想搞“希特勒那样啤酒馆式的政变”“当上总统，兼任司令，掌握兵权”。对潘国平，我们不想多费笔墨介绍，虽然他后来确实当了一阵子“工总司”的副司令，但连张春桥也哀叹他是一个保不住的“阿飞司令”，1967年1月反

革命夺权后不久被群众轰了下去。张春桥、王洪文等几次再把他扶上台，然而他终究是本性难移，名声太臭，上台就做坏事，再被轰下台。

陈阿大，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人，是这个厂最早起来“造反”的。陈阿大被张春桥称赞为“优秀的工人新干部”。他究竟是什么样人呢？1955年他13岁时就与附近地区一些地痞流氓鬼混，打群架、偷东西、赌钱、侮辱女青年，样样都干。到1958年，他的那些同伙大都被政府收容送去劳动教养，他因年纪最小，经教育后释放。后进中华船厂当临时工，不久又混进了部队，劣性不改，目无组织纪律，是个吊儿郎当的“油条兵”。退伍后进了良工阀门厂。在工厂、在地区他都是个横行霸道的恶棍，动辄打人骂人。

“文革”开始，有人揭发陈阿大的父亲窝藏一个资本家的黄金，其弟陈阿二寻衅殴打揭发人，被扭送到公安派出所。陈阿大纠集一些人围攻派出所，强迫派出所贴出红纸布告为其父亲平反。陈阿大由此更加尝到打砸抢以势压人的“甜头”，后来人家说：“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陈阿大。”

陈阿大是抱着“胆大就有官做”的想法“造反”的，当初还只想“造反成功弄个厂长副厂长当当”，却不料后来官越做越大，因此他胡作非为、残害群众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黄金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也是全厂著名的小

流氓。他从小对现实不满，道德败坏，曾伙同别人密谋偷渡出境未成。在该厂“四清”运动中，群众对他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在车间职工大会上曾对他批评教育。“文革”爆发，他以“受压者”身份起来“造反”，疯狂地进行打、砸、抢，把曾经审查过他的问题的人揪到厂里毒打。

戴立清，是又一个被群众称为“五毒俱全”的流氓恶棍。他1956年分配在甘肃省城建局工作，1961年离职倒流回上海，搞投机贩卖活动；1965年进江南金属制品厂（后改名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与厂里一女艺徒关系不正常。厂支部书记与人事保卫干部曾找他谈话，指出其错误，责令作书面交代。为了应付过关，戴立清写了检讨，但怀恨在心。“文革”开始，1966年8月底，他趁机“造反”，把支部书记赶出办公室，夺了工厂的领导权。后活动在社会上，成为临时工造反组织“红色工人造反队”的头头。

马振龙，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1961年秋曾勾结社会上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兜售金戒子等东西，又与一资本家合伙私设地下工场。“四清”运动中，马所在厂追查他上述问题。“文革”爆发，马振龙口口声声说“要报仇，要算帐”，起来“造反”。

王秀珍，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据该厂职工揭发，“文革”前她是全厂闻名的“吵工资，吵房子，吵位子”的“三吵”人物。

金祖敏，1956年7月进上海电机厂当工人，1960年入党，后担任10车间脱产团支部书记。由于他平时到处说谎吹牛，在厂里得个“金牛皮”的外号。电机厂“四清”运动后，车间党支部和“四清”工作队认为金政治素质差，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个人野心，不宜担任车间脱产干部，因此下放到工段任不脱产的副工段长。金从此记恨在心。1966年8、9月间，他串同一些人贴出“貌似人，实是鬼，反党老手×××”等恶毒诬陷领导干部的“造反”大字报。又据电机厂与金祖敏同宿舍的一些工人揭发，某天金祖敏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昨晚，我做了一个好梦，我被选中当上了驸马，做了大官。哈哈！我当了大官，你们大家都可以弄点官做做了。”这虽属笑话，却也颇能反映其时刻梦想往上爬的为人。他“造反”后积极投靠“四人帮”，确实当上了“大官”。

以上这些人，都是靠“造反”起家，在趁乱而起的“工总司”中掌握实权，成为“文革”十年中煊赫一时的人物。但稍为了解一下他们在“造反”前的表现，就会明白他们原来都是这类家伙！他们后来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最后受到人民的严惩，决不是偶然的。

（三）由一些红卫兵充当助产婆，“工总司”造反组织出世在红卫兵去工厂企业搞“工学联”活动的同时，上海部分工厂里的“造反派”也开始了相互串连。例如1966年10月下

旬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听说上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等15人，曾去北京“中央文革”告状回来，就赶到十七厂“取经”，从此结识了王洪文，后来结成死党。10月28日王洪文在上海市委红卫兵接待站门口结识了准备去北京“告状”的上棉三十厂技术员王秀珍等，双方开始频繁串连，等等。红卫兵通过辗转介绍，结识了更多的工厂“造反派”。

1966年10月5日、6日，“北航红旗”吕英豪、中央美术学院包炮、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杨小兵等外地与本市的红卫兵，通知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于6日晚去上海愚园路311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参加“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策划成立上海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当晚到会参加的有17个工厂，约30余人。其中有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廖祖康，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童海龙，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上海标准件一厂陶国正，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上海铁路局江湾装卸机械厂谢鹏飞，上海八二二厂岑麒麟，上海第三钢铁厂戴祖祥，上海保温瓶二厂范佐栋，沪光灯具厂黄文海等人。

会议由包炮主持。一个北京的红卫兵先在会上“介绍”了北京的“造反”情况。然后他煽动说：“你们这些单位的工人受压迫，要造反，就要杀向社会，象红卫兵一样，组织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这样才有力量”。因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

题”，我们“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还要“罢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官”。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听了以后，纷纷诉说自己“受迫害者”，叫嚷“受压者要造反”，说：“上海市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还造谣说：“我被打成了反革命，上海市委还下令给公安局，待时机成熟，就要缉拿归案”。王洪文无中生有地争着说他在“四清”运动中，揭发了厂党委包庇反革命的问题，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他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的。陈阿大提出：首先要“向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要“收集市委的材料”，“把曹荻秋揪出来”等等。会上喊出了“坚决打倒上海市委！”“打倒华东局！”等口号。接着王洪文又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现在这里开会，这样议论，如果被公安局发现了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要被公安局抓起来，大家怕不怕，我是不怕的”，“我是造反造定了”。这样一煽动，大家都讲不怕。

这伙人，为了今后“相互可以支持”起来“造反”，都同意红卫兵提出的建议，要建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对于组织的名称，有人说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的补充说：“还应加上‘革命’二字，以免别人误解。”这时，王洪文又站起来说，在司令部前还应加上一个“总”字，全称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样，全市的工人都归我们管了。这

“总”字一加，在场的个个拍手叫好，一开始就暴露了这伙人的野心。

至于王洪文怎么会当上“工总司”的头头的？据黄金海等交代：这天是黄金海先接到开会的通知，黄再通知王洪文来参加的。确定要建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后，大家同意参加会议的工厂都作为发起单位，各厂造反队头头都作为筹备委员。那时王洪文搞了“小动作”。他建议会议休息片刻，酝酿坐第一把“交椅”的人选。然后他把一个工厂的代表拉到一边讲：“我们两家厂来得晚，恐怕当不上头头，我看这些家伙政治上过不硬，等一会叫大家报报出身成份、工作经历。”会议重新开始后，王洪文马上提出上述建议，并自报了他政治身份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是贫农，现在是厂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打过仗，现在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一个。为自己挂了一连串的“金字招牌”。这样他就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司令”。还有一种说法，在那天会议上决定要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说至少要有8千人参加，才有“声势”。这时王洪文举了三个手指，表示他所在的厂是大厂，可以出动3千人，一下子占了参加大会预计人数的40%，人多势众，因而被推举为“司令”。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也被推举为成立大会筹备组的召集人，后即转为“工总司”“核心小组成员”。

那几个红卫兵又在会上建议：现在市委正在召开干部会议，

部署上海的“文革”运动，因此，“工总司”成立大会要抢在市委干部会议结束前召开，这样可以使市委措手不及。于是就把会期定在11月9日，会场定在文化广场，由红卫兵出面去借，并负责大会的纠察。召开大会的“海报”和“造反宣言”也由交通大学杨小兵等红卫兵负责起草。当时确定由王洪文主持大会，叶昌明、蒋周法、潘国平等人在会上发言“揭发、控诉”上海市委的问题。这些发言稿也都是由“炮司”红卫兵帮助撰写。

会上还确定了“工总司”造反队的袖章式样。可是制作造反队袖章需要的红布从哪里来？刚当上“司令”的王洪文一拍胸口，表示由他负责去搞。他叫嚷着：“现在我们造反啦！没有红布就去抢嘛！”11月6日深夜，王洪文带了陈阿大、黄金海、童海龙、戴祖祥等十几个人和少数红卫兵，窜到了八仙桥协大祥绸缎呢绒棉布商店。商店当时早已打烊。王洪文吆喝那帮“小兄弟”砸开店门，气势汹汹地大叫：“我们是造反派！”“我们要红布！”他们把店里值班人员推进店堂，监视起来，到处乱翻。红布未找着，抢了几段红色府绸（约50尺）就走。店里值班的拉着要他们付钱。王洪文耍无赖地说：“叫曹老头（指曹荻秋）付帐”。值班人员还是坚持要他们付钱。王洪文仗着他们人多势众，气势汹汹地把值班人员推在一旁，扬长而去。这伙人离开协大祥绸缎呢绒棉布商店后，7日凌晨又窜到金陵东路北京绸布店和上海市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他们砸开大门，冲

了进去，控制了电话，强行登楼，进入商场，抢走了300公尺左右红布。他们将抢来的红布都交给市手工业局一四七服装合作社的徐美英缝制，由“炮司”协助漆印，制成第一批“造反派”的袖章。7日晚上，王洪文指使黄金海、谢鹏飞、蒋周法等三四十人，并有少数“炮司”红卫兵参加，冲砸了上海铁路局江湾装卸机械厂厂部，抢走了所谓“黑材料”，带回“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工总司”这个孽胎，就以“打砸抢”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在社会上出现。

11月7日、8日，“工总司”成立大会的筹备组在一些红卫兵帮助下积极进行活动。“炮司”总部联络站所在地巨鹿路691号腾出房子给筹备组使用。参加筹备的人员有：王洪文（核心、上棉十七厂保卫干事）、潘国平（核心、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黄金海（核心、上棉三十一厂检修工）、范佐栋（核心、材料秘书、上海保温瓶二厂）、叶昌明（核心、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工）、耿金章（核心、保卫、上海纸浆厂工人）、戴祖祥（委员、上钢三厂工人）、徐美英（委员、总务，一四七服装合作社）、丁德发（委员、宣传、沪东电机厂）、缪南生（委员、上钢三厂工人）、蒋周法（委员、铁路江湾装卸机械厂）、陈金星（委员、保卫、上海色织拈线一厂）、岑麒麟（委员、八二二厂技术员）、戴立清（委员、材料秘书、上海标准件材料厂）、陈阿大（委员、总务、上海良工阀门厂钳工）、孙玉喜（委员、上

钢五厂工人）、黄文海（委员、材料秘书、沪光灯具厂工人）、张伯生（委员、宣传、人民电机厂）。此外，还有若干名工作人员，如王胜利（上海第三机床厂）、谢鹏飞、周国庭（铁路江湾装卸机械厂）、陶国正（上海标准件材料厂）、唐文兰、尹家龙、廖祖康（上棉十七厂）、童海龙（上海良工阀门厂）等。（在上述人员中，王洪文、耿金章、岑麒麟、唐文兰、尹家龙当时是中共党员。）

关于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人选，原先推定的是王洪文、潘国平、蒋周法、叶昌明、陈阿大、范佐栋等人。因红卫兵调查后提出范佐栋、陈阿大两人家庭有些“问题”，怕在大会上“被人抓辫子”，将他们从主席团名单中拉掉了；考虑到主席团成员中需要有一个女的，就将7日才参加筹备活动的徐美英加了上去。大会的执行主席谁来当？王洪文一定要推给潘国平担任。这实际上反映了王洪文既要争当头儿，又怕出头露面有风险的矛盾心态。在一些红卫兵的帮助下，筹备组讨论通过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宣言》，派叶昌明带几个人去延安西路200号市委接待站“造反”，要挟那里负责联系印刷十万份。几经纠缠，接待站同意他们去《解放日报》社印2万份。报社的同志说印刷任务很重，9日前交不出来。于是，他们就决定到处张贴海报，由红卫兵帮助油印，到全市去张贴。

《海报》的内容如下：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声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四）市委严词拒绝“工总司”的三项无理要求

11月8日上午，“工总司”派代表到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求接见，市委派了办公厅副主任刘冠英会见他们。“工总司”的人向刘提出三项要求：（1）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2）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3）提供宣传工具。要刘转告曹荻秋并限令下午2时前答复。

中共上海市委事先已获悉有人在筹备建立“工总司”，对此

曾作过研究。根据中共中央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部门要“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职工都应坚持岗位”，以及“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等规定，市委认为建立“工总司”完全违背了中央通知精神，是不能允许的。还认为这些人成立组织的“动机不纯”，主要成员“成份不纯”，因此考虑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不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并打电话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请示。陶铸的答复是：“不得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这个意见，当时在北京的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也是完全了解，没有提任何不同意见。据此市委通知各基层组织动员职工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受他们的煽动。市委按照中央的意见决定采取这一正确态度，后来就被王洪文等诬为“压制革命造反”、是“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的“三不”（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方针。

（五）开了一个乱哄哄的成立大会收不了场

11月9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原定大会在中午12时开始，由于前来参加会议的仅1千余人，大会时间不得不再再延迟，直到下午3时，会场上人才多了一些，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来了约1000多人，其中支持王洪文的有800余人，良工阀门厂和新新机器厂各来了100多人，建工局基础公司04工地来了约300人。另外，反

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等也派人到达会场。当潘国平宣布大会开始后，先由叶昌明代表合成纤维所“红旗战斗组”发言，他诬蔑攻击该所的“红雷小组”是市委树立的学《毛选》的假标兵，上海市委宣传这个小组的先进事迹，是个“大阴谋”等等。再由谢鹏飞代表上海铁路局江湾装卸机械厂“造反派”诬蔑华东局、上海市委、厂党委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这种“揭发”、“控诉”，当场响应者不多，而不满和反对者却不少。这时，有一个红卫兵跳上台来说：“今天的会议是北京红卫兵操纵的，是个大阴谋”，还说主持会议的潘国平不是上海工人，而是红卫兵等等。一时，会场秩序大乱，不少人跳上台去抢话筒，抢发言。潘国平慌忙地出示了他的工作证和工会会员证，并请同厂的工人出来证明。一个浪潮刚刚过去不久，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一些工人又冲上了主席台，揪住王洪文，斥责他是“政治扒手”。王洪文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慌忙撕下“主席团”成员的标签，连连说他是跟着别人来的，不敢站出来讲话，滑脚溜到后台去了。会场再次混乱。这时，担任大会纠察的张宝林，凭着身材高，喉咙响，把话筒抢在手中，呼吁台下的人鼓掌让台上的人继续发言，一些红卫兵也出来维持秩序。这样才使会议继续进行下去。会场中不少人递条子给大会主席团，要求市委负责人来参加大会。主席团也打电话和派代表去“揪”，

市委都没有同意派人来。后来，市委还是派了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到文化广场，但造反派因为他自称不能代表市委，就把他赶了出去。6时许，大会主席团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宣言》。这个《宣言》诬陷上海市委“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突出地提出了“我们要夺权”的口号。节录如下：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搏斗中宣告成立了！

我们上海工人从来就有革命造反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各单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组’、‘工作队’，以及采取其它种种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给运动订下了条条框框。他们抓住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阶级斗争

盖子至今尚未揭开，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后于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就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读完《宣言》后，大会在乱哄哄中结束。但主席团的成员们深深感到目的没有达到，不好收场，认为这样下台，是要“倒霉”的。尤其是王洪文，更是着急，他说，今天“上海市委陈、曹不来，也没有揪到他们，他们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拼命干了，把开会的队伍开到市委去，要陈、曹接见，承认我们‘工总司’”。他又到群众中造谣说，曹荻秋原来同意参加今天大会的，但到现在还不来，我们就在会场内等待市委的答复，要市委答应我们所提的三项条件。到了晚上9时许，王洪文又煽动在会场的群众举行游行，到市委去静坐示威，要曹

荻秋接见并答应他们的要求。游行队伍拉到延安西路市委机关，未达到目的。他们又欺骗群众说，曹荻秋在南京西路上海友谊馆开会，队伍又转了过去。这时市委派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等在友谊馆电影院内接见他们。张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劝说他们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和中央指示精神办事，回厂就地闹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些话，被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等人诬蔑为市委的阴谋，是对他们的“迫害”。闹了半夜，毫无结果。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与部分红卫兵商量，认为这样下去要被打垮的，现在只有一条办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告上海市委的状，控告陈丕显、曹荻秋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于是，在他们的煽动和裹胁下，参加成立大会的几千个造反派，冲向上海北火车站。随后，即制造了政治后果十分严重的“安亭事件”。

八、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把“文革”的动乱急速地扩散到广大工矿企业，是江青、张春桥一伙阴谋篡夺上海市党政权力的一个严重步骤，迅速发展为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影响全国，危害极大。在这一事件中，张春桥阴险诡谲的嘴脸，表演得尤为突出；一些打砸抢分子、投机分子、大小野心家乘机登上“文革”历史舞台。

（一）北上“告状”队伍在安亭车站，铁路交通严重堵塞

1966年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煽动和裹胁了几千人，冲向北火车站，叫嚷着“我们要去北京告状”，“控告上海市委”。他们在北火车站打碎了候车室窗口玻璃，撞坏了检票口的大门，冲上站台，阻拦满载乘客即将发车的626次列车，不让开车。戴祖祥等千余人强行挤上了这次列车，引起车内乘客的反对。车站内外挤满了人群。一时间，车上车下，站内站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上海站一片混乱。

上海市委把这一情况紧急地向中央办公厅作了电话汇报。据当时值班的同志答复：“先劝阻，实在不通就放行。”因此，上海站除将626次车发出外，又将原来开往郑州的756次列车临

时改为602次列车，让他们上了2500人，于上午7时发车。其余一些人仍留在上海站。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同意“工总司”这些人去北京，由国务院发出加以劝阻的指令。于是，602次列车在8时17分停靠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626次列车于当天中午在南京车站被拦住。

10日凌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工矿企业……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社论明确指出：“革命的学生应当坚信工农群众是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谁也不能包办代替。”社论特别提醒学生注意，“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上海站和安亭站都及时广播了这篇社论。中共上海市委派了工业政治部和各工业局以及有关工厂的领导干部，携带了刚印好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赶到现场广为散发，劝说那些造反队员回上海解决问题。市委考虑到这些人已经出来一天一夜，于是组织有关工厂送去15000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物资，动员安亭车站附近的工厂整天烧水、烧饭，供应馒头、菜粥。据不完全统计，供应了3千多斤粮食和5千多只馒头。可是，这些东西送去后，被“工总司”张宝林等一些头头锁在车厢里，不让群众吃，而他们自己却吃饱喝足，边吃边骂，说“这是修正主义的面包”，有的还吃

一半、扔一半。

这件事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向中央报告。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是“解放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生产影响很大”，“生产困难了，革命也搞不起来”。于是指定由陈伯达起草一份电报，拍发给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这份电报在起草时，张春桥是参加的。电报说：“据铁道部报告，上海有几千工人要乘火车来京，现在安亭停车，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了这种情况，请你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韩哲一接到电报后，立即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士法、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夏明芳等，赶到了安亭车站，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通过工作，不少人听从了劝说，乘上本厂来接他们的车辆返回上海了。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下下来卧铁轨，拦火车，企图堵塞铁路交通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午12时，北京至上海的第14次特快列车在安亭站被拦了下来。接着，一系列南来北往的列车都被迫停开。据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记录：“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来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有36趟北开列车不能出发；从安亭站到蚌埠，往上海来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起，共被迫中断达31小时34

分。

10日上午，“工总司”留在上海的叶昌明得知北上的这批人被阻拦在安亭车站，便和一些红卫兵头头们商量，又煽动一批人前往“增援”，还带去了一套扩音设备，在安亭车站进行广播，表示“慰问”，要他们继续坚持斗争。当晚，黄金海、张宝林带了“工总司”的《宣言》赶到安亭车站散发，谢鹏飞也带领数百人去安亭支援。11日晨，“首都三司”、“哈军工”和上海的“红革会”、“炮司”、“红东北”、“红反会”等20几个红卫兵组织联名发表所谓“安亭告急”的《告全国革命同胞书》，强词夺理地说，“工总司”的一批人“北上控告”，在“安亭拦车”，完全是由于曹荻秋没有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造成的。还造谣说现在这些人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吃饭，饥寒交迫，50%的人生病，有的连话都讲不出来；有的昏迷过去不省人事”，等等。

韩哲一等进行了一天多的艰苦劝说工作，收效不大。不得不向中央电话汇报。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复电韩哲一，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不同意这些人去北京，“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与此同时，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生产不能中断”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写了一封信，以电报形式拍发给滞留在安亭车站的“造反队员”，要他们立即回上海去，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立即来上

海，就地处理问题。电报内容是：

“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的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停留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末，你们的文化革命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

桥××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商量。”

张春桥乘专机来沪前，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对他明确指示，要设法动员“造反队员”从安亭撤回上海，迅速恢复铁路交通，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

陈伯达这封给滞留在安亭车站上的“造反队员”的电报传来以后，在“造反队员”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的痛哭流涕，认为上了当，有的认识到犯了错误。很多人上了接他们回上海的车子走了。“工总司”的一些头头更是慌了手脚，极为紧张。“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连声叫“糟”，唉声叹气地说：“闯了大祸了！”还指责别人说：“都是你们要来，我叫你们不要来，你们偏要来，现在闯祸了，我不管。”吓得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王洪文发迹后，这段表演却被编造为王洪文在车厢里学“毛选”，和到一节节车厢里去做“思想工作”。）也有一些人吵吵嚷嚷，骂陈伯达的这份电报“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将留下来的人锁在车厢内，不准下车。在车站通往外面道路上设卡，进行“盘查”、“拦阻”，骂一些要走的人是“叛徒”、“逃兵”，甚至对市委派去的工作人员进行围攻、殴打，骂他们是“保皇派”等等。

（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张春桥大搞政治投机

11日晚10时许，张春桥乘专机抵达上海。上海市委派去的工作人员迎上前去，问张是否要先和市委负责同志见面，或是通个电话？张春桥不理不睬，却去打电话给北京南下红卫兵“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要他们派人来陪同他去安亭车站现场。在车上，“首都三司”的人向张讲了一通“工总司”的成立经过，和在安亭车站“拦车”的情况。

12日零时左右，张春桥到了安亭车站。只见那里乱成一团，连个领头的人也找不到。在那里指手划脚的都是一些红卫兵。后来，总算找到了包炮、周谷声和潘国平等。张春桥与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工厂里举行了“谈判”。谈了近两个小时，双方意见不一致，没有谈通。这时，王洪文听到了谈判的消息，从车厢里钻出，挤了进去。张春桥在谈判中耍了“几手”。“一手”是吹他“来头大”。张春桥说，第一封电报是陈伯达和他两个人写的，第二封电报是陈伯达亲自写的，我“看过一眼”。这些电报“党中央都看过”，“请示过毛主席”。我这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毛主席是知道的”。并拿出了陈伯达亲笔写的“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回北京”的条子，以示证明。另“一手”是威胁、恐吓、“摊牌”。张春桥说，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是很巩固的，有强大的解放军，稳定的公安局，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运输的中断，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你们这样干是犯罪的，要杀头的。今天商量的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其它问题

回到上海再谈。“工总司”一些头头听了这些话，极为紧张，有些造反队员听后吓得不敢响了。那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却不理张春桥的那一套，情绪十分激动。一个女红卫兵当场要对张春桥采取“革命行动”，“造张春桥的反”，讲张“说了一大套，只有一个抓生产，没有一个抓革命”。有的造反队员说：“你是说我们工人放弃了生产，拦了火车，破坏了生产。生产上受到的一切影响，责任都应当由上海市委负责。”张春桥在红卫兵的指责下，神情尴尬，手足失措，那时他话锋马上转了，说：“上海的文化革命搞得不好”，“过去都是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办事”。表示：“（1）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2）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3）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并保证“回去不整你们，我可以通知给各单位”，“如整你们可以找我”，等等。张春桥还连连表示：“我不是坏人，我是搞革命的人”，“反对毛主席的人希望把生产搞坏”，现在他们“就抓住这个交通问题”，来“攻击我们”。所以“这个问题，不单单从生产上看，还是从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来看，都是个焦点”，但“我没有因为阻力而丧失信心”。张春桥在这里竭力把矛头转向上海市委，以攻击他人，抬高自己的手法来讨好这些“造反派”。张春桥最后老着脸皮半诱导半恳求地说：“最好你们给我这样一个荣誉，打电报给中央，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了，向中央汇报，向领导同志汇报，转告毛主席，说你们很听毛主席的话，叫你们回去都回去

了。”

这些话，潘国平听了还不完全“理解”，在会上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而开头站在角落里的王洪文，却领会了张春桥总要想找个台阶下，赶快靠上去，立即以“工总司”的“司令”身份，钻出来表示“同意”。张春桥认为王洪文此举帮了他的大忙。这也是张春桥看中王洪文，两个野心家、阴谋家相互结识和利用的开始。

谈判到了天亮，尚无明确结果，等在安亭车站的有些群众打算步行前往北京。张春桥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结束谈判，要代表派人将步行北上的群众追回来，在安亭车站召开群众大会。张春桥在王洪文、潘国平、包炮等人簇拥下，登上大卡车。他再次宣读了陈伯达拍来的电报，并重申他在“谈判”时的讲话，劝说大家回去。这样，又引起了一阵骚动。王洪文站出来想帮腔，爬上卡车的一些人冲他叫嚷着“王洪文滚他妈的蛋”，王不敢响了。潘国平想过来讲话，也有人叫他“靠边”。吵吵嚷嚷，乱成一团，有的抢了话筒，“控诉”自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到了中午，王洪文带头爬上了上棉十七厂来接人的车子，带了他们厂里的一些人先走了。下午4时许，张春桥也乘车离开安亭车站。许多人看看再也闹不出什么名堂，陆续地上车返回上海。还有500左右的“造反队员”，坚持不回沪，由耿金章带领，继续步行北上，走到了苏州。

中共上海市委了解到安亭车站的情况后，12日即发了沪委〔66〕第113号文件。全文如下：

本市有些工厂部分职工，集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部分人要求去北京，列车达到安亭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达到安亭，说服他们回到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同意回来。

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起闹革命、搞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二、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以上几点要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依靠群众来共同搞好这个工作。

从安亭回来的造反队员，有一部分又聚集在文化广场，未直接回厂。13日凌晨4时，王洪文也赶到文化广场。他对从安亭回来的人说：“你们统统回去，回厂去！”惊慌地说：“现在不走，天一亮，就走不了了。”说完，自己就滑脚走了。上棉十七厂的人见王洪文一溜，也纷纷离开文化广场，一时引起全场混乱。但黄金海等一些感到这样搞的结果什么也未捞到，反而要“低着头回去”，心犹不甘，就大叫大嚷：“北上的人还在步行去北京”，“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我们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经过黄金海等人的煽动，留下了一些人。于是他们四处打电话，急于找到张春桥。

从当时的情况看，按照市委12日通知精神再做些疏导工作，问题是可能妥善解决的。

然而张春桥另有打算。

13日早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许小昆（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学生）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实际上已经成为张春桥心腹的徐景贤，说他刚从安亭回来，有一部分由安亭返沪的“造反队员”，现在集中在文化广场，不肯回厂，要求市委对他们去安亭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他要求徐无论如何要转告给张春桥。徐立即向张春桥家里打了电话，将此事告诉了张。张立即表示他准备去文化广场同“工总司”头头商谈，并要徐去联系一下。徐随即赶到巨鹿路691号红卫兵“炮司”的联络站，在那里找到了潘国平、徐美英等人，约定下午在文化广场见面谈判。

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得到张春桥将与“工总司”代表进行谈判的消息，召开了有张春桥参加的会议。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承认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绝对不能承认这批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阻列车的行为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曹荻秋

为了慎重起见，在会议进行中挂电话到北京，向陶铸汇报上海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当即得到陶铸的同意，陶铸还指出，张春桥没有群众工作的经验。曹荻秋考虑到由他向张春桥转告陶铸的意见，张春桥可能事后不认帐，因此，要张直接听电话。陶铸重申了不能承认“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造反组织，不同意“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表示同意上海市委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张当时表面上也表示要按照陶铸的意见办。可是，张春桥此时已经决心要下一笔大赌注了。他下定决心要弄两面派手法，在与“工总司”头目们的谈判中采取同陶铸的指示、上海市委的集体意见截然相反的立场。

下午3时多，张春桥带着他的秘书何秀文来到文化广场，徐景贤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把张春桥迎到后台的休息室。不一会，潘国平和一些红卫兵等十几人陆续来到。谈判一开始，北京的红卫兵和交大红卫兵“反到底兵团”的申明全等人指责张春桥不该把去安亭的工人动员回上海，应该支持他们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还说陈伯达的电报是错误的。张春桥开始显得很尴尬，但他马上接过话茬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写的，是“受骗上当”。张春桥说自己也是在安亭车站听了“造反队员”的“控诉”后，才了解了全面情况。张春桥说，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只要陈了解了情况，相信陈会同意他的看法的，等等，这时，在广场里的一些人，不断地涌了

进来，后台休息室容纳不下，谈判改在文化广场西面的会议室进行。王洪文在这时才得到黄金海的通知，匆匆赶来参加谈判。谈判中，潘国平提出：“我们相信中央文革，相信陈伯达和张春桥××，但是不相信上海市委，我们回厂里肯定有些人要被打成反革命，有些人要受到围攻、扣发工资。”因此要求张春桥让上海市委发一个书面文件，承认他们到安亭是被迫的，是“革命行动”，不准对去安亭的人加以打击和扣发工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回厂。（其实，除承认他们去安亭是被迫的和是“革命行动”这条外，其他问题都已有文件下达了。）张春桥立即表示同意。潘国平等看到张点头了，立即和一些红卫兵头头们商议，由“炮司”的一个常委起草一份五项要求，即除潘国平等所提的上述要求外，又加上这次事件造成的后果要由市委和华东局负责、要曹荻秋作检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组织等内容。张看了他们草拟的《五项要求》后，立即表示同意，说：“其它几条都可以，关于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动这一条，我建议后面加上一句，就是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你们看怎么样？王洪文、潘国平等一听，想不到张春桥会这么爽快的同意他们所提的要求，喜出望外，马上表示赞同。张就在他们草拟的五项要求下面写了“同意”二字，签上名；又在他们要求刻一枚“工总司”图章的信稿上签名表示同意。

王洪文随即把张春桥签字同意的《五项要求》抢在手上，和一些人簇拥着张走上文化广场的讲台，王洪文以“司令”的身份，在台上叫嚷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随即念了这《五项要求》。其内容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随即走到讲台中心，对台下稀稀拉拉的人群讲了话。他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说他之所以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由于“上海市委不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为了蛊惑人心，他故意夸张地说：“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但）我不是把你们当作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到安亭去了！”接着，他大肆煽风点火，说“你们要和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曹荻秋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这些话，引起了台下的人狂呼乱叫，大

声喝采。就这样，张春桥施展出两面三刀的本领，把几小时前还在一起商量谈判原则的上海市委常委会领导集体、把市委主要负责人曹荻秋，统统出卖了，而他自己成了这股“造反”势力的“救世主”。

张春桥从文化广场回到家里，没有和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负责同志联系，立即向北京的陈伯达打了电话。晚上，陈伯达打来电话说，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张的汇报，他和江青都认为张对“工总司”这个组织，以及他们的行动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伯达表示他原先写的电报“太匆促”了。张春桥听完后，舒了一口气。

（三）围绕“安亭事件”展开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张春桥擅自承认全市性跨行业造反组织并蓄意陷市委于被动的出卖行为，引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的极大愤慨。他们三人研究后，即由陈丕显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张春桥这样做。陈丕显严词责问陈伯达：“你们给张春桥多大权？为什么原来说不承认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突然又改变了呢？为什么张春桥签字以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呢？为什么一切后果要华东局、市委负责呢？”等等，提出抗议。但那时陈伯达已与张春桥通过电话，也与江青商量过了，他一反过去不让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的态度，说：“要让春桥大胆处理这个问题，要相信张春桥，给

他这个权。”江青恼火地说：“没想到陈丕显给伯达××打电话，态度那样坏，一句一个为什么。”第二天早上，曹荻秋将情况告诉了书记处的其他同志，他们都认为不能同意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签字，于是曹荻秋再打电话给陶铸，汇报了这一情况。这一斗争就摆到了中央常委会上了。到了下午5时半，陶铸回电：“工厂文化革命情况，还没有完全掌握，要进一步研究。工人不搞全市性的组织，联络性质的组织可以，但不建立机关；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生产时间以外，可以交流经验。春桥已同意，那要做工作，改变性质。要春桥多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市委做另一方面工作。”（按这里所讲“改变性质”是指“工总司”不应作为全市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只能作为联络性质的机构。“那一方面”，是指“工总司”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各界反对“工总司”那种“造反”行动的人，当时已为数众多）总之，陶铸否定了陈伯达和江青的意见，也否定了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的做法。

上海市委根据陶铸同志的电报，于十四日发了一个口头通知下达给各单位，内容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他们搞起来的。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按照结社自由的原则，就同意了。

关于组织问题，中央精神是，工人不建立全市性

的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区以下，在不影响生产、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业余时间，可以建立交流经验的联络性组织，但不设机构。

已经建立了造反司令部这一类性质的组织，要按照中央这一精神，加以改变。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下达。

这时，陈伯达打电话给张春桥却说，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的做法。

15日晚，张春桥和“炮司”、交大“反到底”的一些人，气势嚣张地胁迫韩哲一、曹荻秋去苏州。王洪文带了一些人，为张春桥“保驾”。张春桥在苏州铁路中学和耿金章等人又进行了“谈判”。耿金章提出了又一个五项要求，比前更为苛刻。除与文化广场提的相同内容外，还要“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要上海市委用“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否则，该列于非法之行”。这里所说的“谣言”，是指“安亭事件”后，一些群众揭露“工总司”拦阻列车，破坏交通运输的真相。张春桥不仅表示同意耿金章等的要求，还拉拢、煽动这伙人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你们身上的责任更重了，要真正把革命担子挑起来，在革命斗争中学会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的工厂不会变颜色，

这个重大的担子，就落在你们这个造反司令部身上了。”这样，张春桥又把耿金章这股势力拉了过去。耿金章也不负“厚望”，回沪后，组成以这500人为班底的“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当上了“司令”，成了张春桥又一鹰犬和打手。

对这样的无理要求，曹荻秋坚决不同意，和张春桥在苏州争论了两个钟点，拒绝签字。说：“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凶相毕露地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张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进行胁迫，最后曹荻秋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和韩哲一一起签了字。五项要求的内容是：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向张春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提出如下五项要求：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组织，自11月9日以来，特别是到北京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领发盖有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袖章。

二、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

三、要曹荻秋检查，亲自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共大轿车送回家去。

四、要开动除广播电台、报纸以外的其他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不许再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谣言，否则，该列于非法之行。

五、对这次上北京控诉上海市委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会后，张春桥同意交大“反到底”红卫兵头头申明全的意见，由交大“反到底”兵团派人到南京去，“动员”戴祖祥等逗留在南京的千余人返回上海，并由张春桥签字，写了证明。

处理“安亭事件”的态度，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等与张春桥尖锐对立，泾渭分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反映到了中央。后来中央同意了“中央文革”的意见，上海市委被迫于11月21日发出了沪发（66）第116号文件，原文如下：

现将张春桥××于十一月十三日答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和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同志于十一月十五日答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印发。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务必切实执行。

此件应在各工厂公布。

这个文件发出，使中共上海市委处于极其为难的境地，尤

其是当时主持市委工作的曹荻秋，首当其冲，陷入各造反组织斗争的重围。但张春桥则又进一步策划打倒曹荻秋以实现江青反革命集团“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篡夺上海市党政权力。“工总司”北上南京的一批人回到上海后（后组成“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司令戴祖祥），张春桥立即去红都大戏院“接见”，对他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并由他导演了一场把曹荻秋“押进”会场的闹剧。会上要曹荻秋回答问题，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张春桥叫嚷着把曹荻秋“押下去”，然后，在会上煽动说：“你们造反派都看到了，这就是曹荻秋的态度。”于是，下面这批人就狂呼“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打倒曹荻秋的恶浪，变本加厉地在全市掀起来了。

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两个《五项要求》（简称《双五条》）后，在全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群众抗议的浪潮汹涌澎湃，日趋高涨。早在“工总司”冲砸火车站，挡阻列车事件发生后，身处第一线的上海铁路局职工，耳闻目睹，极为愤慨。在11月10日，以该局调度所职工王玉玺为首，组织了“二·七战斗队”，印发了《十万火急的呼吁》传单，对“工总司”破坏铁路交通和打砸抢的行为表示抗议。11月14日，他们又印发《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的传单，如实地揭露了“工总司”一伙人在安亭制造事端的真相，指出这个事件“给社会和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全市人

民纷纷行动，对铁路职工的行动表示声援。11月15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数百名工人前往上海市委，抗议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接着16日、17日、18日、19日，许多工厂的职工都起来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他们高举着“火烧张春桥”、“张春桥要向上海人民作检查”、“撤销《双五条》”等横幅，呼喊口号，进行集会、游行和请愿。全市形成了强大的抗议浪潮。

11月24日，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由曹荻秋主持。会议开始曹荻秋介绍了情况后，当场表示对张春桥逼迫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要求，他“组织上可以服从，思想上不通”，“有保留”。并责问张春桥，你“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为什么要把‘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也写上去？”负责工业生产的一位同志提出：现在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市委对《双五条》的签字），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指“工总司”），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市委社教办的一位负责同志说：群众说张春桥“怕死，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还说“老工人是有阶级感情的，对党的感情很深。”张春桥则狡辩说：“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没有感情。”但在事实面前张不得

不承认他的做法“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只是“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打电话”，并以得到陈的支持、中央常委同意、毛主席有指示为挡箭牌，还说：“你们可以打电话到中央去问”，等等，进行狡辩。一位副市长引用了几个生产数字说：“我们现在要作最艰苦的准备，乱无非大乱、中乱、小乱，小乱就象现在这样，生产影响百分之十，中乱影响就更大些，大乱就影响生活，成为瘫痪状态。”会场上纷纷对张春桥提意见，谴责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双五条》。

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处、常委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张在市委处于孤立的地位。市委的这次常委扩大会后来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

第二天（25日），张春桥在上海人民的一片抗议声和市委常委会的责问声中溜回北京。

张春桥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中，大搞政治投机。他深知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和江青早就策划要红卫兵到工厂去“串连”，要“冲破”中央的限制，找寻他们所需要的“造反”力量。据戚本禹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揭发交代，张春桥之所以胆敢违抗党中央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明文决定，违抗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的直接指示，违背市委

的集体决定，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这就是张春桥在11月12日从安亭车站回来后，迫不及待地首先挂电话和江青取得了联系，张对江青说陈伯达的电报行不通，表示他要承认“工总司”，和“工总司”一起造反，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核心的上海市委，得到了江青的支持。因此他便有恃无恐地敢于去冒风险、下赌注。但是，尽管有了江青的支持，张春桥也知道江青这个人变化无端，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说变脸就变脸。因此，张春桥也不免心怀鬼胎，惴惴不安。他曾说他在“处理这件事（“安亭事件”）中，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我是提着骷髅（髅）头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要坐班房，但想不到主席以后肯定了”。这次他的政治投机是成功了。

王洪文从安亭车站回来后，和一伙小兄弟在陕西北路一家点心店中吃宵夜，边吃边讲：“文化大革命是天大下乱，乱世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造反派形势大好，造到市里当市长，造到部里当部长，顶小当个厂长。”“不是党员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介绍（你们）入党嘛！”在得意忘形中，充分暴露出这个野心家的真面目。

九、《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人在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后，紧接着制造的又一个搞乱上海，以便他们乱中夺权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个事件后来被江青、张春桥等人吹嘘为“孕育了伟大的‘一月风暴’，有力地促进了《解放日报》新生的重要事件。”

（一）张春桥上海受困，江青调兵遣将

张春桥在上海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两个“五项要求”（简称“双五条”）。上海广大人民群众闻讯极为愤慨，他们自发地举行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刷大幅标语，纷纷要求中央撤销“双五条”，并要张春桥向上海人民作检讨。1966年11月18日张春桥被迫于上海友谊馆咖啡厅接见了19个厂的代表约150余人。会上，张被群众斥责得理屈辞穷。为了摆脱困境，他竭力进行狡辩。群众代表们提出：他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双五条”，不符合中央《十六条》的精神，违背了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工总司”是跨行业的非法组织；“安亭事件”不是革命行动，而是破坏生产，政治影响很坏的行动，等等。会上，张春桥不得不一再要求群众“谅解”“工总司”的行动和他

的做法，说他签定同意“双五条”只是按照“宪法规定”办事，“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是合法的”。张春桥在这时抬出“宪法规定”，真是莫大的讽刺。在林彪、江青等一伙的策划、煽动和直接指使下，经过几个月的动乱，宪法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如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住宅不受非法侵犯、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等，都早已荡然无存，你张春桥还侈谈什么宪法规定呢？！张甚至语无伦次地把“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等于犯法”这种在当时是要被“砸烂狗头”的话也说了出来。他在会上，一会儿说上海市委不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是因为市委“正在向中央请示，不好表态”，一会儿又说：“如果市委工作靠前一点，工作就会主动一点”。还说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双五条”，和陈伯达的电报是一致的，只是二人从不同角度讲的，陈的电报是从生产角度讲的，而他的签字同意是从“文化大革命”角度讲的。这种颠三倒四的狡辩和骗人的谎言，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11月19日，80几个工厂单位发起组织了“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与“工总司”对抗。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和中学红卫兵总部等群众组织对“赤卫队”予以积极支援和协助。12月6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20万队员参加的成立大会。从此，从学生到工人，到社会各界，到处掀起了抗击张春桥等人搞乱上海阴谋活动的群众性浪潮，张春桥在上海的处境十分狼狈。

消息传到北京，江青着急了，她与王力等人商量后，急忙叫人将聂元梓从北京大学接到中央“文革小组”一个不公开的办公的地点——花园街×号，她和王力对聂“面授机宜”，要聂带一些亲信赶赴上海，南下增援。11月20日，聂元梓窜来上海，张春桥早已派人在火车站迎接，把聂元梓等人送到上海一家高级宾馆——衡山饭店；后来怕引人注目，又把聂等转送到华东师范大学留学生宿舍。

聂元梓来到上海后，神气活现地摆出自己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又是北京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团长的架式。她说她们这次来上海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派，来“造上海市委的反”的，要“揪住常溪萍问题，打开市委的缺口，打倒上海市委”，来“推动全国运动”。11月22日，聂元梓在上海静安区体育馆内召集了有“工总司”、“红革会”、“上三司”、“炮司”等工人、学生的造反组织头头的会议。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自居，要这些组织的头头“联合起来”，“打倒上海市委”，“罢陈丕显的官，罢曹荻秋的官”。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为了摸清她的底细，有意识地问她：“罢陈、曹的官，中央同意吗？”聂元梓露骨地说：“现在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由群众提出来。中央有这个意思，但不能直接讲，下面提出来，中央就罢他的官了。”到会的那些头头原来就是谁也不服贴谁的，现在聂元梓要这些人在她的“吆喝”下

“打冲锋”，有的就不大愿意。会议无结果而散。

聂元梓这种做法，帮不了张春桥多少忙。她到上海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她自己的日子却不那么好过了。上海街头出现了不少“不要聂元梓到上海来当保姆”，“聂元梓滚回北京去”的大幅标语。不少人，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师生员工，到她的住处留学生宿舍来找她“辩论”。聂不得不被人“保护”起来。聂奉命来上海，本来是要帮张春桥忙的，现在忙帮不上，反而要由张春桥出面来为她“做工作”了。11月23、24日，张春桥连续两天在友谊馆电影院内“接见”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员工。会上，群众尖锐地追问聂元梓是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到上海来的？提出要叫她回北京去。面对群众的责问，张春桥的神情极为尴尬，不敢承认聂是“中央文革”和江青派来的，但心又不甘，于是寻找藉口，伪称她是革命师生来沪“串连”的。说“人家从北京来了嘛，应该欢迎”，以此搪塞群众，为聂摆脱困境。

（二）聂元梓串连发难，制造《解放日报》事件

聂元梓等在静安体育馆碰了壁后，她们就“串连”了“红革会”的一些头头，策划召开“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来打头阵。他们认为打倒了常溪萍就打开了市委一个缺口，“曹荻秋就自身难保了”。他们认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市委的“喉舌”，估

计必有大量的“修正主义黑材料”。因此想再辟一条途径，打开市委的缺口。于是，聂元梓又指派了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代表李醒尘到《解放日报》社去找那里的“造反派”，搜集材料。报社的“造反派”向李提供了在“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报社采访部主任徐学明等人写了题为《不能拿原则作交易》的大字报，不点名的批评了张春桥等情况。李即认为这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材料。李还要他们查一查报社有否发表贯彻《二月提纲》的宣传报导等材料，妄图制造事端。

11月25日，经聂元梓等策划由“红革会”出面筹备的“揭批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市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上三司”、“红上司”以及“赤革会”等派人参加了大会，聂元梓和首都三司的“司令”蒯大富“应邀”参加，这样，他们就从幕后策划，走到了台前指挥。开会这天，他们把曹荻秋也揪到会场。大会的横幅是“万炮猛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场内外贴了“上海必须大乱”，“曹荻秋必须彻底交待”，“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标语。

会议一开始，台上灯光大亮，聂元梓披了一件草绿色军大衣，俨然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和蒯大富一起，在“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一伙人以及上海一些红卫兵的簇拥下，走上主席台。聂元梓颐指气使地要李醒尘代表她发言。

李醒尘在发言中诬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庇常溪萍”，叫嚣“要造他的反，罢他的官，撤他的职，砸他个稀巴烂……”煽动上海的造反派“要万箭齐发，万炮齐轰，打倒以曹荻秋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接着蒯大富发言，他诬蔑“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顽固”，说他们很关心上海的运动，上海几次“乱”都没有“乱”起来，这次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要大“乱”下去。会上，有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发了言。最后，聂元梓对着曹荻秋叫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号，煽动群众把火烧向上海市委。

会后，他们要《解放日报》社报导这次大会消息，遭到报社的拒绝。11月27日，“红革会”又派代表到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次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9期，亦即这次大会的特刊，随同当天的《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他们说这期《红卫战报》揭发、批判了《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上海市委的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我们就要消毒到那里”，他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们的要求也遭到市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里，他们所说的要批判《解放日报》贯彻执行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什么呢？其中重要的一条是

“红革会”中的一些人发现了1966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为“罗思鼎”^①的《评文科教材——周扬在大学文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一文。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实际上在标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教育部门曾经顶过周扬，企图把这些部门说成是“红线”。“红革会”准备对该文进行“批判”“肃清流毒”，还要“揪出后台”，并拟将批判文章在《红卫战报》上发表。这篇《评文科教材》的文章是市委写作班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所撰写的，杨西光看后压着未发，而是经张春桥看后，并经他审稿同意发表的。因此，“红革会”准备行动的消息传来，张春桥一伙却首先慌了手脚，先是由朱永嘉托人向“红革会”头头打招呼，说：“这篇文章是张春桥同意发表的，你们要追后台，就追到张春桥的头上了。”接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又急急忙忙找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头头，说《红卫战报》不得发表批判“罗思鼎”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9期在《〈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中，严厉斥责“罗思鼎”《评文科教材》是“假批判真包庇”是“丢车马，保将帅”的黑文章，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抗中央十六条”。然后文章突然笔锋一转，说《解放日报》之所以敢登“罗思鼎”的文章，说

^①“罗思鼎”小组，是市委写作班内以朱永嘉为头头的一个写作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的，“罗思鼎”是他们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

明他们“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把后台说成是上海市委和杨西光。这种捏造的谎言是十分可笑的。

11月29日晚10时左右，市“红革会”常委劳元一带领二三百人来到市报刊发行处，再次要求将《红卫战报》登载的大会特刊，与《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又一次的遭到拒绝。他们又闯进《解放日报》社，向报社负责人提出三项要求：(1)《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2)《解放日报》必须全文转载《红卫战报》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3)把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和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他们。这些不合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报社负责人的拒绝。于是，“红革会”总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进驻报社，逼迫报社同意他们的要求。11月30日凌晨1时左右，“红革会”从各学校调集了大批人员，由李功佐带队，冲进汉口路274号《解放日报》社大楼，占领了楼下的发报间，扬言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准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行。上午8时以后，又陆续占据了报社的会议室、礼堂和一些办公室，并成立了“火线指挥部”。

“红革会”的行动立即得到幕后策动者聂元梓等人的狂热的支持。30日下午，他们派人在《解放日报》社附近进行场外指挥，颠倒是非地大肆宣传什么“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

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猖狂地为“红革会”打气鼓劲。他们进一步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市里一些造反派的响应。《解放日报》社内的“造反联合司令部”和《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铁骨红心”战斗兵团发表声明，支持“红革会”的行动。“赤革会”（全称“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聚集了数千人前往《解放日报》社门前游行示威，表示对“红革会”的声援。同济“东方红”兵团头头陈敢峰率领了100余人，进驻了报社。“上体司”司令胡永年也带了“尖刀班”，以“先遣队”的名义进入报社，参加了“火线指挥部”。

《解放日报》社被占领，已印好的报纸封锁在报社内不能出版了。《解放日报》被“勒令”停止发行的消息不胫而走，激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首先发表声明，反对“红革会”的无理行动，强硬地提出四点意见：(1)《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2)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红革会”应尽快撤出《解放日报》社；

(3) 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4)“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四面八方的群众纷纷来到汉口路报社门口,向报社的占领者提出责问:“为什么不允许《解放日报》发行?”高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报社大门紧闭,大门内外人们互相争辩甚至对骂。到了12月2日,报社周围人越来越多,马路上人头济济。许多人高喊“有理的出来辩论”“强烈抗议一小撮暴徒!”口号声此起彼落,要求那些入侵者撤出报社。占领报社的一方则辱骂门外群众是“保皇派”“死保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决没有好下场!”双方对峙,形势愈来愈紧张。

(三)“工总司”插手了

《解放日报》事件初起时,“工总司”王洪文一伙正通过北京南下红卫兵李卫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与报社内部造反派商议筹备出版《工人造反报》的事情。王洪文认为,“红革会”不应该仅仅为了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红卫战报》而掀起这场斗争,当时表示“工总司”不介入。

12月2日报社大门内外群众对立越发严重,门外群众酝酿要把占领者驱逐出报社。“红革会”李功佐等怕自己有被“冲垮的危险”,打电话给“工总司”的潘国平,寻求支援。聂元梓听到消息,急忙亲自出面,找到王洪文等进行密谈。聂对王说:

“《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纸的权”。把调子从“批判”上升到“打倒”、“夺权”。王洪文看到这个事件是“中央文革”派到上海的“代表”聂元梓在策划,而反对“红革会”行动的主要力量又是“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于是他改变了原来不介入的态度,同意派人“支援”。12月2日下午,他们参加了由“红革会”和上海新闻界造反派出面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制造声势。会后,王洪文、潘国平、戴立清纠集了700多工人造反队员冲进报社,后来又调动了静安区3000多工人造反队员前往《解放日报》社为“红革会”解围。潘国平等旋即把持了“红革会”的“火线指挥部”,成为主要指挥者。王洪文则又在报社附近的山东路体育场内建立了另一个“联合指挥部”,现场指挥策应支援。于是,“工总司”成为大闹《解放日报》社的主力。

12月3日凌晨4时许,王洪文等进入报社召开了指挥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耿金章、王腓利、戴立清、戴祖祥、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等。会上讨论了要市委派人来谈判的条件,王洪文提出这场斗争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发《红卫战报》,而是把市委的喉舌卡断。”决定组织四人“赴京控告小

组”，随带一千份《红卫战报》，去向“中央文革”告状。小组由马立新带领，王洪文派了上棉十七厂一个人作为工人代表参加。

（四）矛盾在激化，斗争在升级

12月3日早晨，“工总司”和“红革会”一些人，先后“揪”来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和患高血压、心脏病在家休养的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他们“勒令”李干城“在半小时内把不是‘红革会’的别有用心的人全部撤走”，否则，将调动更多的人前来支援，“如果影响生产，一切后果由李干城完全负责。”他们挟持李干城一起去揪市委书记曹荻秋，结果没有找到，就把正在发高烧，住在华东医院的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揪”了来，并挟持韩哲一、李干城去“驱散”报社外的群众。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即报告了党中央，请求指示。当时党中央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陶铸对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大意是：（1）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2）如果红卫兵冲击报社，要说服，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3）可以分开发行；（4）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韩哲一、李干城等同志被“揪”到报社后，那伙“造反派”胁迫他们签字同意《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在《解放日报》上刊登所谓消

毒文章，还要市委和《解放日报》社分开检讨。韩、李拒绝签字，当即遭受批斗围攻和人身侮辱。

12月3日下午，“赤卫队”总部散发了《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的传单。主要内容是要求中共上海市委坚持原则，不允许《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要“红革会”，“工总司”立即自动撤出报社。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社多数职工组织的《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和报社印刷厂工人组织的《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也印发了《解放日报事件真相》和《告全市革命群众书》，其中提到：“尽管五天来报社情况严重，……但我们一直坚守岗位，坚持编辑、印报，报纸的出版一天没有停止。所有印好的报纸，都完好的保存在仓库里”。这些传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同情和强烈反响，广大群众要求“红革会”、“工总司”立即撤出报社的呼声更高了。

12月4日，聂元梓再次窜到“联合指挥部”来，与王洪文等密议。以“中央文革”特派记者身份在上海活动的《解放军报》记者甄文君也参加了密议。当时，马立新等人去北京“告状”还没有回音。《解放日报》社内造反联合司令部也打电报给“中央文革”陈伯达，要求表态，同样也没有回音。聂元梓对“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头们说：“中央文革”没有表态，这种不反对的态度就是支持我们！聂要在报社里面的人“不要动摇，坚持到最后胜利”。“火线指挥部”发出了所谓紧急命令，狂

叫“头可断，血可流，《解放日报》决不能发行；我们一定要坚守《解放日报》社，坚决不能撤走一步”。

《解放日报》社前后门堆起了障碍物，由“工总司”造反队员严密把守。他们架设了高音喇叭，不断地广播攻击门外群众是“政治扒手”、“保皇派”。报社外面马路上人潮汹涌，人声鼎沸。人们愤怒地斥责占领报社的非法行为，强烈要求他们撤离。到了4日下午，矛盾更加尖锐，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门外群众要冲进报社去“同他们辩论”。门内的“工总司”等人员砸坏了报社的玻璃窗和办公桌椅，用碎玻璃和拆下来的木条等，朝大楼外的人群中扔掷。许多人被他们砸破了头、砸伤了鼻子、眼睛。门外群众情绪愈加激愤。有些人搬来汽车的跳板，猛力撞击堵住报社大门的乒乓球桌，当乒乓球桌面被跳板一头的铁钩撞了一个破洞时，里面的人竟把市委宣传部分部长蒋文焕和《解放日报》社的文革筹委会副主任三人拉到门口，用他们的身体去堵住桌面上的破洞。有的人还把外面捅进来的竹片弯过来朝蒋文焕身上戳，直到蒋文焕等被他们折磨得面色苍白，休克过去，由报社的职工将二人抢救出来，分别送到仁济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急救。韩哲一在报社内被折磨了一天一夜，体温升到40度左右，病情恶化，神志昏迷，也是在报社职工抢救掩护下，用担架送往医院。报社外面广大群众看到这帮人惨无人道迫害负责干部，更加义愤填膺，强攻一度达到高潮。

12月4日傍晚，王洪文带了一批“保镖”再次进入报社，竭力为里面的造反队员打气鼓劲，称赞他们“干得好”。5日仍在内外紧张的对峙中度过。

(五)“中央文革”指示为全面夺权开绿灯

12月5日晚，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意见”，大意是：“总的方面要支持，《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中央文革”的巨大压力下，市委派了书记王一平和常委、副市长宋季文到《解放日报》社“谈判”，被迫地在“红革会”提出的所谓《三项决定》^①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②上签了字。并于12月8日就此发了119号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

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和“工总司”的条件的消息传开后，哪些造反派兴高采烈，狂呼“我们胜利了！”但“赤卫队总部”和大学红卫兵总部，中学红卫兵总部等7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委的签字。12月6日，正值上海工

^①“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大致内容是：(1)《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3)《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

^②“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大致内容是：(1)支持“红革会”的要求；(2)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行动；(3)《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出公开检查；(4)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员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段落。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显示了一个严重的信号，即为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全面篡夺上海市党政权力的反革命活动开了绿灯。

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后几十万群众到《解放日报》社举行示威、游行，要“红革会”和“工总司”在报社里的人立即撤离报社。聂元梓又窜到报社，煽动“红革会”不要从报社撤出来，“要在里面坚持到市委垮台”。

12月7日，《解放日报》社大楼内各造反派组织在“工总司”头头主持下召开所谓“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局势，认为：目前“双方仍处在相持的局面，决战时刻还没有到来，市委被迫签字答应全部条件，‘造反派’已取得重大政治胜利”，决定大部分造反队员撤出报社。王洪文吹嘘“这是工总司和赤卫队打的第一个大仗，十分重要”。他不顾聂元梓的反对，决定撤出报社，而对外却扬言所谓“杀出重围”。“红革会”中有一些人反对撤出，提出要“在解放日报社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些人到12月9日才全部撤出报社。在他们撤出之前，还发表了“最最郑重声明”，说：“我们杀出《解放日报》，另辟战场！”

12月10日，从《解放日报》社撤出来的那些人，又将在虹口体育场开会的曹获秋、魏文伯“请”到交通大学，强迫他们签字同意再发一个市委文件，即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严重事件”的沪委（66）第120号文件，还强迫市委表态支持“红革会”的人“下厂同工人结合”，为江青等一伙策划的所谓“工学联”“运动”敞开了大门。

至此，震撼全市、影响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才告一个

十、张、姚策动的所谓“后院起火”

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社会动乱加剧，中共上海市委的处境日益困难。但另一方面，反对张春桥等蓄意搞乱上海的群众抗议浪潮也在高涨，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江青、张春桥为了尽早搞垮上海市委，策动徐景贤、朱永嘉等和他们操纵的市委写作班的一伙人起来“造反”，在市委机关内部搞了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

（一）写作班奉命集体造反

1966年9月底，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去北京，住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目的是窥测北京的运动情况。10月25日，张春桥、姚文元两人把他找去谈话，授意朱永嘉及早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争取主动”；要市委写作班“不要关门写作”，“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要写作班这伙人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朱永嘉立即从北京打电话把张、姚意见告诉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徐景贤。11月25日朱永嘉返沪，又进一步向徐景贤传达了张、姚的谈话内容。这时，市委机关内先期“造反”的《支部生活》造反队的王承龙也派人来策动徐景贤起来揭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支持他们“造反”。当时作为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徐景贤，也正在窥测形势，但他认为这时上海市委还能掌握和影响运动，起来“造反”有风险，因此只听不讲，不作表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得特别厉害。从中央到地方，抓意识形态的有关部门及其党政领导，无不首当其冲受到运动的冲击。而曾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分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还有他的合伙人姚文元，却靠着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法，把自己装扮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执行人”，避过了运动初期的冲击波。但是“文革”的所谓“批判”的火焰也逐步逼近了他们，其标志就是揪到了他们领导的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头上。

11月25日，复旦大学一部分对张春桥持怀疑态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炮打朱永嘉”、“朱永嘉必须低头认罪”等大字标语。第二天，他们又将回校来的朱永嘉、王知常揪住，连续召开了对朱、王等人的批斗会，责问朱永嘉“你在运动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你的背后是什么人指使？”强调“应该追到哪一级就追到哪一级，决不手软！”并将朱永嘉赶进了“劳改队”，勒令他不仅要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还要交代在市委写作班炮制“修正主义黑文章”的罪行。27日，这部分红卫兵几十人，冲进了武康路2号市委写作班，勒令写作

班一些人交出他们炮制的“修正主义黑文章”的底稿，并要他们揭发“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朱永嘉见形势危急，不仅自己挨批斗，而且要累及主子，于是就在这天深夜以“罗思鼎”小组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回校造反来了！”还以自己的名义贴出《我要造反》的大字报，以求摆脱困境。朱永嘉的这一举动，马上得到了复旦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的支持。但是，与“红革会”持不同意见的另外一部分红卫兵仍在28日夜召开了全校性的批判朱永嘉大会。“红革会”的一些人冲了这次大会的会场，宣称“朱永嘉有错误，但不能批斗”；说当前的大方向是揭露复旦大学党委，“砸烂杨家店”，“打倒杨西光”。要追朱永嘉的“根子”，就是“炮打张春桥”、“炮打中央文革”。“红革会”一伙人保了朱永嘉，把朱从会场中“抢”了出来。

28日晨，徐景贤急急忙忙挂电话到“中央文革”，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市委写作班受冲击的情况，谈了朱永嘉等人被揪斗，一些红卫兵还要将根子追到张春桥身上，等等。徐景贤最后表示，他们“造反”时机成熟，不“造反”不行了。张春桥听后说：“很好。”还说关于具体做法，他们要研究一下。

11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同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后，由姚文元给徐景贤回了电话。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这样记录着：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姚、张惊讶！关、戚气愤。

(2)根子是：追根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这个记录中的“姚”即是姚文元，“丁”是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小组，^①朱是朱永嘉，张是张春桥，关是关锋，戚是戚本禹。

姚文元打了一次电话还不放心，不久又一次挂电话给徐景贤，要徐以“丁学雷”的名义，直接向复旦大学造反派传话：“罗思鼎”在《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路线是对头的，和姚文元合作很好。还说写作班在前一时期是受张春桥直接领导的。姚文元催促、诱导写作班中从复旦大学借调来的郭仁杰、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等人，以“罗思鼎小组”的名义，回到校内去“造”学校党委的“反”。

12月初，徐景贤、陈冀德等到复旦大学和造反派秘密联系，说复旦大学现在是“解放区”，他们要来学习所谓“造反”经验，

^①“丁学雷”小组，是以徐景贤为头头的写作小组，“丁学雷”是他们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

准备“造反”。

12月12日晚，姚文元自北京再次打电话给徐景贤，催问市委写作班究竟“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下令市委写作班在“火烧”复旦大学党委后，立即举起“造反”旗帜，为他们打倒上海市委上“前线”。

与此同时，江青直接派到上海来的聂元梓等也在积极行动，密切配合。聂元梓来上海不久就特意和《支部生活》造反队王承龙、朱玉佩等人见面，煽动“不要迷信上海市委”“上海市委怕群众，就是有问题”。12月13日聂元梓又找王承龙、朱玉佩、徐景贤、郭仁杰谈话，为他们“造反”出谋划策。他们一拍即合，立即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市委办公厅等造反组织中进行串连，加快了“造反”行动。当天聂元梓还召开了红卫兵与造反派头头会议，煽动他们强行进驻上海市委机关。

12月13日下午，写作班在武康路2号召开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要写作班起来造反的几次电话“指示”，慷慨激昂地表示要紧跟张春桥、姚文元，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郭仁杰也煽动说：“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市委机关正需要一个冲出来的旗帜。”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张春桥、姚文元叫我们造反，现在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的提出：“要保留写作班这个堡垒，战壕可以通过不少单位，如办公厅、教卫部等，串

通他们一起造反”；有的说：“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要里应外合”；有的说：“我们造反，要同复旦大学揪杨西光相配合，要有突破口”；等等。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

12月14日，写作班继续举行全体人员会议，决定集体“造反”，并派出一些人分头向市委、市人委机关各部门的“造反派”联络，另一些人去收集、编造和整理有关“造反材料”。会后，徐景贤和郭仁杰又专程到复旦大学和“红革会”联络，寻求支持。

当天晚上，徐景贤给在北京的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了写作班“造反”的准备情况，并请求给予“指示”。姚文元要徐景贤把主攻的矛头指向陈丕显、曹荻秋，说：“曹荻秋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是非常顽固的”，“陈丕显、曹荻秋为啥死保杨西光、常溪萍？陈、曹讲到常溪萍就（说他）非常好，死保里面肯定有问题。”又说：“大方向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授意徐景贤从批判“资反路线”入手，打开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缺口。最后，姚还要徐注意“策略”，搞好“舆论准备”。姚的这些话被徐景贤等奉为造反的“行动纲领”。12月15日，他们积极策划召开“造反”大会。

（二）马天水快速转向

1966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上海是由分管工交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去参加的。当时，

马对张春桥在上海支持“工总司”搞乱了全市的做法，意见颇大。他去北京时，带去上海工人中成立各种组织情况的材料，准备在会上与“中央文革小组”争辩。马在中央开会期间，不断打电话来上海，说：“关于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各省市与‘中央文革小组’意见分歧很大，看来一场大辩论不可避免。”还传达余秋里的话：“现在是应该反映情况的时候了，不反映情况是不对的。”马天水在电话中布置上海市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为他收集情况，要找一些“工总司”成立后两派冲突十分尖锐的工厂的材料，报送中央。由于在座谈会上对工厂企业开展“文革”问题意见分歧，就由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会上，马天水根据上海的情况，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了意见。当时他决心把“官司打到底”。张春桥等认为马的态度很坏。林彪在会上对马天水狠狠地批了一通。马受批评后，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立即检讨，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要求“改正”。但当时张春桥表示：“他（指马天水）变不变还得看。”

马天水回上海后，一反常态，果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2月12日，他在全市区、县、局以上领导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交企业座谈会精神时，大肆贩卖康生所创造的一套“理论”，说“现在所有企业都已演变，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私

有制。”产生这些“演变”的基础，是“高薪阶层”，而工厂企业的“领导、厂长，就是高薪阶层”。又大肆贩卖林彪所鼓吹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批判运动，就是一个批判干部运动”，这将“席卷全国，震动世界”。马天水说，对“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事件中要“查市委修正主义的稿子应该欢迎”，这样“可以使他们得到很多材料”，以便进行“彻底批判”，“彻底批判就是我们的目的”，“群众的‘冲’是正常的，不冲是不正常的”，“要垮就垮掉，经得住就过关”，要把“一切幻想丢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原来这样的“批判”就是过所谓“社会主义关”！据马天水在粉碎“四人帮”后自己交代，他在中央工交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后，临回上海前又去找了张春桥，张对马作了三点“路线交底”：（1）文化革命就是改朝换代；（2）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到姚文元为止，（还）只有八个人；（3）（出）修正主义主要在中央和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张要马“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揭发陈丕显、曹荻秋”。并嘱咐他回上海后，“去找徐景贤谈谈”。这就是马天水迅速转向的“动力”。

马天水在12月12日会上又是传达又是“自白”表态，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帮了张春桥等人的大忙。从这时开始，市委机关内部进一步大乱，为徐景贤等人的举旗“造反”，制造了气候。马天水的卖身投靠，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赏识，1967年4月4日，马天水就被宣布“解放”了。张春桥又

特意找马谈话，说：“你在北京工业座谈会上，带头反对文化大革命，带头反对‘中央文革’，反的那么凶，……性质是很严重（的），你要吸取经验教训。你‘解放’后，一定要注意多和造反派头头联系，你要依靠他们，才能搞好工作。”进一步加以威逼利诱。

张春桥的一番收买，使马天水感恩戴德，从此一头栽进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怀抱。

（三）“造反”大会的召开

1966年12月16日，“造反”大会的筹备会议在武康路2号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王知常、陈翼德、王承龙、朱玉佩、刘耀忠等人，此外，市“红革会”头头马立新，“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代表李醒尘，《解放军报》记者甄文君等也参加了。根据姚文元“先搞资反路线”的指示，将大会定名为“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经过郭仁杰和“红革会”联系，“新师大红革会”同意把原来准备在12月18日召开的批斗常溪萍大会的会场——文化广场，转借给他们。因此，大会日期就定在12月18日下午。确定了8个发言的内容，矛头主要是针对陈丕显、曹荻秋，还“勒令”书记处全体书记、常委、各部部长都要到会场接受批斗。大会由市委机关9个造反组织发起召开，市委写作班、《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

斗队是其中4个主要发起单位，并准备在会上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筹备会议发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都必须参加大会，听取大会批判发言，各机关均须派代表参加。

大会筹备过程中，“红革会”、“红三司”、“同济东方红”动员了8千名红卫兵参与“压阵”；“北航红旗”负责组织了几百名红卫兵贴海报，造舆论。开会时，“工总司”又派1500名工人造反队员赶来“声援”。12月17日晚，徐景贤又挂电话给姚文元，把会议筹备情况向姚作了汇报。姚文元表示赞赏。

12月18日下午，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主席台的周围张贴着“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大幅标语。这个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共同商定的。幕后指挥的张春桥、姚文元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提得好，很有策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王一平、梁国斌等和部、局级领导干部均被强行揪到会场“接受批判”，杨西光、常溪萍被宣布为“反党分子”，押上主席台。

市委写作班在大会上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表明他们是集体造反的。《声明》宣称：“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

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徐景贤以中共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名义，作了题为《造反方知主席亲》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他肉麻地吹捧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上海市委“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诽谤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上保下，下保上，一级保一级，最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保自己，保修正主义”。还用了很大篇幅吹嘘自己早就想起来“造反”的事迹。通篇发言，夹杂着对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诬栽和丑化，确实显露了徐景贤“反戈一击”的“造反”才华，一个善鼓如簧之舌的惯于颠倒是非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才华”！徐发言后，《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宣传部《一心为公》造反队、市委党校造反派等派代表也发了言。大会通过了“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市委书记处、各部、委领导成员（必须）随叫随到，必须彻底坦白，彻底交待。……”的所谓“通令”。并宣布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后，还编写了《火烧曹家营，市委心脏爆炸》大会特刊，大肆鼓吹这次大会是“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煽动各单位“要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把市委机关搞得大乱，越乱越好，乱中夺权”。这个会

刊由马天水签字同意，下令《文汇报》社排字，《解放日报》社印刷，赶印10万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徐景贤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又到人民广播电台复制了18套“大会录音”，发到各区、县、各单位去播放。

当晚12时，徐景贤挂电话给姚文元，汇报了大会的情况。姚文元听了，大为高兴，当即对徐景贤和写作班嘉勉有加，说：“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张春桥和我领导的，太可笑了！”姚文元又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后来张春桥评价这次大会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震动”，从此以后，市委“不神气”了。

12月20日，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会议，确定徐景贤、王承龙、郭仁杰、程绮华为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为主要负责人。决定联络站下设5个组：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后勤组、调查组（又称材料组）。其中调查组是不公开的，它专门接受张春桥、姚文元所交给的“特殊任务”，收集各种社会动态，特别注意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动态，编写简报，直接报送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

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等人搞的“后院起火”，对全市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当时，“工总司”王洪文等一伙大搞打砸抢，已经把社会秩序搞得动乱不堪，徐景贤等人的举旗“造反”，把造反

风从社会引向机关内部，引发出更大的动乱。在文化广场的大会以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出现了上百个造反组织。这股造反之风，很快又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一时间，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林立。这些造反组织，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查所谓的“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喧嚣尘上，使机关工作很快陷入瘫痪状态。

机关外部的造反派也很快掺入到机关内部来了。1966年12月下旬，在聂元梓、王承龙等策动下，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红革会》的一批红卫兵进驻市委办公厅一室，进入市委办公厅档案室查阅了市委常委、书记处会议记录，断章取义地任意摘抄陈丕显、曹荻秋等许多领导同志的发言、材料，油印成册，作为攻击市委的“炮弹”，并将一些涉及到党和国家的秘密材料流传到社会上。

12月25日（一说26日）下午，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在武康路99号要马天水将市委“文革”的档案交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马天水当即签字同意。12月27日，由郭仁杰伙同“红革会”马立新等人，带领上海第一医学院“遵义兵团”的一批红卫兵，去市委“文革办公室”，拿走十几麻袋的材料，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后又转到市委党校，由朱永嘉等人私自查阅寻找他们认为有用的材料，进一步具体筹划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十一、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事件是张春桥幕后策划、王洪文等现场指挥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这次事件，血腥镇压了“工总司”的对立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在全国开创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恶劣先例，为“四人帮”全面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铺平了道路。

（一）为遏制“工总司”的胡做非为，“赤卫队”应运而生

1966年11月张春桥来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签字支持了“工总司”后，“工总司”成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它所进行的打、砸、抢、拦阻铁路运输等破坏行为，都变成了“革命行动”。于是，在“工总司”的旗帜下，各行各业各种“造反队”纷纷出现，他们怀着各种动机，首先冲击所在单位和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但是另一方面，各行各业各界群众中反对“工总司”所谓“造反”行动的人也日益增多。上海铁路分局以调度所职工王玉玺为首的“二·七战斗队”，向全市散发了《十万火急的紧急呼吁书！！》和《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两张传单，以“安亭事件”目睹者的身份揭露了这个事件的真相，愤怒谴责“工总司”头头们破坏铁路运输、

破坏生产的罪行，引起极大的反响。许多工厂纷纷派工人代表前往安亭进行调查，杨浦区20多家工厂的代表组成了“安亭事件联合调查组”，进一步调查、揭露事件真相。

1966年11月18日，5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工人代表聚集在上海友谊馆大厅内，严厉质问张春桥为什么要签字同意错误的“双五条”，要他作出回答。张春桥自恃有江青、陈伯达的支持，百般狡辩，态度蛮横。

11月22日，在一次有“二·七战斗队”等60多个组织参加的会议上（当时全市与“工总司”对立、反对王洪文的组织共有80多个），一致决定向党中央发电报，坚决要求撤销张春桥与“工总司”签署的“双五条”，要张向上海全市人民作检讨；并决定组织起来，酝酿成立“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

11月23日，上棉十七厂、玻璃机械厂、良工阀门厂、上棉三十一厂、东方衡器厂、搪瓷机修厂、华生电扇厂等23个单位召开了建立“赤卫队”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在此前后，他们曾推派代表走访市委，要求市委接见，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并给予支持。曹荻秋代表市委先后在市少年宫礼堂和沪西工人俱乐部剧场接见了他们，表示同意建立“赤卫队总部”，答应在总部成立时，市委派人参加会议。

在“赤卫队”筹备的同时，另有上海市建筑材料研究所、航天工业部118厂、上海试剂一厂等82家工厂、单位串连在一起，

酝酿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纠察队”，于11月25日在徐汇剧场举行成立大会。他们要求市委派代表到场给予支持，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士法出席了大会。“工人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都是在反对“工总司”一伙人搞打砸抢、破坏铁路运输和乱揪乱斗干部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因而这两个群众组织相互间进行了串连，决定合并。11月2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上海工人纠察队”正式合并，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确定王玉玺、金瑞章、潘月法、李诗音等16人为总部委员，王玉玺为总负责人。总部借市总工会103室正式开展活动。

“赤卫队总部”建立的消息传出后，进一步推动了全市大部分厂矿企业建立“赤卫队”组织，队员迅速发展到了80余万人。其声势大大超过了“工总司”。在“赤卫队”的队员中，有许多党团员、老工人和劳动模范。

“赤卫队”的迅猛发展，对“工总司”的打、砸、抢行为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王洪文、潘国平等听到“赤卫队总部”的筹建消息，又恨又怕。11月25日，王洪文首先在上棉十七厂，借口市委“四清工作队”在厂内转移“黑材料”，煽动造反队员抢材料，封办公室。王洪文的所作所为，激起了该厂职工的不满，纷纷前往阻止。王洪文等挑起武斗，大打出手。同日下午，厂里大部分职

工集会，宣布成立上棉十七厂“赤卫队”，与之对抗。“赤卫队”组织了1000余人到市委请愿，并要求前去北京控告王洪文、张春桥等在上海的罪行。后在市委的一再劝说下，“赤卫队”表示大多数人回厂坚持生产，只推派少数代表前往北京。

1966年12月1日，上海玻璃机械厂造反派借口“当权派在烧黑材料”，揪斗干部，该厂“赤卫队”表示反对，一赤卫队员被造反派强行绑架，押上了造反队的汽车。造反派高速行驶，转弯时，这名赤卫队员被摔落车身亡。“赤卫队总部”筹委会负责人王玉玺等得悉后，立即奔赴现场，将了解的情况向市委作了反映，第二天，又在人民广场召开队员大会，揭露了造反派丧心病狂的行径。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发表《郑重声明》，表示坚决反对那些人冲砸《解放日报》社、强迫《解放日报》停刊的错误行动。他们并散发要求市委坚持原则的传单。许多“赤卫队”员在现场与“工总司”和“红革会”的头头进行激烈辩论，义正词严地谴责这些人的打砸抢行为，重重包围了报社，显示了“赤卫队”的力量。后来“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又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凡涉及有关各派组织的重大问题，要统一协商解决，以此来限制“工总司”王洪文一伙的胡作非为。

1966年12月6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近30万“赤卫

队”队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提出：“在文化革命中，坚持文斗，不许武斗，向形形色色违反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更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生产任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赤卫队”在“总部”成立大会前后，相继派出若干代表去北京上访，向周恩来总理控告张春桥在上海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许多基层单位的“赤卫队”组织也不断向北京去电、去函、去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张春桥几次惊呼“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要我回去检查”，“控诉我的、骂我的特别多”，深感“赤卫队”对他是一大威胁，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二）张春桥蓄谋要扼杀“赤卫队”

为了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张春桥蓄意要搞掉当时对维护上海局势起一定的稳定作用，对“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起遏制作用的“赤卫队”。12月6日深夜，张春桥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休息室，召集“工总司”在北京的人员和一些红卫兵头头开会，了解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的有关情况，他连连讯问“赤卫队有多少人？”“上海市委有谁参加了？”等等。可是这些人对“赤卫队”的内情都不甚了了，提供不出多少情况。张春桥十分着急，他直言不讳地对这些人说：“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

令部（指‘工总司’）有共同利益了。”他大肆诬蔑“赤卫队”，说那里党、团员、劳动模范、老工人多，是修正主义的保守组织。“薪水一高，思想上容易出修正主义，怕丢饭碗，怕报复。”反过来大肆吹捧“工总司”一伙人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等打砸抢行为“是为了把革命搞好”，不然“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要变颜色。”张春桥等还唆使北京和上海的造反派学生，更多地去工厂串联，说“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张春桥要这些造反派“头脑复杂一些”，对“赤卫队”不仅要看到“公开指挥的”，更要注意他们“有没有地下司令部”。

张春桥又通过当时已经转向投靠张的马天水，摸“赤卫队上海总部”的底。12月20日左右，马天水打电话给张春桥，密报了“赤卫队总部”的人员组织情况，以及他找了“赤卫队总部”7个负责人谈话的经过。马天水迎合张春桥的需要，要“赤卫队总部”的负责人“扭转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扬言要“改组‘赤卫队总部’”，逼迫一些人回厂。

1966年1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见“工总司”在京人员和上海一些学生造反派在京的代表。张春桥当时已知“工总司”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大有分裂的危险，因此一再强调“工总司”内部要团结，警告他们说：“不要现在革命还未成功，内部就闹了起来”，并要“红革会”和“工

总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赤卫队”和上海市委。有个学生代表提出，周恩来总理讲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张春桥竟造谣说：“总理对这一点很不满意。总理的意思是说在柯庆施领导下上海是先进的”，而不是指现在的上海市委。张春桥说：“安亭事件”时，“市委书记处、常委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那时在市委是孤立的。”以此说明市委不是革命的。他明目张胆地煽动这些人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集中攻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张春桥还说，他和姚文元即将回上海来为他们撑腰。他一再诬蔑“赤卫队”，特别是对参加“赤卫队”的劳动模范、老工人等，说这些人“可能变得很坏，革命的变成不革命，变成反革命都可能。”他杀气腾腾地唆使“工总司”一伙人要把“赤卫队”中所谓“真正坏的”“抓到几个”，“把幕后操纵的揪出来”。

（三）“赤卫队”到康平路向市委提要求，张春桥火急下达攻击令

张春桥要搞掉“赤卫队”，已经是箭在弦上，迫不及待了。这时发生了“赤卫队”到康平路市委机关要求市委负责同志接见的

事。

“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去呢？

在张春桥的操纵和策动下，“工总司”王洪文一伙串同一些造反组织，越来越猖狂地要“吃掉”“赤卫队”。他们开动各种

宣传机器，大肆污蔑“赤卫队”是“老保”，是“既得利益者”，叫嚷“有了‘工总司’，就不许有‘赤卫队’！”“对‘老保’组织就是要砸！”他们作出决定，勒令中共上海市委及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的检查材料只准交给他们，不许交给别人。他们劫持曹荻秋，强迫他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市委当时处境极其困难，迫于来自最高层和林彪、江青等的压力，市委不得不支持原来不愿支持的“工总司”，而对本该支持的“赤卫队”却表示不支持。

为了维护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地位，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向市委提出8条要求，即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犯罪活动等。曹荻秋认为“赤卫队”的这些正当要求难以拒绝，签字同意了“赤卫队”提出的“8条要求”。但紧接着王洪文一伙于25日又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大会”，对曹荻秋横施压力，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又宣布“赤卫队”提出的“8条要求”作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28日下午大批“赤卫队”队员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据当时有关方面估计，大约有二三万人。这

些“赤卫队”的行动是比较有秩序和守纪律的，他们要求市委领导同志接见，要求澄清对8条要求的明确态度。进入市委机关大院的那部分人，在小礼堂等处等候接见，没有进入机要部门和档案室，院内市委领导同志的住宅也没有受到任何侵犯。赤卫队员的吃饭、饮水问题，都是由本单位派人送来自已解决的。

“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的新闻，张春桥是从马天水打给他的电话中得知的。张在电话中听到马天水说话吞吞吐吐，感到在马的身边一定别有人在。于是，他立即另外打电话给他的老婆李文静，查问情况。李文静告诉张，“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市委机关后，要曹荻秋接见，坚决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提出的“8条要求”有效等。张要他老婆立即给徐景贤传话，说对“赤卫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不能让胜利果实给‘赤卫队’夺去。”张要徐景贤转告各造反组织，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按当时“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上海和外地来沪红卫兵组织、以及各系统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对“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一事，都认为是“赤卫队要找曹老头算帐”，是上海市委和“赤卫队”之间的矛盾，因此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没有当做什么大事。张春桥通过李文静传话给徐景贤，实际上等于下达攻击“赤卫队”的动员令。

徐景贤接到张春桥的电令后，急急忙忙找“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和潘国平，但没有找到。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原

来正忙着闹“内讧”。“工总司”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一度绑架潘国平，并到北京去冲中南海，要和张春桥吵架；要张允许他组织“全国造反派联合调查组”，标榜这样可以使“中央文革小组”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并要张请毛主席为他办的造反报亲笔题词，妄想独树一帜。二兵团的耿金章也到了北京，要张春桥同意他成立“上海工人造反革命联合委员会”，想与“工总司”唱“对台戏”，并抢走了王洪文派驻在北京的工作人员使用的介绍信，并要把这些人打成“政治大扒手”。这时在上海的王洪文，确实有点“自顾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徐景贤只找了市委机关联系站的郭仁杰、程绮华、王承龙、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向他们传达张春桥的指令，研究如何贯彻。徐景贤亲自执笔和朱永嘉、王知常等人拼凑了《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等传单和讲话稿，在《支部生活》办公室和康平路大院对面房屋顶上架起大喇叭广播，起劲地叫嚷“赤卫队”保市委的大方向错了，要“赤卫队”队员们起来造“总部”的反，造市委的反。他们的“宣传”攻势一时见不了效，急得团团转。

张春桥向徐景贤下达攻击“赤卫队”的命令后，很不放心，又从北京“调兵遣将”。28日夜10点多，张要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工总司”最大的“实力派”头目耿金章，说：“张春桥要你马上回上海，上海发生了紧急情况。”耿问：“有什么急事？”秘书说“你不要问了，回上海你就知道了。”于是，次日耿急忙乘

飞机回来，一到上海，就充当了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

张春桥还是不放心，28日深夜，他又打电话到上海，直接找到了王洪文，命令王洪文等立即调动人马，和“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造谣诬蔑说：“市委有抛出曹荻秋，达到既保了市委，又支持了‘赤卫队’，缓和整个局势的阴谋”，所以要警惕陈丕显和“赤卫队”“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

12月29日上午，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同“赤卫队”进行谈判，再次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问题得到解决。“赤卫队”准备撤离康平路市委机关。下午起一部分已陆续撤走，当晚在市委机关大院内外约尚有万余人。因为王洪文、耿金章等“工总司”头目们按照张春桥的指令已经决定动武，他们调集大批人、车、武斗器械，封锁了康平路附近各个路口，这部分“赤卫队”已不能和平撤出。

29日下午，张春桥又一次与其妻李文静通了电话。当他得知“赤卫队”人员正在准备撤出的消息，又急忙要李文静传话给徐景贤等人：“赤卫队要夺胜利果实，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为了搞掉“赤卫队”，张春桥两天内打了三次电话，又派耿金章回上海指挥打砸行动。他是幕后挑动这次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元凶。

(四) 对“赤卫队”的残暴镇压

12月29日清晨，以“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为首，召集20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在衡山饭店开会，成立了对付“赤卫队”的“联合指挥部”。他们立即调动各自人马，“工总司”二兵团、“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率先出动，“红卫军”、各区“工总司”联络站紧紧跟上。“工总司”闸北区联络站的头头曹德宏特别卖力，接到总部戴立清叫他调动人马的电话后，立即抽调1200多名造反队员，分乘30多辆卡车赶来。到了下午4、5点钟，占据康平路周围各交通道口和风雨操场、衡山饭店的“工总司”人员约有4、5万人，把在市委机关大院的“赤卫队”包围起来。（除康平路外，另有几个地方是双方相互包围。据估计“工总司”和“赤卫队”出动的总人数约有40多万）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吴瑞武和王承龙、朱玉佩等人以及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头头，在康平路机关大院周围各自占房设点，装了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嚷“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立即滚出康平路”，“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工总司”又弄来一些宣传车，在康平路附近广播造“舆论”。为了煽动暴力冲砸情绪，他们突出地宣传“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的谎言，制造紧张气氛。到了晚上10时，在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已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情况。

根据王洪文与耿金章29日下午在永福路121号二兵团总

部碰头商定，由二兵团负责“解决”康平路的“赤卫队”，王洪文、戴立清指挥“工总司”造反队砸掉各区、各基层厂的“赤卫队”。耿金章当晚即偕徐景贤在荣昌路60号建立了“前线指挥部”，耿自任总指挥。王承龙、聂元梓的代表孙蓬一、以及“工总司”部分区联络站的头头参加了“前线指挥部”的会议，确定总攻时间。这伙人杀气腾腾地叫嚣：“有赤卫队就没有造反队，有造反队就没有赤卫队。”耿金章更是有恃无恐地说：“春桥××讲你们抓到赤卫队的头头可以送到公安局去。”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行驶在康平路附近的宣传车高音喇叭尖厉的嚎叫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赤卫队滚出去”、“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其中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在“工总司”大小头目的唆使和带领下，手持木棍、皮带等打人凶器，直向康平路市委机关内扑来。他们冲进了机关大门，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木棍和皮带齐下。他们打破了玻璃窗，冲进小礼堂，砸坏了大批桌椅，把拆下的桌椅脚也作为打人的凶器。当时“赤卫队”已准备撤离，手无寸铁，被数倍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围攻殴打，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纷纷跑出市委机关大院。但打人的凶手还不罢休，前堵后截，要“赤卫队”员摘下袖章，集中到附近马路上“投降”。当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中一片白色恐怖，打人凶手的嚎叫声中传来被害者的惨叫声，一批批“赤卫队”员被打

倒在地，身上鲜血淋漓，血迹也染红了地面。院内到处是击碎的门窗玻璃和抛出来的公文纸张，现场一片狼藉。这场血腥的镇压，一直持续到清晨六时左右。在这次事件中，“工总司”抓了3百多名“赤卫队”骨干，“赤卫队”受伤人数甚众，伤势严重当场送医院治疗的有91人。

在围攻殴打“赤卫队”员的同时，耿金章手下的一批人冲到市委机关大院后，又四出搜查，找到了陈丕显、曹荻秋，耿叫孙玉喜（“工总司”二兵团常委）把他们押送到军人俱乐部去。

12月30日，张春桥得知“赤卫队”已被镇压，立即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对下一步的行动进行部署。他倒打一耙把罪责推到市委头上，说：“康平路事件是市委一手搞起来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张下令给徐景贤，要“各个组织一起快点商量”，“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批判反动路线的旗帜”，要“揭露市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张春桥还特意叫徐景贤“不要（再）提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张春桥家”了。

12月31日，“工总司”发布了把“赤卫队”各级领导统统抓起来的《特急通令》，强迫解散“赤卫队总部”和各区以及基层的“赤卫队”组织。

“赤卫队”遭到残酷镇压后，大批队员决定去北京向中央报告。31日上午徒步来到昆山县玉山镇的“赤卫队”队员约2万

余人。下午3时，“工总司”派出大批造反派分乘164辆汽车赶到，追打、阻截“赤卫队”的队伍，又制造了一起流血的“昆山事件”。

31日晚，王洪文、王腓利、马振龙、曹德宏等又抽调人马，把聚集在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包围起来，收缴了“赤卫队”的袖章。孙玉喜、张虎根将抓到的一些“赤卫队”骨干和负责人送到市公安局拘押审查。“赤卫队”市、区两级组织中有240余人被捕，在基层中，单是上棉十七厂一个厂，被王洪文等抓送公安局的“赤卫队”队员就有25名。被关押的“赤卫队”队员，受到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被加上“破坏生产，搞‘三停’（即停交通、停水、停电，纯属造谣）”、“煽动大规模武斗”、“反对中央文革”等吓人的罪名。“赤卫队总部”常委及其工作人员，大都被抓到公安局拘留审查。张春桥对“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更是恨之入骨，说“这个人要判刑，起码要判他5年”。结果，王玉玺被判处徒刑4年。“赤卫队”其他几名负责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管制3年。至于“赤卫队”的各基层组织中，被批斗冲击和被迫写“悔过书”的，更是不计其数，对“赤卫队”队员，凡是到过康平路，去过昆山的，都作为旷工，被停发工资，扣发奖金，广大队员在单位受歧视，甚至株连家属、子女。

上海市一个最大的反对张春桥、反对“工总司”的群众组

织，被血腥镇压下去了。张春桥、姚文元认为：现在，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一大障碍扫除了。上海的“桃子”熟了。1967年的1月4日，张春桥偕姚文元飞回上海“摘桃子”来了。

1967年3月8日，张春桥对山西省太原市的代表讲话中，分析上海形势时，不打自招地说：“赤卫队进了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张春桥对这次亲自决策和发布命令的“砸掉赤卫队”的“胜利”感到十分得意。

(五) 谎言制造者的奸诈嘴脸

在“康平路事件”中，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起劲地造谣诬陷“赤卫队”队员抄了柯庆施、张春桥的家，给“赤卫队”妄加罪名。这个“谎言”广泛流传，蒙蔽了不少人，曾经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它真相如何？破绽百出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

参与“康平路事件”的“红革会”常委劳元一等人于29日凌晨4时，曾进入康平路大院特地到张春桥家问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的家，他们就走了。”市委办公厅交通科一名干部也曾问过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过你的家？”李文静讲了“没有”后，此人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贴

在张春桥家的门口。

12月29日下午，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曾去张春桥的家看望李文静。李文静也亲口对他说：“开始‘赤卫队’员有几个人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他们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上，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柯庆施的夫人）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12月30日后的5天内，有很多群众不断到康平路询问了解所谓“赤卫队”抄柯庆施、张春桥家的真相。李文静曾多次同她的女儿张维维对群众说：“我们的家没有被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

12月31日上午，张维维还写了一篇《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是到我家来过的，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他们没有进卧室里，当他们发现了柯老家，有些人就在柯老像片前静默了三分钟，并写了纸条贴在门口，说明是柯老的家，请大家不要进去。有人自动做保护工作。柯老家和我们家大人小孩都很好，请大家放心。”

张维维辟谣传开后，王洪文一伙慌了手脚。为了继续蒙蔽欺骗群众，掩盖罪责，他们伙同“上海炮司”、“首都三司”等

组织，在1967年1月3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张维维的声明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声明”，“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不是一路人”，“张春桥××是坚定的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王洪文等人色厉内荏，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他们不敢再提“赤卫队”抄过张春桥的家，只是讲“闯进过”、“静坐示威”等语。这种不象话的《联合声明》是骗不了人的。于是，奸诈的张春桥又出谋划策了。下面是1月3日夜里，张春桥同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等一段对话的记录：

廖祖康：你的女儿的声明（指《造谣派破产》），他们到处张贴。

张春桥：我疏忽了，应嘱咐他们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看。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叫抄家？柯老的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为什么进去？还要喊打倒张春桥。家里的人要写声明，我让他们找造反派去商量。

王洪文：里面什么人都有，进进出出敲门捣乱。

张春桥：现在还是这样吗？

王洪文：我派人去保护了。

张春桥：市委有责任，市委的人跑掉了，为什么柯老的家不转移？我的家是我事先告诉不要动的。准备让他们砸烂，砸烂了也好。

王洪文：我们商量，写个声明，既说明他们闯到你家，弄得不象样子，又说明没有抄家，柯老的家也不算抄了，说明是阶级斗争。

张春桥：只你们写不行，回去还要张维维让她出来写。

戴立清立即向李文静传达了张春桥的话。同时，张春桥还打电话给李文静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于是，李文静当即写了一份传单，影印散发。这张传单上说：“连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也把工人赤卫队闯进我们家的事情，作了简单的说明。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带袖章的赤卫队曾长时间的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这里，又把“赤卫队”在他家“静坐示威”改成了“一些不带袖章的赤卫队”在他家“门口纠缠”。可是，张春桥在1月6日，还一口咬定“我的家也被抄了。”但又心虚地说：“可别把我的这些话印

成传单、登报啊！”这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的政治流氓哲学。

“康平路事件”结束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一伙占了上风。但是，人们并没有被压服。人民群众与“四人帮”、张春桥等人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他们垮台为止。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赤卫队”一案进行复查，决定撤销“四人帮”控制的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对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的判决，给予彻底平反。中共上海市委宣布推翻强加在“赤卫队”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广大的“赤卫队”队员恢复名誉，彻底平反。被扭曲了的这一段历史，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十二、“夺权！夺权！！夺权！！！”声中的上海“一月风暴”

“夺权！夺权！！夺权！！！”三个“夺权”竟用了六个惊叹号，这是出现在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奇文。真是力竭声嘶、大声疾呼呵！上海的所谓“一月风暴”就发生在这一片夺权声中。它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策划指挥的。

上海“一月风暴”，大体上是指1966年年底“康平路事件”后到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主要有：“两个文件”的发表，其中突出的是大搞经济主义又倒打一耙；策划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造反夺权；以二个造反组织篡代市政府部分机构职权；四次以破产告终的抢权活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正式出笼。这些事件在时间上有某些交叉，分段写只是为了记述方便，其总的焦点都是争相篡夺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及其追随者们把这段时间的阴谋活动吹捧为上海的“一月革命”，还恬不知耻地说“其意义不下于俄国十月革命！”吹嘘“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提

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一）“两个文件”发表的经过和所谓反经济主义

“两个文件”是指1967年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发表的《紧急通告》。事情还得从“康平路事件”的余波说起。

康平路事件中“赤卫队”受到残酷的镇压，总部被解散，基层组织被冲砸，广大队员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不得不离开工厂、车间。他们中很多人要求去北京上告。他们利用多种交通工具或步行北上。12月31日，陆续抵达昆山县玉山镇的有近2万人。“工总司”王洪文等闻讯后，极为恐慌，立即组织人马追赶拦截。“工总司”二兵团头头耿金章，煽动1万余造反队员乘200辆卡车、大客车，追至玉山镇，强令“赤卫队”解散队伍返回上海，随即大打出手，挑起了又一场严重武斗。再次造成途经上海的铁路全线瘫痪，运输中断。共计停开客车26列，5万多旅客不能乘车；5万多旅客被阻中途；停开货车38列，中途停车22列；货物积压数万吨。上海的工业生产由于原材料短缺、动力不足，难以为继，加上对立两派工人大量离开生产岗位等原因，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形势岌岌可危。

1966年12月31日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电话给中共上海

市委书记陈丕显，要他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告工人的思想工作，同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一起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严重问题，并强调指出：“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秩序要搞好。”要陈丕显出面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做工作。

陈丕显当时因病手术后疗养，病体未愈，接到周恩来总理电话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和外地来沪的红卫兵组织代表到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左右，各造反组织的头头陆续到达会场。其中有“工总司”的王洪文、黄金海、王腓利，“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徐景贤、朱永嘉，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以及“红革会”的代表和北京、西安、哈尔滨等地来沪的红卫兵代表等。陈丕显向到会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来电内容写成传单，进行宣传；要“工总司”把去昆山的造反队员调回来，不要搞武斗；还建议另外组织力量到昆山对“赤卫队”进行劝导，接“赤卫队”队员回生产岗位；以及动员铁路职工迅速恢复铁路交通等。

这里先要讲一讲在北京的张春桥的态度，他是了解周恩来总理为扭转上海的混乱局势而要陈丕显出面做工作的决定的，并对此极为仇视。他满脑子想的是趁乱夺权，根本没有国计民生、社会秩序等大局，就在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之后，张立

即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把周总理要陈丕显出面做工作解决上海铁路交通等情况向徐交了底，示意徐景贤不能由此而动摇揪斗陈丕显的“信心”。张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因此，在陈丕显召集的研究贯彻周总理指示的会议上，有的造反派头头表示反对，如徐景贤跳出来说：“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有的造反派头头表示怀疑、犹豫，如王洪文，由于一时尚未知悉张春桥的旨意，在会上一言不发，对讨论的问题不表态。但是，经过陈丕显再三做工作，绝大多数人终于表示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同意陈丕显提出的当场起草一份将工人造反派从昆山立即撤回上海的通告，于凌晨5时付印发出。推举几个工人和红卫兵根据会议精神，负责起草一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主要执笔者是北京来的中央音乐学院一个红卫兵舒××）。1月4日，起草的文稿经原参加会议的代表讨论，修改定稿后送交陈丕显，陈阅后批交《文汇报》社即印20万份，向全市散发、宣传。1月5日，《文汇报》全文刊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在起草文件的同时，市委派出一批干部去昆山，作了很多工作，平息了武斗，赤卫队员陆续返回上海。1月3日，中断了

的铁路交通恢复通车。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为基调，因此在总体上贯彻了“文革”的“左”的观点；有些事是颠倒是非的，如诬蔑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诬蔑赤卫队“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等。但全文的主旨是克服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局面，稳定局势，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王洪文因不了解张春桥对于周总理叫陈丕显出来处理铁路交通问题的态度，故在1日凌晨的会议上一言不发，第二天，就急忙与陈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去北京找张春桥。3日晚，张春桥、姚文元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了他们。张春桥在这些人的面前，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指示，叫王洪文等不要同陈丕显一起解决动员工人回生产岗位、恢复铁路运输等问题，并煽动他们要继续揪斗陈丕显，实现其搞垮上海市委的阴谋。对周总理要陈丕显出面做工作一事，张春桥说：“曹荻秋显然说话也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的，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张阴险地说：“你们一定不要管这些事（指恢复交通、生产等事）。要警惕，否则可能会

失去群众的，你们还是要抓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你们不批判，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高兴。我看还是要加紧批判。”王洪文摸到张春桥的“底牌”后，即回上海。当他得知别人已代他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签了字时，代签人受到他一顿斥责。而以徐景贤为代表的“市委机关联络站”则根本没有签字。这都反映了张春桥的态度。

当时上海的局势极大地刺激和兴奋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梦寐以求夺权的神经。在“康平路事件”中张春桥就曾通过他老婆李文静要徐景贤向造反组织传话，提醒他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去”。现在张春桥看到陈丕显奉周总理指示出面处理问题，他在北京更加坐不住了。张春桥认为“上海的桃子熟了”。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挂着“‘中央文革’调查员”的名义，行色匆忙地从北京赶来上海，变几个月来的幕后操纵策划为幕前直接指挥，来抢摘上海这颗“大桃子”了。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该文，并加了编者按语，称之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是张春桥没有想到的。这时他立即改变腔调，对一些造反派头头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还说：“《告上海全市

人民书》矛头是针对陈丕显、曹荻秋的，这个文件根本与他们无关”。

所谓“反经济主义妖风”以及拟草和发表《紧急通告》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承认“工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同意向他们提供“造反”所需的各种物资后，“工总司”的一些头头，不断向市委、市人委勒索大量经费和物资。同时，他们大搞打、砸、抢，把一些机关和工厂的公物据为己有，并肆意挥霍。与“工总司”挂钩的各级造反组织，也纷纷向区、县、局各级领导机关要经费，要汽车，要待遇等等。其中闹得最突出的是王洪文竭力支持的以戴立清为头头的临时工、外包工的造反组织“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个多月里，就挥霍公款9万余元，占有大小机动车11辆，头头贪污、挪用公款2千余元。1966年12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江青大放厥词，说合同工制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她训斥当时国务院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同志：“你们不为工人服务，还是回老家去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还谩骂他们“比封建把头还残酷！”叫嚷“合同工要革命。”康生等人也在一旁

帮腔。江青最后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名义）发个通知，（1）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于是，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鼓动、唆使下，那些造反组织争先恐后地提出更高的经济上的要求；新的专门以经济目的而纠合的造反组织纷纷建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就有70多个，什么“支农下放工人”、“国营农放下放工人”、“学徒工”、“个体劳动者”、“革命单身职工”、“住房困难户”、“常住临时户口”等等，都扯起了“造反”旗帜，要钱要物。他们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如要求将集体所有制单位改为国营企业，下放支农工人回原厂工作，临时工、合同工改为正式工，补发工资、附加工资、福利费、营养费、奖金、劳防用品等。有的则索要汽车、广播车、摩托车、自行车、红布、纸张、油印机、服装、军大衣等，以及索要所谓串连费、活动经费等。于是，社会秩序更加混乱，那些造反派不仅冲击党政机关，而且冲击工会组织等群众团体。例如1966年12月间，上海市总工会接待了一批妇女造反队员，共十四五人。她们是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和邻近工厂的托儿所保育员，为首的是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当时工厂的托儿所，属有关工厂的工会举办，组织一些职工的家属来当保育员，订立合同，但不属企业职工编制。崔根娣等硬说

这是“资反路线”，她们要“造反”，要求转为正式职工，提出享受劳保、增加工资福利等一连串问题。她们冲进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大楼五楼，占领了一间办公室，住在里面，吃在里面，前后达20多天，还一度把市总工会一位副主任揪来软禁不放。

这股所谓“经济主义妖风”大体上从1966年11月底已经开始，经江青等人煽风鼓气，愈演愈烈。它损公肥私，挖取国家财产，冲击生产建设，涣散人心，败坏风气。受其影响，上海不少单位的生产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如港口有6千人离开生产岗位，日装卸量由9万吨猛降至3万5千吨，每天积压货轮70多艘无人装卸，最多时达100多艘。与此同时，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3日，全市又刮起抢房风，5天之内，被抢占的新工房有2万2千多平方米，私房被人抢占的有30多万平方米。那些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到处寻找各级领导干部，强迫他们签字同意发放各种费用，达不到目的，就疯狂地揪斗、绑架，甚至几天几夜地围困不放。他们又聚众包围银行，强行提取大量现金。1967年1月初，短短几天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各区办事处就被提去现金3000多万元。

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按照上海市人委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派人去北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经总行向国务院报告后，中央立即拟出《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但这个中央文件却被江青故意扣压两天后才发

出。原来她把消息先捅给上海的造反头头们，“让他们有思想准备”。事情很清楚，经济主义风是造反组织刮起来的，总根子就在江青身上。

1月8日下午，全市有30多个群众造反组织和外地红卫兵代表在锦江饭店11楼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制止经济主义风蔓延的问题。陈丕显积极支持这个会议，他不仅自己参加，还建议让市委、市人委有关部、局负责人参加。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都接到会议通知，却都拒绝参加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倒打一耙，说：“经济主义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把责任推给上海市委。王洪文不仅不参加会议，还指使戴立清为头头的“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些人去冲会场，说“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等等，进行捣乱。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起草一份关于制止经济主义蔓延的《紧急通告》。

《紧急通告》起草后，有32个组织签字同意。王洪文拒绝签字，后来其他组织纷纷提意见，才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刊载了《紧急通告》。

《紧急通告》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月10日晚，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接的电话，作了记录转告张春桥。陈丕显说：《紧急通告》是他和有关部、局负责人在会上

表示同意和支持搞出来的；市委已正式下发文件，表示对《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支持。而张春桥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他在《紧急通告》发表后，对徐景贤等人大发脾气，说：“五号刚刚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主席肯定了，现在是照着办的问题，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吓得徐景贤连连称是。徐回去后，批评了代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签名并参加文件起草的朱永嘉。

事态发展又出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意料之外。1月1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央贺电》和《紧急通告》。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也发下来了。

这时的张春桥又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当他探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表示支持、中央要发贺电之后，立即召集各造反组织开会，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前，向这些人宣读了中央贺电。他吹嘘他和姚文元回上海才一个星期，上海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肯定了两次。说中央“给一个城市的群众组织发贺电，这是史无前例的。”王洪文也“不甘落后”，口口声声地说，这是中央“对我们‘工总司’的关怀、支持”，并乘机吹嘘“工总司”是“毛主席亲手树立的一面红旗。”至于他如何反对《紧急

通告》的起草和发表，则一字不提了。徐景贤则奴颜媚骨地吹捧说，上海有张春桥、姚文元的领导，是我们造反派的“幸福”，等等。

张春桥等人在《紧急通告》发表的过程中，阴谋家、野心家的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致。为了搞乱全市以便乱中夺权就大刮经济主义之风，反过来又把自己打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把一切罪责推到上海市委身上。张春桥还煽动群众说：“矛头不要对群众，要向上，拣签字（指被迫签字同意批钱款的领导干部）最多的，揪到厂里让工人斗，让报纸登出来，让全市人民都知道。”结果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被揪在高架车上游斗。张春桥后来曾说：1月9日就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自下而上地进行夺权，……我们就在下命令了。”

（二）策划召开“打倒市委大会”

徐景贤立即和王承龙、朱永嘉、郭仁杰等商量研究如何贯彻。后来就由“市委机关联络站”出面召集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商量，决定在1967年年初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斗争陈丕显、曹荻秋，夺市委的权。

1967年1月2日、3日，徐景贤、王承龙、朱永嘉等紧张地进行“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工作。出于争夺领导权的动机，王洪文原先是要破坏这次大会的，他派了一批人来砸筹备大会

的地方，经过反复解释说服，才勉强同意开这次大会。1月4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返回上海，立即亲自操纵、指挥这一行动。

1月4日下午2时半，张春桥、姚文元到武康路2号市委写作班，对徐景贤、王承龙、朱永嘉等连声称赞写作班“造反”造得好。据徐景贤笔记本上记载，张春桥在听取了徐景贤汇报“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后说：“市委不行了，”“机关工作不能中断，要搞一个班子，”“我和姚文元想把你们联络站，作为我们的工作班子。”次日上午，张春桥又找了“工总司”王洪文等人。张对于“工总司”成立后大搞打、砸、抢等行为大加称赞，说“打人基本上是打的坏人，”“人家拿着菜刀要杀我们，我们还跪着喊要文斗，那就不行了。”还说“中央文革”搞的几个文件，是保护你们这些“左派”的，以示拉拢。张春桥怕“工总司”这些人听不懂他的真正意图，就赤裸裸地对他们说：“我支持你们，因为支持工人造反司令部这个字是我签的。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也支持我。”王洪文听后马上表示：春桥在“安亭事件”中支持了我们，我们一定要听春桥的话。

张春桥在接见造反组织代表的公开场合，又故意作出超脱的姿态，妄图隐瞒他与姚文元这次窜回上海的真实目的。他对那些“造反派”头头说，“我们这次来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我们不参加市委工作”，“与市委工作无关”。

“任务是帮助左派”，“搞搞调查，开开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你们要干，不必请示”，“不要让人家说革命组织是‘中央文革’扶着走的”。“我可当个传递员，好的经验，代为上达”。“你们放手去干，我们有建议，一定对你们提”。但他终究按捺不住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的迫切心情，据王明龙、陈阿大在粉粹“四人帮”后交代揭发，张春桥在一次接见“工总司”王洪文等大头目以及徐景贤等人时道出了真情。他说：“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我和姚文元也参加。”还说：“这次是江青、陈伯达批准我和姚文元回来的。”他还传达江青的话“张、姚回去可以成为一个凝聚点，免得群龙无首。”

1月5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王洪文、陈阿大、潘国平、耿金章、徐景贤、王承龙、朱永嘉等20多个“造反派”头头，直接出面对召开“打倒市委大会”进行具体部署。张说：“会议先研究怎么批斗陈、曹”“打倒陈、曹。”“通过打倒陈、曹大会，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

在研究大会的开法时，徐景贤与王洪文、陈阿大等激烈争夺领导权。徐景贤自以为是张春桥的亲信“嫡系”，要包揽会议的筹备工作，提出会议的口号、发言稿、会场均由“市委机关联络站”来搞，会议定在1月6日放在文化广场开。陈阿大见

徐景贤以“老大”自居，激动地跳起来说：“我主张放在人民广场开会”“文化广场太小，要放到人民广场去开几十万人大会，让造反派都来参加，这样影响大。如不在人民广场开，我们‘工总司’不参加，而且我还要带队伍来冲会场，陈、曹一些人控制在我们造反派手里，不给你们，看你们怎么开会。”徐景贤针锋相对地说：“关于打倒陈、曹旧市委（的会议）在什么地方开的问题，开多大范围，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事先都向张春桥汇报了。”并以6日天气预报有雨和准备工作来不及为理由，不同意陈阿大的主张。陈阿大说“不管天下雨，就是要在人民广场开，下冰雹我们也不怕，几十万工人队伍由我们‘工总司’负责来调”。徐景贤又说人民广场地方大，音响效果可能不好。陈阿大拍拍胸膛说“包在我身上，可连夜在马路上拉高音喇叭”。王洪文支持陈阿大的意见。张春桥怕僵持下去不利于开会，同意了王洪文、陈阿大的意见，并自荐为这伙人的“顾问”。徐景贤马上迎合说：“旧市委陈、曹倒了，但不能把张春桥、姚文元和旧市委联在一起。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由张春桥领导我们，当我们造反派的顾问，有事向他请示报告，我们只承认张春桥、姚文元来领导。”会上，张春桥亲笔修改了王洪文的大会发言稿，还同意打算在大会上发出的所谓《通令》。最后，徐景贤向张春桥请示，时间急促，会议要不要改期？张春桥说：“不要改期了，我们不参加大会了，可以在家里看电

视。”

1月6日，在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由“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出面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30几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参加了大会，这些组织的头头上了主席台。据“工总司”等组织称聚集了10余万人参加会议，并由电视台转播实况。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等被“造反派”强行揪到会场挨批斗，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被揪到会场陪斗。有些单位在分会场里，把本单位的所谓“走资派”，也揪来“示众”，当活靶子批斗。王洪文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稿是由朱永嘉起草，张春桥亲自修改审定的。发言中极尽诬陷、栽赃之能事，恶毒攻击陈丕显、曹荻秋等负责同志，百般美化张春桥，说张春桥受到旧市委的围攻，为张春桥粉墨登场制造舆论。大会结束时发了三个所谓《通令》。第一号《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由造反派对他实行“监督劳动”。第二号《通令》要陈丕显在七天内交代“反革命罪行。”第三号《通令》要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1月6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迫不及待地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份《情况简报》。主要内容是：“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

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即军管，要陈在一周内交代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张春桥、姚文元在1月5日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上说：“市委已经完全瘫痪。”而在6日的简报上则进一步说：“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其目的，就是要党中央及早批准他们坐上上海市的第一、二把交椅。

(三)《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造反夺权

《文汇报》《解放日报》两个报社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造反夺权，是所谓上海“一月风暴”的突出的组成部分。这些主要的宣传舆论工具从此为全面的造反夺权摇旗呐喊，其影响远远超出上海市的范围。

(1)《文汇报》社的夺权。

《文汇报》社的夺权是由《文汇报》社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发难的。“文革”初期，《文汇报》社内的一些人起来“造反”，组成“星星之火”战斗队，以后扩大为“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主要头头是朱锡琪、周国荣等人，邵传烈也参加了。总部成立后，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李醒尘，“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头头姜涛等人进行了联系，参与了反对上

海市委和点名批判市委宣传系统领导人杨西光、石西民、杨永直、白彦等人的活动。1966年12月中旬，邵传烈提出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来办报的主张，与朱锡琪商量，朱主张夺权办报。12月26日下午，“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召开报社各造反组织和各科室、车间代表会，策动“夺权”。朱锡琪等提出，外单位造反派天天来闹，要文汇报“还债”；与其让别人封掉，不如我们“接管”，公开策动与会干部支持“总部”接管《文汇报》社。

12月27日晚，“总部”头头朱锡琪、周国荣、邵传烈到“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与跟随聂元梓一起来上海的李醒尘密商接管《文汇报》的行动计划，李提出先派人去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并为他们写了介绍信，要他们找《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唐平铸。随后，朱锡琪等又同“首都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红革会”头头们进行串连，寻求他们的支持。

1967年1月1日，邵传烈、周国荣飞抵北京，直接找姚文元未成，几经周折，才找到《人民日报》总编办公室主任鲁瑛。当晚，《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唐平铸听了邵、周准备夺权的汇报，看了邵、周带去的有关材料，唐答允向“中央文革”汇报，说如有意见即打电话通知他们。

1月2日，邵、周返回上海。当天《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版联合版。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等万分恐慌，认为

出联合版是宣告《文汇报》停刊，悍然决定次日即进行夺权。“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要求上海“红革会”绑架、关押报社主要负责人，以撤掉夺权的“绊脚石”，并向报社编辑工作小组成员和报社“文革”主任发出最后通牒，威胁他们不得妨碍“总部”夺权。

1月3日下午，朱锡琪、周国荣召集各部、组负责人和各车间骨干开会，进一步策动报社中层干部起来支持夺权。当晚7时，“总部”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宣布由“星火燎原”和报社其他的造反组织联合接管《文汇报》社，夺了领导权。

1月4日，夺权后的第一张《文汇报》出笼了。由三个大方体铅字“文汇报”取代了原来手书的报名，以套红标题突出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夺权声明”即《告读者书》，宣称：报纸由“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并列举了所谓旧《文汇报》的“滔天罪行”，大喊大叫“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文汇报》的夺权，首创了“接管报纸”的先例，成了所谓“一月革命”的前奏，并影响全国。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飞抵上海“摘桃子”。《文汇报》社的夺权，正符合他们篡夺上海市党政权力的需要，第二天即表态肯定，说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接着1月7日、8日，张春桥连续对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等人下“指示”，说：

“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三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造反派的报纸什么都可以写”“《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等人根据这些“指示”，极力为张春桥等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2) 《解放日报》社的夺权。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红革会”与“工总司”的大队人马虽然撤离了《解放日报》社，但并未放弃控制《解放日报》的野心，他们加紧了与报社内部造反组织“《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勾结，并成为其后台。12月31日晚，有一批自称是半工半读大学生组成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冲进报社大楼，占领要害部门，对外宣称《解放日报》社已由他们接管。当时，“红革会”、“工总司”的头头范佐栋等人正驻在报社里，在他们的干预下，迫使这些人在天亮前撤出了报社。

此后，还有一些造反组织觊觎《解放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扬言要来“接管”。正当这个时候，传来1967年1月3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社的消息，使《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受到“启发和鼓舞”，他们当中很多人主张跟踪效尤，立即接管《解放日报》，说“不能让这块肥肉被别人吃掉”。当天，造反联合司令部开会研究是否立

即接管。有人主张立即接管；有的人因《解放日报》是党报而有些犹豫，认为应请示中央，或由造反派监督，使报纸为造反派所用。由于意见分歧，决定派陆永祯赴北京请示“中央文革”。1月5日下午，陆乘飞机赴京。在《人民日报》社，鲁瑛等人接见了她，但他们只听陆讲，不发表任何意见，陆不得要领。陆又想通过大学红卫兵去请示“中央文革”，也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已，在北京给“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各拍了一个电报向他们请示，然后回沪。

就在陆永祯赴京的1月5日下午，“《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又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是否接管的问题。北京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和上海的“红革会”、“同济东方红”都有人参加。《文汇报》社的朱锡琪也去了。“红革会”的头头马立新说陈丕显、曹荻秋很快就要被“打倒”，上海市委马上要彻底垮台，极力怂恿“《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从速接管。朱锡琪在会上大喊要“敢字当头，先斩后奏”，还介绍了《文汇报》夺权的经验。在这伙人的支持下，报社的造反派头头们决定，不等陆永祯回沪即行接管。于是，起草了《接管通告》，设计出夺权后的第一张报纸的版面安排。当天晚上，向报社全体职工宣布《接管通告》：报社的一切权力归“造反联合司令部”；所有工人、干部必须坚守岗位；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的破坏活动。开创了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造反派的夺权，遭到了报社许多印刷工人的坚决反对。排字房的一些工人不肯为夺权后的《解放日报》排字拼版，印刷车间的一些工人坚决不肯印报，一些工人提出要正在上海的张春桥接见，询问“中央文革”是否同意接管。经徐景贤向张春桥转达他们的要求后，张春桥竟诬蔑这些工人“都是‘申、新’两报（指国民党时期的《申报》、《新闻报》）留下来的，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而属于工人贵族”。他表示不接见这些保守派的代表。这些工人和造反派僵持了一天一夜。1月6日早晨，造反派采取调虎离山计，一面与不肯印报的工人代表谈判，一面偷偷派一些造反派到车间印报。这一阴谋被工人发觉后，一批工人涌进印报车间，当场砸坏了版子，追回了被送到《文汇报》社开印的纸型。1月6日，全市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市委大会”，“《解放日报》造反联合司令部”的代表在大会上宣布《解放日报》已由造反派接管的“喜讯”。但这天的《解放日报》未能开印发行。直到当天傍晚在市公安局造反组织“公革会”的支持下，印刷工人才被迫开印。原应在6日出版的报纸，直到7日下午才发行出去。

(3)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夺权。

广播电台是先夺权后军管。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广革会”）和“广播电视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电”）是电台、

电视台的两大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影响下，1月7日凌晨，“广电”宣布接管电视台。由于“广革会”和交通大学“红三司”不予承认，“广电”随即宣布撤销接管。1月8日，由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夺了权，“广革会”认为夺权有了依据，提出：“《解放日报》、《文汇报》都夺了权，我们为什么不能夺权？”交通大学“红三司”驻电台小分队也极力主张夺权，宣扬“革命不需要批准，夺权是大方向”，“广革会”加紧了夺权的准备。

1月14日下午，“广革会”起草了《接管声明》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7日下午，“广革会”勤务组决定要抢在“广电”夺权之前接管。晚上7时，“广革会”召开“砸烂电台黑党委”大会，荒谬地宣布开除电台党委书记王永贤，党委委员、副台长杨涛等同志的党籍；旋即派人占领了电台各部门和播音室。21时在990千周、790千周向全市、全国广播了《接管声明》和《向毛主席致敬电》，共连续广播了4次。并在对台湾广播时间内也插播了《接管声明》。1月18日，又重播了4次。电台的大权，被这伙无视中央严令“电台不得夺权”的“造反派”夺去了。

在“广革会”、“广电”这两大造反组织先后抢权、社会上的一些造反组织纷纷要求进驻电台之际，电台党委书记王永贤、副台长杨涛考虑电台安全没有保障，即向上级提出建议实行军

管。“广革会”宣布夺权后，当晚23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奉命派员来到电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宣布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

《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造反夺权，都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和支持下进行的。1月7日至9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张、姚曾5次接见《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电台的造反派，“赞赏”他们的“造反精神”，鼓励他们“放开干”，“不要怕”。

（四）以两个造反组织篡代政府部分机构职权

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后，市委和市人委已无法工作，各委、办、局的党政机构都陷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张春桥、姚文元对“工总司”王洪文、“市委机关联络站”徐景贤等人煽动说：“市委不行了，你们把单位管起来嘛！他们不管你们管！你们不要怕，我们支持你们！”在张、姚的操纵下，两个造反组织篡代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部分机构的职权。

（1）以“火线指挥部”篡代市政府经济部门职权。

1月7日晚，王洪文主持召集“工总司”所属各区、局联络站负责人和“市委机关联络站”、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头头开会。会上，王洪文、徐景贤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提出要成立一个“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简称“火线指挥部”），决定以铁路、港务、长航、邮电、海运、交通运输等

6个局的“工总司”联络站负责人和部分红卫兵组织代表参加组成。王洪文指派潘国平、王明龙代表“工总司”为总负责人，谢鹏飞作为交通系统六局联合指挥部的代表、朱永嘉作为“市委机关联络站”代表参加领导。后潘国平没有来，实际由王明龙和谢鹏飞负责主持。

几天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在武康路99号召开汇报会议，朱永嘉汇报了“火线指挥部”的情况，张春桥大为赞赏，说“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你们这个机构等于把市委对经济工作、工交工作的领导抓了起来，我支持你们的工作”，等等。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在武康路2号市委写作班所在地，接见了“火线指挥部”组长以上有关人员，把“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吹捧了一番，说“这是个新生事物，新的政权形式，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又说：“‘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1月12日以后，王明龙作为王洪文的全权代表负责筹备“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工作，准备全市夺权，“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实际由谢鹏飞一个人主持了。谢经常打电话向张春桥请示汇报，借此到处吹嘘：“春桥现在听我的，……他相信我，把权都给我了。”等等。谢鹏飞这个造反头头，也有自己的野心，他借口张春桥指示“火线指挥部”要代替市人委，迅速扩大了“火线指挥部”的组织机构，设立了工业组、交通组、

市政组、科研组、财贸组、卫生组、接待组等，代替市人委的有关委、办，人员也从5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谢鹏飞要各组人员下去时既要“抓革命、促生产”，又要“抓夺权问题”，这就和“市委联络站”所属各委、办的造反派发生了“权力冲突”，相互吵架，发生内讧。谢鹏飞对“市委机关联络站”派到“火线指挥部”的人，不发给工作证，不开介绍信，不让参加会议，规定这些人只抓生产，不能抓“夺权”。称这批人是冒牌造反派，讲朱永嘉是走“上层路线”、“干部路线”的，讲王承龙的“野心太大，在搞鬼”，谢鹏飞想一个人独霸“火线指挥部”的领导权。而王承龙等人也派人到处收集王明龙、谢鹏飞等“工总司”一些头头的“材料”，通过《情况》、《简报》等向张春桥、姚文元“告状”，闹得不可开交。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张春桥下令将“火线指挥部”改为“火线指挥组”，作为“公社”下的一个临时性的组室，规定它只负责一些生产方面的突击性任务，大大削弱了它的职能权限。到了1967年3月，这个组被撤销了，谢鹏飞被迫将“火线指挥部”的大印交给了徐景贤，完成了所谓的“历史任务”。

(2) 以“文保会”篡代公、检、法等专政机构职权。

“文保会”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建立于1967年1月20日，是张春桥一手策划搞起来的。

1月11日，“红三司”等造反组织冲砸了上海市公安局，与公安局的造反组织“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达成“联合接管”的协议，进行夺权。张春桥对这伙人的行动表示完全支持。张春桥说：“上海市公安局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说“造反组织对公安局的接管，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我们应该支持”。

1月13日下午，“公革会”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主意，找了社会上15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锦江饭店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夺权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要各个造反组织支持“公革会”夺权。会上，“公革会”的头头聂松岩、王维章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的设想，当即得到张春桥的赞同。张春桥说：“公安局的问题，造反组织不一定都参加，部分革命组织参加也可以了，搞一个《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言》，“专政工作可由公安局造反派做召集人”。

1月16日，经过各造反组织的协商，决定由“工总司”、“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三司”、“红革会”和“公革会”等五个造反组织作为“文保会”的常委单位，“工总司”王洪文当“主任”。“市委机关联络站”派人协同“公革会”起草《宣言》和《通告》。

1月18日，“公革会”派了三个人带了张春桥写的致“谢富

治转康生”的信，乘飞机去北京。1月19日，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汇报接管市公安局、成立“文保会”的情况。谢听后表示支持，并认为成立“文保会”是一个创造。

1月20日，“文保会”成立，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宣言》，有10个造反组织在《宣言》上签了名。“文保会”的核心由“公革会”代表3人、“工总司”代表1人、“红三司”代表1人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造反派代表各1人共7人组成，下设办公室、情况组、人事组、专案组、宣传组、接待组等，工作人员有200余名。“文保会”的任务公开讲的是“参加接待、调解工厂、企业、学校两派纠纷，负责全市性的集会维持社会治安”，但实际上除了镇压人民群众对“文革”的不满外，还成为“工总司”“公革会”等造反组织镇压反对派的工具。

例如，“文保会”一成立，“公革会”常委聂松岩等就以“文保会”的名义组成调查组，到上海柴油机厂去“调查”“上柴东方红”（全称“上海柴油机厂东方红兵团”）控告支持“上柴联司”（全称“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的“串联会”搞武斗情况。调查组去后调动200余人，冲砸了上柴厂的铸工车间，并抓了人，结果被“上柴联司”包围，后来“工总司”王洪文又派了5千人包围了上柴厂将调查组救出，由此挑动了“砸联司”的武斗事件。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调解两派

纠纷的“职能”。又如一次张春桥在锦江饭店被关在电梯中出不来，“文保会”把这个事故作为迫害张春桥事件进行调查，对锦江饭店的职工加以迫害。

后来，“文保会”内部在批准拘捕、关押权问题上发生了纠纷，“文保会”曾拒绝拘留“工总司”陈阿大抓来的人；加之王洪文和“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耿金章闹矛盾，王洪文指责“文保会”为“二兵团”和“公革会”所控制。以后“二兵团”被砸，加上“市革会”成立，红卫兵陆续撤出，“文保会”已名存实亡。到1967年3月1日，市政法指挥部成立，张春桥批示：“‘文保会’保留组织名义，停止一切活动”。至此，“文保会”“寿终正寝”。

（五）四次以破产告终的抢先夺权活动

1967年1月11日，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市新的最高权力机构。12日，各造反组织通过了《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提出“联络总站”由上海和外地驻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派出联络员组成，开始了筹备工作。

在筹备过程中，由于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都想抢占“总站”委员的席位，直到22日，“联络总站”还建立不起来。而张春桥、姚文元在1月20日报给中央的《上海情况》中却谎称：“‘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各种联合实际上已

行使着政权作用。”这时，张、姚看到山西省、青岛市已经宣布夺权，心中十分着急，又在22日晚上召集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开会。张春桥对他们说：“现在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关系相当紧张，希望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联络总站’是不是早一点落实，（因为）已经登了报了。有这样一个站，解决问题就比较容易些。”姚文元说：“赶快成立全市的‘联络总站’，已经登了报了，说话要算数。”再三进行催促。但终因内部摆不平而一直未能建成。后来实际上就被所谓“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备组织所代替。

在这段时间中，各派造反组织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一般地说，“工总司”等有“实力”的、对张春桥比较恭顺的组织占了便宜。在一次审议“公社”参加组成单位的筹备会议中，作为“工总司”王洪文全权代表的王明龙说，要以对张春桥的态度来划线，确定是否允许成为“公社”的组成单位，以此来讨好张春桥，排斥异己派别。当时参加会议的“炮司”^①代表周谷声等二人当场被驱逐出会场。“红革会”、“工总司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工三司”等30几个造反组织，或因被排斥在“公社”筹建组织之外，或因分配到手的“委员”名额太少，这些组织的头头纷纷表示强烈不满。于是，有些造反组

^① 全称“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由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东方红公社”、华东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上海师范学院“孙悟空”、市东中学“红色恐怖战斗组”等组织的部分红卫兵组成。

织就酝酿抢先夺权，有的要揪斗张春桥，造张春桥的反。从1月15日到2月8日，演出了四次抢夺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的闹剧。主角是“上三司”（“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名“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二兵团”（“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造反组织。这些抢先夺权活动，都因为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玩弄手腕，欺骗镇压，分化瓦解，以失败告终。

(1) “上三司”和“二兵团”等的抢先夺权活动。

1月14日晚，“上三司”司令赵全国（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夺中共上海市委的权的问题。“二兵团”派常委张虎根等参加（张也是“上三司”的顾问）。张虎根在会上说：“据可靠消息，‘红革会’要夺权并进驻上海市委、华东局。”“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应该夺权，‘红三司’已夺了市公安局的权，说不定他们也正准备夺上海市委的权，要夺早夺，明天就进驻。”赵全国在会上提出：“立即对上海市委发动夺权攻势。”常委一致认为要抢在“红革会”前面。当晚立即作组织力量的准备，并起草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三个《通令》。1月15日凌晨3时半，以“上三司”和“二兵团”为主，其他造反组织也有少数人参加，总共300多人，冲进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宣布“夺权”，并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办公大楼上插上了“上三司”的旗帜，以示接管。

他们发布的三项通令的内容是：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罪行”，宣布接管市委和市人委；任命张春桥为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兼副市长；“勒令”原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马上恢复办公。

“上三司”和“二兵团”提名张春桥、姚文元为上海市党政第一、二把手，正中张春桥下怀，使他颇为得意，他对徐景贤等人说“建议很好，自下而上提名好”。但“上三司”、“二兵团”未经他同意擅自抢先夺权，破坏了整个夺权部署，又使他十分恼火。于是他恶狠狠地造谣说这次“夺权”是“陈丕显的阴谋”，“是要把上海市委这个烂摊子推给我，把我压垮，挤出上海”。1月16日，他又把“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叫来，一面威胁说“现在夺权时机不成熟”，“‘上三司’他们要犯错误”；一面又拉拢耿，说“安亭事件”后张又去苏州和耿签订了“五条”，就是支持“二兵团”的，只要耿听他的，以后决不会亏待耿的。耿听后表示立即从康平路市委机关撤出。张春桥很高兴，留耿吃了一顿饭，以示犒赏。

“二兵团”撤出康平路市委机关后，“上三司”孤掌难鸣，这次夺权就破产了。

(2) “上三司”再次抢先夺权。

第一次抢权被张春桥破坏，“上三司”头头赵全国不服气，立即组织了五人代表团飞往北京，打算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他

们到京后，听到《人民日报》将要发表支持夺权的社论，认为他们在上海的夺权，大方向没有错。于是赵全国、张虎根马上又飞回上海，对正在开会的“上三司”常委们说：“张春桥不支持我们夺权，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央支持我们。”张虎根说：“现在只有夺权，是最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到会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夺权，准备举行汽车游行，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并起草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和夺权标语、口号。他们联络了“二兵团”一部分人和市委机关“工农兵东方红造反兵团”等，号称五十个造反组织，在1月22日中午再次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宣布接管上海市委，成立“临时督管上海市委联合委员会”。并提出紧急呼吁：第一，立即召开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联席会议，筹备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式的市人民革命委员会，一旦条件成熟，立即召开全市工、农、兵、学（包括革命教职员工）代表会议进行选举；第二，新的巴黎公社式的市人民革命委员会未成立以前，由各革命造反组织选派代表组成“联合督管委员会”，对市委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第三，责令市委各级干部立即回原工作岗位，听候“联合督管委员会”的处置；第四，希望已经督管市委所属各部、局机关革命造反派组织，立即与新的“联合督管委员会”取得联系，建立全市性的督管网。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听到“上三司”再次夺权的消息后，十分恼火。他叫朱玉佩、徐景贤打电话召赵全国来开会。赵回

答说：“你告诉张春桥，我们请他来，要是他不深入群众，我们就造他的反。”这样，更加触怒了张春桥。张就在衡山饭店召集徐景贤、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等人谈话，严厉指责赵全国，唆使对“上三司”采取“革命行动”。会后，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带了一批造反队员奔赴康平路市委机关，名曰与“上三司”赵全国进行辩论，实际上这些人一到市委机关院子里，大嚷大叫“上三司”的头头是“政治扒手”，随即将赵全国扭送到公安局，投入监狱。（赵被关押了七年），随后，“工总司”等把“上三司”总部和各分部统统砸光，第二次抢先夺权自然夭折了。

(3) “红革会”的抢先夺权。

在“上三司”两次抢权的同时，“红革会”也在策划抢权。1月23日，“红革会”召开“勤务组”扩大会议。会上，“红革会”头头李功佐说：“我们要做到想的是夺权，看的是夺权，干的是夺权。在夺权斗争上，我们落后了。”由于在张春桥策划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起草委员会中没有让“红革会”参加，这些人提出，“上海公社排斥了我们，我们干我们的，由下而上地夺权”，“不能等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再夺权”，“夺权要以我为主”。于是，会上决定成立“夺权指挥部”，确定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作为夺权的“重点”，同时要夺下10个区的党政权力。对区的夺权，由各高校的“红革会”分别负责。

1月24日，“红革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左派大联合，夺权换新天》一文，套用《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话，“我们的口号是夺权，我们的决心是夺权，我们的一切归结到一点，就是夺权！夺权！！夺权！！！”煽动各造反派“把上海各行各业的一切大权、小权，自下而上统统夺过来，直到把旧上海彻底砸烂”。“红革会”头头马立新等为了壮大夺权声势，还找了“工总司”的潘国平、“农司筹委会”以及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等，到市委办公厅档案室抢走市委和市委办公厅的“大印”。“红革会”所属各校的红卫兵，也分头到市人委和各区委、区人委抢走了“大印”。“红革会”发表的《接管通知》中宣称，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大印”，由他们移交即将成立的“公社”。

张春桥、姚文元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徐景贤去“红革会”的“夺权指挥部”，威胁他们说：“没有春桥、文元的同意，权你们夺得了吗？”“《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其他造反组织也不支持你们。”以命令口气说，对上海市委“要由全市造反派大联合的上海人民公社来接管”。在张春桥的压力下，“红革会”抢权也告失败。

(4) 以“二兵团”为首的“大联委”的抢先夺权。

“二兵团”参与“上三司”抢先夺权未成，头头耿金章在张春桥威胁利诱下屈服了，但心中犹有未甘。“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备工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组成单位”是以王洪文为代表

的“工总司”为首，而“工总司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工三司”（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战到底”（全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造反组织都被“归口”于“工总司”而未能列入“组成单位”名单。另外还有30几个造反组织完全被排斥在外。这些组织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之间的矛盾激化，群情激昂。

2月2日，这些被排斥或冷遇的造反组织，在“二兵团”头头耿金章领头下，在上海大厦召开会议，商量对策。耿金章在会上说：“‘工总司’公然和我们分裂了，搞了个人民公社，把我们100多万造反派放在外面。”他提议要成立一个“夺权组织”，这个组织不许“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进来。参加会议的人也主张：“他们夺权，我们也夺权，夺了权以后，大家坐下来谈判。”有的说：“上海人民公社有36个单位，我们也有36个单位。36对36，嗨！张春桥要感到棘手了。”会上决定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要把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都夺过来，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发表《夺权宣言》和《通令》。会上还通过了发给“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和江青的急电。会后，到处张贴“一切权力归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大幅标语。

张春桥听到“大联委”要夺权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连夜又把耿金章找去，再一次要弄威胁利诱的狡诈手法。他对耿金

章说：“我和姚文元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们再另搞一个大联合委员会，只能和上海人民公社对立，就可能在关键时刻犯错误。”继而又说：“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时，让你也上主席台，将来担任上海人民公社常委。”还允诺今后会让更多组织逐步参加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软硬兼施的压力下，耿金章又一次屈服了。“二兵团”软了，“大联委”一蹶不振，这次抢先夺权也就烟消云散。再说，2月5日，耿金章确实上了“公社”成立大会的主席台，当上了“公社”的常委。可是，耿金章没有想到，他只当了20几天的“公社”常委，就被张春桥、王洪文指使的黄金海、戴立清等人，骗到上棉三十一厂，被抓了起来，送进了公安局。与此同时，“二兵团”也被宣布解散了。

（六）“上海人民公社”出笼

张春桥、姚文元亲自策划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迟迟建立不起来，不得不另起炉灶。1月19日，他们指使王洪文出面召集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再次研究夺权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交通大学“反到底”余小兵、杨小兵，同济大学“东方红”陈敢峰，华东师范大学“新师大”霍达，复旦大学“炮司”周谷声，“上体司”胡永年，“上艺司”刘军一、葛军，“上医司”陈广焯，以及“大专院校赤卫军”、“小教司”、“新闻战线”、“版司”、“红上司”、“红东北”、“红西南”和外地

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的“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北京体院”、“哈军工”、“西安电讯”等组织的代表。王洪文提出：“现在上海旧市委已经砸烂了，市委已经不能再领导全市一千万人民进行革命和生产，因此要夺市委的权，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的权力机构。”在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后，议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新的权力机构名称问题。会上，有的主张叫“上海市最高权力委员会”，有的说应该叫“指挥部”，有的要叫“总指挥部”，意见不一。这时霍达提出要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于是都同意叫“上海公社”。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同陈伯达、王力等反复密商后，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 起草“公社”宣言。决定由“新闻战线”、“大专院校赤卫军”、华东师大“新师大”等组织分别起草，拿出初稿，再讨论修改定稿。

(3) 由“工总司”负责召集各造反组织代表开会审议“公社”的组成单位。

(4) “公社”举行成立大会日期定于1月27日，和巴黎公社成立日期相同。会址在人民广场。（后由于发生了1月28日反对张春桥的“一·二八炮打”事件，延期到2月5日才召开。）

谁来当“公社”头头呢？张春桥、姚文元为夺权而苦心经营，对此“位置”早已垂涎三尺。现在眼看时机已经成熟，真

是急不可待了，但又装做羞答答地难以启齿的样子，于是又玩了一个花招，要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提出来。1月中旬，徐景贤秉承张春桥的意旨，找了“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商。徐提出：“你们能不能发动一些人刷些大标语？”内容是：“欢迎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欢迎姚文元××当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欢迎张春桥××当上海市市长！欢迎姚文元××当上海市副市长！”还说：“群众的要求可以引导嘛！”果然，“工总司”二兵团耿金章以全市造反派名义给毛主席发电报，“强烈要求”张春桥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不久，在外滩的一幢大楼上就出现了用红布制造的、从楼顶直通到底的四幅大标语，上面写的就是徐景贤提出的内容。“民意”反映上去，很快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于是，1月下旬张春桥把王洪文、王明龙等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说他和姚文元二人代表革命干部参加“上海人民公社”，还要上海部队也参加，支持群众组织夺权。王洪文、王明龙马上表示欢迎张、姚二人和上海警备区首长参加“公社”。到了“公社”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把这个说法改变为“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的同意”，他们二人参加了“公社”的领导。

张春桥、姚文元随即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30几个造反组织头头开会，讨论经他们二人修改过的《公社宣言》和《大会通

令》的草稿，并商议召开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等问题。会上，有的人担心还有不少造反组织没有参加进来，会产生矛盾。张春桥也怕引起事端，建议参加“公社”的30几个组成单位，改为发起单位，“公社”成立后，还可将一些造反组织陆续吸收进来；而“公社”的发起单位不公开具名，而以“‘工总司’等30几个单位”名义发表；其他的造反组织要求参加“公社”成立大会的都可以同意。

1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说当前夺权“是一场革命大风暴”，而这场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为即将登台的张春桥、姚文元涂脂抹粉。

2月3日，“公社”筹委会开会，有人提出，按照毛主席指示，“公社”要有一些老干部参加。张春桥说，他和姚文元就可以代表老干部，又把徐景贤作为机关干部的代表，塞进“公社”。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操纵下，终于出笼了。下午2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公社”成立大会。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张春桥在会上得意忘形地说：“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市人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上海无产阶级广大人民夺了权，当了政。”说“公社”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斗争的中心，斗争的焦点，成败的关键。”

成立大会《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要把“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要“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公社”的《第一号通令》中，说什么要“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公然宣布：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都作为“现行反革命，立即逮捕法办”。

张春桥等把夺权后的权力机构起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对这个“创举”，中央有许多负责同志表示强烈反对，毛泽东也并不赏识。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找去谈话，指出：“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67年2月23日，以沪革（67）第008号《通知》，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上海刮起的这股全面夺权的“风暴”，在全国产生了恶劣影响，各地造反组织争先效尤，动乱四起，武斗升级，“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围绕一个“权”字你争我夺，把全国人民推

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